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源

2015年 · 第5期 · 总期: 117 ✦ S$5.00

和衷共济、勇于开拓的族群：新加坡华族

本是同根生：新加坡的马来族群

闪光灯下：旧照片中的新加坡印族史

多重定义的社群：欧亚族对新加坡的贡献

新加坡建国50周年

二十而立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30周年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9 770219 197006 >

交通方便　场地宽敞
冷气设备　一流音响

喜宴、集会、演出、展览皆适宜

欢迎各界租用

宗乡总会大礼堂
会议厅

特价优待
会员团体

新加坡宗乡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 Tel: (65)6354 4078 • Fax: (65)6354 4095
网址：http://www.sfcca.org.sg • 电邮：sfcca@singnet.com.sg

YUAN 源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编辑语

文 · 谭瑞荣

孔子说的“三十而立”，实际上是自我审视，指他三十岁时的人生状态。现代人普遍理解为：人到三十，应该能独立承担责任和义务，并确立了自己的发展方向。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确是走到了这样的“人生境界”。

本期 “三十而立” 的栏目中，《与时俱进三十年》、《忆总会筹备成立，怀念张良才先生》、《美好的回忆》等文章，能让您看到宗乡总会是怎样一步一个脚印走到这个“人生境界”的。而《三十而立话总会》，则从不同的角度，对总会昨天的成绩、今天的任务、明天的计划做了疏理和交流。对“而立者”有肯定处的赞誉，也有不足处的建言。如果您想更详细了解宗乡总会的运作机制，《各司其职，和衷共济》所囊括的内容，相信能让您一探究竟。

如果说，我们将“而立之年”的宗乡总会比喻成一个血气方刚的赤子，那么，“知天命之年”的新加坡共和国自然就是年富力强的父辈了。趁着SG50的余热，我们推出了“异族同心”栏目，特邀本地四大种族文化机构撰写文章。他们分别叙述和总结了本民族的建国历程、突出贡献；疏理和展示了民族的源流以及开拓者的史实。通过他们图文并茂的追述，您能够看到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欧亚族在本地奋斗的足迹；能够感受到他们从不同的地域、以不同的文化交汇、融合的艰辛历程。新加坡，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浴火重生，将“知天命之年”锻造成辉煌的“金禧之年”。

当然，本期也保留了特有的栏目，以期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向“而立之年”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向“金禧之年”的新加坡共和国献上一份微薄之礼。

2015年 · 第5期 · 总期: 117

■出 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编辑顾问■
李国基　方百成

■编辑委员会■
主任: 严孟达　副主任: 周兆呈
委员: 尹崇明　白毅柏　蔡成宗
李叶明　周延飞

■总编辑■
谭瑞荣

■编辑 / 记者■
欧雅丽

■英文翻译 / 校对■
关汝经　李国樑

■总代理兼发行■
恒信贸易公司
Huang Sin Trading Co.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65) 6841 1367
Fax: (65) 6841 6267
Email: huangsin@pacific.net.sg

■设计、分色、承印■
先锋印刷装钉私人有限公司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 (65)6745 8733
Fax : (65)6745 8213
网址 : www.pcl.com.sg

■出版准证■
ISSN 2382-5898
MCI (P) 150/02/2015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出 版■
2015年10月

本刊所载之全部编辑内容为《源》杂志版权所有，未经同意，任何复制及任何形式之抄袭均属侵权行为

目录。

p.4 三十而立

总会三十 坚如磐石 蔡天宝

与时俱进三十年 柯木林

—— 纪念宗乡总会成立30周年而作

忆总会筹备成立，怀念张良材先生 韩山元

美丽的回忆 区如柏

梦想与家园 徐李颖

“三十而立”话总会

锦上添花 马进强

—— 宗乡总会秘书处的改变

各司其职 和衷共济 编辑部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各部门介绍

五年的足迹

—— 2011年1月至2015年11月宗乡总会大事记

p.56 总会专递

宗乡青年齐聚圣淘沙交流 欧雅丽

宗乡总会第十五届理事暨执委会就职 欧雅丽

p.58 社团聚焦

百年中山会馆焕发年轻活力 欧雅丽

福建菜与新加坡福建文化节 陈伟玉

p.63 乐活人生

用华文讲述“精彩” 黄兰诗

p.58 社团聚焦

p66 追根溯源

p.95 异族同心

p.66 **追根溯源** 书法艺术拓广于民间 尤今

书法艺术的传扬 南洋女中学生记者
—— 访陈亮老师及其学生

校园墨香 南洋女中学生记者
—— 访吴晓燕老师及其学生

p.76 **艺术长廊** 刺客之歌《广陵散》 庄永康

追逐风景的人 邹璐

p.82 **建筑情缘** 南洋大学行政楼 虎威

p.84 **华语华文** 读懂媒体上的中国 汪惠迪

p.86 **医药保健** 五十肩的中医治疗 李曰琳

p.88 **星洲绿话** 西洋果树也移居 李喜梅

p.90 **最爱书房** 为冼星海在新加坡的史迹补遗 陈士铭

p.92 **文学景点** 狮城地标诗学: 汇四方情思兮若兰之绽 林高

p.95 **异族同心** 和衷共济、勇于开拓的族群: 新加坡华族 朱添寿

本是同根生: 新加坡的马来族群 苏海莉 · 奥斯曼

闪光灯下: 通过旧照片追踪新加坡印度族的历史 蓝丽娜 · 戈帕尔

多重定义的社群: 欧亚族对新加坡的贡献 安东尼奥 · 拉帕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新加坡建国50周年
国运 SG 50 昌隆

三十而立

三十而立。

总会三十 坚如磐石

文 · 蔡天宝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步入了而立之年。30年的历程一路走来，有坎坷，也有辉煌。值得庆幸的是，宗乡总会在成长的路上能够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奠定了如磐石般坚固的根基。

自1985年成立以来，宗乡总会便坚持不懈地为华社谋求福利，负起领导众会馆的责任。在首任会长黄祖耀先生的带领下，宗乡总会先后成立了“宗乡会馆基金”及“中华语言文化基金”，以促进会馆间的合作关系及推广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在大型活动方面，家喻户晓的“春到河畔”是代表作之一。这项新春盛典于1987年正式开锣，30年来为新加坡民众和海外游人提供了一个欢度春节的极佳去处。

除了担任宗乡会馆的领头羊，宗乡总会也不忘履行其社会责任。1992年，宗乡总会与中华总商会联合成立了华社自助理事会，为有需要的华族国人提供各方面援助。接着，华裔馆也在宗乡总会的主推下于1995年正式开幕，以便有系统地整理及保存华人研究的史料。

2010年，我有幸接过了宗乡总会的领导棒子。有感于宗乡总会的发展刻不容缓，于是举办了集思营，希望借此寻找新方向，为会馆树立起新气象。我们整合出三大策略：协助会员成长；改变总会形象；加强与政府的合作、举办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

欲帮助会员成长，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前后举办了多场午餐聚会，邀请各会馆领导一边聚餐，一边共商华社事务。紧接着，宗乡总会也走进社团，举办“分区会馆交流会”，并邀请华社领袖共襄盛举，成功获得会员团体的热烈支持。透过这些平台，代表们畅所欲言，我们聆听大家的心声，设法排忧解难，同时推陈出新。在多场交流会中，我们深刻了解到会馆普遍面对资金不足、青黄不接、活动裹足不前等窘境。于是，我们动员全体同仁，从各方面着手，给予会员团体支援和协助。

在资金与活动方面，为了让会馆开源节流，宗乡总会在会馆文化活动资助金方面加强运作，赞助资金薄弱的会员团体开展活动项目。我们也定期主办各种活动，供会员团体参加，或邀请他们以联办、协办的形式参与。如此一来既可惠及其会员、丰富会务，又可节省开支，一举数得。

宗乡总会亦十分重视宗乡组织的永续发展及年轻一代的栽培，因此教育、培训和科技运用也是我们所关注的。为鼓励会馆的会员及职员掌握新技能，宗乡总会和新跃大学合作推出了学士课程资助金，为宗乡团体栽培优秀人才。总会还设立了宗乡总会奖学金，鼓励年轻人到中国顶尖大学修读学位，为我国培养双语双文化人才。

我们明白，提携后进及栽培接班人是至关重要的。宗乡总会高度关注年轻一代的发展，因此也纳入了不少新生代，像日益壮大的青年委员会和义工团，以及颁发宗乡总会奖学金以吸引青年才俊便是很好的例子。

我们深知，要应对日益多元和复杂的环境，就必须适时做出调整并重新定位。有一点不能忽视的，即是新媒体的力量。几年前我们成功设立宗乡总会网站，同时邀请会员团体共襄盛举，因而获得越来越多年轻人的

关注。宗乡总会也开办培训班，帮助资源有限的会员架设微型网站，将会务上线。随后，手机应用程序《宗乡汇典》正式面世，为会馆提供了一个保存资料文献、传播资讯的平台。值得一提的是，由义安理工学院学生开发的双语应用程序及资讯网站“时光老店企划”也成为总会的支持和发展的项目。

2011年，宗乡总会设立“年度杰出会馆奖”，以表扬会馆在弘扬华族文化等各层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奖项的意义在于鼓励会馆自我提升，开展有意义、有创意的项目，同时也让众团体互相观摩借鉴，激励彼此成长。在得奖者中，有历史悠久的会馆，也有新移民团体。我们从中看到了宗乡团体的转型与革新，令人深受鼓舞。

在照顾会员团体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集思营上的第二大策略，即改变形象。为此，我们着手举办具号召力的活动，从吸引年轻人，加强社会融合，重视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着手，努力树立新形象。

在青年事务方面，相关活动如交流会、对话会、体育节等，都成功令年轻族群对会馆文化有新的认识，从而带动越来越多人投身华社。上述的“年度杰出会馆奖”在迈入第四年之际，我们也新增一项“推展会馆青年事务”的评分标准，以肯定年轻一代在宗乡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

与此同时，宗乡总会竭力推广教育工作。以“走入校园”为例，我们透过示范讲解把传统文化介绍给莘莘学子，寓教于乐，令华族及异族学生同时受惠。另一方面，宗乡总会也组团率领民众走访会馆以及本地各大民族的地标性建筑，借此认识不同的宗乡团体及友族的民俗文化。一系列多姿多彩的活动深受各界欢迎，亦不乏异族同胞和新移民朋友的响应，这与集思营上的第三策略，即促进国民融合与凝聚力不谋而合，令总会多添一道和谐的光彩。

为了加强与政府的合作，使我国各民族能够进一步地团结奋进，我们不但在《源》杂志上增加了部分的英文提要，加强与各界的沟通，而且还与马来传统文化馆、印度文化中心、欧亚人协会及华族文化中心合作，报道和介绍与异族同胞相关的内容。就在在今年十二月，宗乡总会还将举办《四大种族建国奋斗史》讲座，以便深化种族间的共识，携手迈向新的里程。另外，为了使新移民能够更快地融入本地社会，总会于2012年开始出版了《华汇》杂志，向新移民传递有关讯息和知识。这些举措，都一一在印证集思营的思路。

今年，宗乡总会也配合新加坡金禧年举办了“我的新加坡故事”微电影大赛。我们将年轻人感兴趣的事物，如：影视、科技、媒体等综合起来，构思了这项活动；再结合本土素材，促使人们发掘新加坡故事，重新认识各种文化、传统还有精神价值。这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尝试，而公众的热烈回响证明了这一步走得非常值得。

另一份金禧献礼则是出版《新加坡华人通史》专著。这是一本以新加坡华人为主线的历史著作，记录了新加坡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个时期的史实、成就与贡献。相信本书的出版将对新加坡的历史研究工作有所帮助 。

时代不停地进步，宗乡总会也力求与时俱进。在第26届常年会员大会上，我们一致通过修改章程，以适应新社会和时代的变化。在新章程下，宗乡总会开始招收准会员，以便更有效地团结华社相关的民间组织。此外，总会也广纳人才，扩大理事会阵容，并引进多名新移民领导，以便全面地拓展会务。

另一项由总会发起，获政府与民间支持的项目 ——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华族文化中心的设立，标示着新加坡文化迈入了新纪元，它将是凝聚华社、融合社群的又一股中坚力量。

纵观这些年来的发展与转变，我们相信宗乡总会已充分扩大服务范围和影响力，逐步达致弘扬文化、促进社会和谐与凝聚力的目标。不过，在不断变化的大环境下，我们并不止步于此，而是继续积极思考如何更上一层楼。

比如，我们不可忽略受西式教育、以英语为主的华裔族群。他们是华社的一份子，同样能贡献力量，回馈华社。我们应改变思路，以开明的态度和他们互动。有鉴于此，双语双文化教育事业的推动显得格外重要。这不仅是一股趋势，也是我国华社的特点。倘若我们善用这项优势，未来所发挥的影响力将是无远弗届的。我认为每个群体都有自身的优势和长处，我们不妨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想法，相信从不一样的视角出发，能更有效地跨越樊篱，使他们对宗乡团体、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当然，宗乡总会更不忘海纳百川以及和睦精神的重要性。我们当以身作则，敞开怀抱欢迎友族与新移民同胞，并积极招收非宗乡组织为准会员。未来我们将再接再厉，把触角继续延伸，与不同的组织和群体共享资源，拓展合作关系。

华族的文化传统从来都讲究兼容并蓄，因此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宗乡总会除了弘扬华族的传统文化，建立紧密的会馆网络以外，我们更要着力于吸收新趋势下的新观念，使传统与现代相生共荣。作为我国华团华社的中流砥柱，宗乡总会将继续努力不懈，兢兢业业地服务社群。期盼与大家携手共进，令宗乡精神历久弥坚，继续缔造辉煌。

（作者为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

宗乡总会会员交流会
(1990年7月28日)

与时俱进三十年
——纪念宗乡总会成立30周年而作

文 · 柯木林　图 · 编辑部

三十年了！三十这个数字似乎特别容易勾起人们的感触！岳飞的名句“三十功名尘与土”，脍炙人口；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宫崎滔天)的回忆录《三十三年之落花梦》，还有毛泽东的“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都是与三十有关。

当然最出名的还是孔子的“三十而立”。对个人而言，三十确是而立之年，是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但就团体而言，尤其像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简称宗乡总会)这样的组织，过去三十年可说是一个与时并进的三十年。

宗乡总会在1985年12月9日获准注册，一个月后的1986年1月27日正式举行成立典礼。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宗乡总会的成立是符合时代的要求。因为华人会馆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雨历程后，到了1960年代，即新加坡共和国建国之时，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任务，并且多数会馆也已沉寂了一段时期。

历史传承

然而，宗乡总会成立后，再度激活这批百年老店的积极性，所有的会馆都动了起来。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华人会馆所扮演的传统角色，如团结乡亲、排难解纷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已转型为推广中华文化，保存华人传统习俗的堡垒。如何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与其他各族同胞和谐共处，成了华人会馆新的历史使命。

创始之初，宗乡总会的管理层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中央理事会，这是七大发起会馆组成的领导层；另一是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分为四组：行政组、出版组、文化组和学术组，负责向中央理事会提呈活动建议。这种安排似乎继承了当年陈嘉庚改组新加坡福建会馆后的组织框架。

1929年3月，陈嘉庚以中国移民的身份，出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会长，着手改组福建会馆。改组后的福建会馆，领导层由35名执行委员与五名监察委员组成。在35名执行委员会中，五名为常务委员；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务、教育、经济、建设和慈善五科。1980年代创建的宗乡总会领导层，似乎有当年改组后福建会馆的影子。

早年的福建方言群是新加坡华族社会中最强大的社群，他们的领袖也就自然成为华族领导层的主要人物。这种现象延继至今，百年不变。首任宗乡总会会长黄祖耀同时也是新加坡福建会馆会长；而继任的蔡天宝就是从黄祖耀手中接过宗乡总会会长及福建会馆会长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领导层顺利完成交接工作，

正是继承先辈的传统！宗乡会馆组织在这里有其历史传承。

以福建帮为首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在领导层的继承人上没有留下夺权斗争的现象。在新加坡华人史上，福建帮之所以能取得超帮领导权，不是没有原因的。这种表现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达到了高峰。及至1950年代，陈六使创办全东南亚唯一一所高等学府南洋大学，又是一个高峰。换言之，从19世纪开始的往后一百年期间，福建帮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影响，举足轻重。

与时俱进

这样的影响力及至1986年宗乡总会的成立，依然如故。宗乡总会的成立，是新加坡华人史上的大事。宗乡总会成立的意义，在于抢救华人意识和维护中华文化的传承，其工作目标也非常明确，即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统筹统办，推出一些其他会馆所难以办到的大型活动。这个组织在运作了四分之一世纪后，其领导层也有了变动。2010年10月，服务了25年的黄祖耀，把宗乡总会会长的重担顺利地移交给新的会长蔡天宝。蔡天宝出任宗乡总会会长后，成为华社的顶尖人物。

蔡天宝对会馆的工作，有其一套的管理理念。他认为每一届理事，都应该为会馆未来五年或十年的发展，制定一套具体计划；会馆理事不能只是“挂个名”，必须和企业一样，设定表现指标(KP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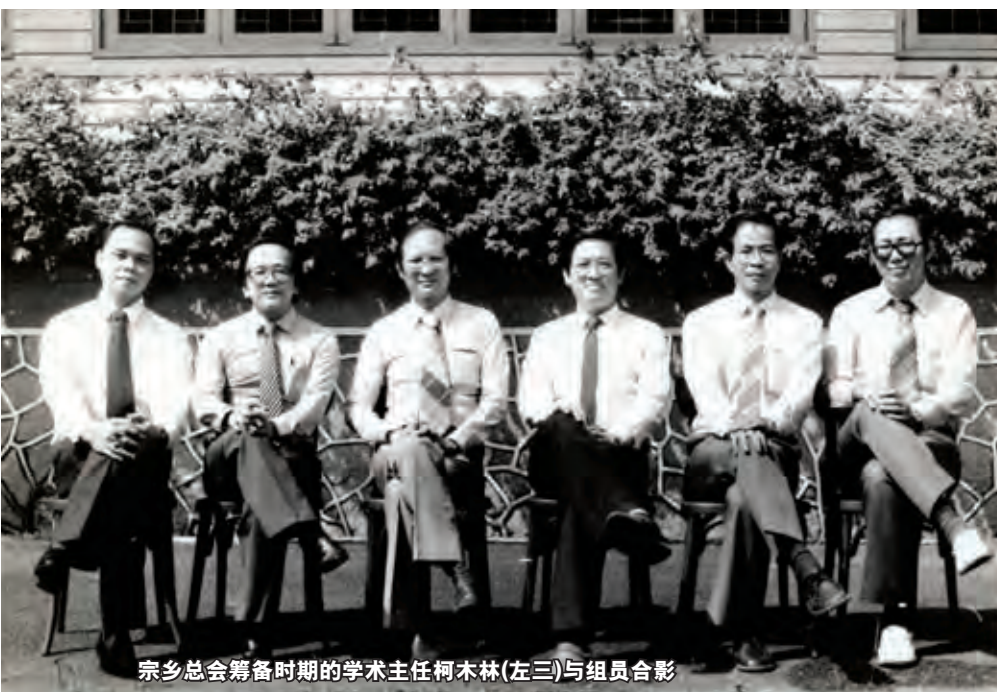
“在竞争激烈的今天，凡事不进则退，会馆也一样。虽然说担任会馆领导人是属于义务性质，但理事们必须不断自我鞭笞，也得为更换新血做好准备”。一言以蔽之，“社团应该与时并进，寻求突破”。所以现代会馆首先必须要有好的管理机制，特别是效率高的秘书处，其次是要能引进好的人才，会务才能往前发展。(参阅《早报星期天》，2010年8月1日)。

就是在这种理念驱使下，2010年10月以后的宗乡总会，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出台了许多与时俱进的创举(列表说明见图一)。

该表主要说明了在前任会长黄祖耀的基础上，宗乡总会重新出发，装修扩展会所，提高员工素质，办公室专业化，利用专业管理系统，重组内部行政工作。2012年提议创建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华族文化中心在2016年底完工后，宗乡总会又从另一个更高的起点出发。

目前宗乡总会共有六个委员会，即：会员事务委员会、社会事务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学术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及产业委员会。各委员会成员介于10到13人之间。以学术委员会而言，共有13位，其中亦有新移民参与。这是配合政府的融合政策。新移民要融入本地的主流社会，其中一个捷径就是参与宗乡会馆的活动。

过去数年来，宗乡总会十分关心新移民的融入问题，并推出了许多重要项目，邀请新移民组织参加如“会馆走透透”活动、“新移民融入”、“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认识新加坡知识竞赛”等等，目的是让新移民更深入了解新加坡的社会。除了喉舌刊物 《源》杂志(双月刊)外，宗乡总会还特别为新移民办了一份《华汇》杂志，定期出版。



宗乡总会筹备时期的学术主任柯木林(左三)与组员合影

我与总会

我是在1985年9月宗乡总会还在筹备委员会的阶段时就加入了。作为首任学术主任，从1986年至1995连任10年之久。1995年后由于海外工作关系，一度离开宗乡总会。2010年，再度重掌学术委员会，此间前后30年，基本见证了宗乡总会从诞生至“而立之年”的历程。2011年1月，当宗乡总会纪念成立25周年之际，我撰文《“一万年来谁著史” —— 重返宗乡总会绪言》，发表在《总会二十五年》特刊，表述了个人参与宗乡总会的感想。

必须感谢蔡锦淞，是他把我引进宗乡总会的。锦淞是当年宗乡总会的首任秘书长，也是我中学时期的学

图一

2011年中旬 (5-9月间)	设立“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奖学金”	• 为培养双语双文化人才 • 每年资助最多5名学生前往中国顶尖大学攻读本科学位 • 目前共资助21位学生
	装修宗乡总会大厦	• 装修办公室、会议室、二楼会议厅、大厦外观。原大厦内部露天部分，改建成封闭的天井，并设计成历史走廊 • 大厦外墙装饰有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捐赠的九龙壁
	设立“年度杰出会馆奖”	• 鼓励宗乡团体举办更多有意义的活动，为弘扬华族文化及促进社会和谐做出贡献
2011/2012年	修改章程	• 2011年4月成立修改章程委员会；9月会员大会通过修改章程决议；次年1月获社团注册局批准 • 理事会从原本15人扩充至最多31人 • 理事会任期从2年增至3年 • 可以接受准会员
2011年6月	李显龙总理应允担任宗乡总会赞助人	• 成立25年来的首位赞助人
2011年9月	正式推出“新跃大学 —— 宗乡总会学士课程资助金”	• 目的是鼓励终身学习以及培育更多双语双文化人才，让想追求大学学士学位的宗乡总会会馆会员，得以实现梦想 • 每年提供5位名额给宗乡总会及属下团体的会员和职员申请
2012年1月	倡议设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 预计2016年底完工
2012年开始	《源》杂志	• 从季刊改为双月刊
2012年6月上线	革新宗乡网平台	
2012年9月	《华汇》杂志	• 9月8日正式创刊 • 季刊以促进融合为旨
	扩充执行委员会	• 为更全面推展会务，执委会从原本的5个委员会增至6个 • 新增的产业委员会，专门负责现有会所及筹划中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建设工作
2014年9月	“宗乡汇典”综合数码移动平台	• 以科技保留会馆文化资产
其它	活动量	• 从每年逾10项活动增至现今的每年30-50项活动
	办公室制度	• 办公室职员从10人增至17人 • 主要分为三个部门
	会员人数	• 从2010年近200间会馆会员增至现今的220间，即：215间宗乡团体以及5间准会员

资料来源：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秘书处，2015年6月26日

长。由于他知道我个人的爱好，因此在宗乡总会创始之初的五组工作委员会中，要我负责学术组。学术组主要的任务是普及、推广与提高新加坡华人历史研究。我个人领导学术组负责这项工作，前后有15年之久。

总结过去30年，学术组(现为学术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可以分作两大阶段：前15年，主要是推广、普及、保存及整理华族历史文化的工作。自从2010年重掌学术委员会之后，更有系统的在以往的基础上，重新出发，以新加坡华人历史文化为主轴，自2011年4月至今，共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与系列专题讲座，有：“闽帮人物与闽商精神” 国际研讨会 (2011年4月)、“新加坡侨批文化展”(2012年9月)、《三州府论坛》之“百年盘点：峇峇人物与文化”(2013年9月)及“关公文化”座谈会(2014年8月)。此外，还有个别的讲座如“从历史文化角度谈在华经商”(2011年6月)等。

比较受欢迎的专题讲座就是《石叻坡记忆》系列讲座。至今已举办

了“新加坡四大历史名楼”(2012年4月)、“家书抵万金”(2012年9月)、“新加坡历史悬案”(2013年5月)、“星洲四才子”(2014年5月)。这系列讲座的特色是雅俗共赏，几乎场场爆满。今年10月，我们会举办《名人与庙宇》座谈会，旨在带领公众探索新华历史名人和庙宇宗祠的情结，领略南洋的庙宇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宗乡总会每个历史阶段的标志性活动中，我都参与其事。比如，拍摄首部新加坡华族历史记录片《抚今追昔》(1987年6月)；出版《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图片集(1986年3月)、主编《总会三年》纪念刊 (1989年1月)、编撰《新华历史人物列传》(1995年11月)、创设“光阴的故事——历史走廊”(2013年9月)，同时配合历史走廊的展览编印《图说石叻坡》 (2014年2月)。

《新加坡华人通史》是纪念宗乡总会成立30周年，暨庆祝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年的献礼，将于2015年11月9日正式发布。这部历史巨著由我担任主编，其内容涵盖了14世纪迄今新加坡近700年的历史，筹备工作耗时三年多，动员了新、马、中、港、澳(洲)37位历史学者共同编撰。作为第一部以华文书写的新加坡华人通史，这本史籍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性的疏理，可以让读者从全方位、多角度了解新加坡华人的历史与发展概况。为了更有效地推广，宗乡总会也计划出版英文版。

学术委员会这些年的研究工作，为文史学者与大众提供了分享与交流的平台，并得到学界的肯定，厦门大学更把宗乡总会视为学术研究的合作伙伴。

展望未来

宗乡总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肩负着带动华人社会、推展华族文化事业、发扬华族传统的使命。主办或资助有关教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活动，提高公众对华族语文、文化和传统的认识，更是宗乡总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1992年宗乡总会与中华总商会联合创立“华社自助理事会”，培养和发展华族社群的潜能；1993年成立“华文课外读物理事会”，向学生推荐可读性高的华文读物；1995年创设的华裔馆，作为海外华人研究中心；2004年，再度与中华总商会合作，联合设立“中华语言文化基金”，推动和支持本地华文与中华文化的学习；2011年，设立“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奖学金”，培养双文化优秀人才。而作为华人宗乡会馆的最高领导机构，2012年更设立“年度杰出会馆奖”，获得众多会馆的热烈回响。这些都是宗乡总会可圈可点的业绩。

“春到河畔”更是宗乡总会的招牌活动，这项大型活动每年春节必定举行。“春到河畔”活动项目类似中国的庙会，以此保留华人的春节传统。每年出席这项活动的人数当在100万以上。作为新加坡全国人民春节期间的好去处，“春到河畔”也是春节期间新加坡的一道特色的人文景观。

吸引年轻一代是现今各会馆的主要挑战，也是宗乡总会关注的问题。为了拉近与青年人的距离，宗乡总会举办了“宗乡会馆青年达人Show”，同时联合全国青年理事会举办“青年领袖集思营”、“新加坡华语演讲公开赛”、大型电视节目“华文智多星”等。此外，还推出“宗乡汇典”综合数码移动平台。这个手机及平板电脑的应用程序，能让用户下载会馆刊物、浏览和报名参加会馆活动，以及接收最新资讯与消息，加强会员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以科技保存文献。

为了更进一步吸引年轻人，2015年2月，由义安理工学院学生的毕业专题作业，“时光老店企划”(Project Old Jewels)网站也获得宗乡合总会的支持。这个融合访问视频与资讯的双语网站，以多媒体方式向年轻一代介绍本地消失中的传统技艺，如灯笼制作、刺绣、宋谷帽与舞蛇，学生们可免费下载手机游戏应用软件，从游戏中了解富有新加坡特色的文化遗产。宗乡总会将推广这个平台，并计划为它增添更多内容。

今年2015年是宗乡总会“而立之年”。自兹而后，宗乡总会将一如既往，继续推出一系列有关华族历史与文化的活动，为普及与弘扬华族历史文化作出贡献。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宗乡总会于2013年1月在马六甲举行集思营活动，为总会的发展出谋划策

总会成立初期的工委会会议

忆总会筹备成立，怀念张良材先生

文 · 韩山元　图 · 编辑部

宗乡总会筹备成立工委会主席张良材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以下简称总会)是在1985年12月9日获准注册的，第二年1月27日晚举行隆重热烈的成立大典，而总会的筹备工作是在1984年年底就开始了。从筹备到成立，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这期间，各会馆、热心人士都为总会的成立做出了贡献，工作最繁重艰巨的应是由各大会馆代表人组成的理事会和下设的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会)。筹备总会的具体工作由工委会负责，这个团队的“队长”就是德高望重的张良材先生。张良材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好多年了，然而张先生一直走不出我们对他的怀念。

我有幸在1984年12月加入以张良材先生为主席的工委会。在此之前我就认识张先生了。1983年3月16日《联合晚报》创刊时，我成为晚报的记者兼编辑，在采访社团活动的时候见过张先生几次面，但不曾深谈。

有一回报馆主办宗乡会馆前景的座谈会，记得张先生是代表潮州八邑会馆出席，而我是以记者身份列席采访。张先生会上的发言我还记得是：新加坡宗乡会馆都面对同样的问题，青黄不接，老化情况严重，渐渐变成

了老人俱乐部，最后会因为没有接班人而关门大吉。所以，各会馆应该开一个更大的研讨会，共商生存与发展的大计。

当时，许多会馆的领导人都有跟张先生同样的想法，果然就在1984年12月2日在潮州八邑会馆举行了史无前例的“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主题是：我国宗乡会馆如何在新时代扮演更积极的角色”。185个宗乡会馆的665位代表出席了研讨会，张良材先生作为筹备者之一，为这次盛会的成功举行做出了重要贡献。研讨会取得的共识之一就是筹组宗乡会馆联合总会，随后即积极开展筹备工作。

当时，张先生领导的工委会由十多人组成，分为行政、文化、出版、学术等组，每个星期六下午在醉花林俱乐部开会。总会还没成立，当然也没有会所，张先生是这个汇聚潮州闻人的百年俱乐部的领导人之一，很轻易就得到该俱乐部领导层的同意和支持，慷慨借出宽敞的会议室让我们开会。

已经30年过去了，在醉花林开过多少次会议我已记不清了，当时大家都很乐意到那里开会。那时的醉花林还是旧房子，四周的园地空旷，绿草如茵，环境清幽，停车场又非常宽敞，室内则是窗明几净，我们开会时还有茶水招待。

最初工委会的成员有蔡锦淞、冯清莲(代表黄祖耀先生)、区如柏、柯木林等。张先生跟我们这班年轻人相处愉快。他对我们态度谦和，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代沟。

最重要的是主持会议的张先生是一位性格开朗又开明的长者，思想并不保守，也很爱护后辈。像老一辈华社领袖一样，张先生讲华语略带点潮州乡音。他讲话总是带着笑容，慢条斯理，逻辑慎密，很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工委会的成员以中年与青年占多数，而且都是事业有成的知识分子，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难免有意见分歧的时候，偶尔还会起争执。这时，张良材先生就扮演他最拿手的鲁仲连的角色，调和矛盾，化解分歧。记得他这样说：你们的意见都很有道理，如果把这些意见综合起来就是很好的建议。他还常常这样说：大家的意见不同，但是目标是相同的。在张先生面前，大家即使意见不同，但不会起冲突，也没有激烈争吵。

后来我知道，张先生担任很多社团的要务，包括潮州八邑会馆副会长、广东会馆副会长、中华总商会福利组与教育组主任等。在这些社团当中，他都是深孚众望的领导人，排难解纷的高手。

张良材先生是一位合格的会计师，自己开办一家会计公司，业务兴旺，跟潮州八邑会馆好多富豪相比，他还不算巨富，然而他跟大家一样乐善好施，为社会公益与华社出钱出力，不落人后。

张先生年纪虽大，但是不服老，他还孜孜不倦地钻研中文电脑。30多年前，中文电脑还不普及，张先生就研究中文电脑输入法，令我们这些年轻人自叹不如。

宗乡总会在1986年初正式成立后，张良材先生出任总会财政，还兼任工委会主席一段时间，筹划和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活动和主办了多次研讨会。我已离开工委会多年，张良材先生也已辞世，但张先生这位谦谦君子的音容在我的脑海中是永志不忘的。

(作者是已退休新闻工作者，现从事文史研究)

宗乡总会成立初期工委会在醉花林合照

美丽的回忆

文 · 区如柏　图 · 编辑部

我从1985年至2012年在宗乡总会当义工，多数在文化组。这些年来，接触了一些令我尊敬的长辈，与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见证了宗乡总会从零开始的成长过程。朋友们从青年的脸孔到暮年的风采，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1985年5、6月之间，有一天，《联合早报》总编辑黎德源找我谈天，他说，宗乡总会将要成立了，要组织一批人成立工作委员会，推动总会的工作，大家都是义工，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当时黎总是工委会秘书，《晚报》的韩山元与许月英也加入了这支队伍。

当时，总会没有会所，也没有受薪职员，在张良材(工委会主席，另一位主席是蔡锦淞)的安排之下，等备总会成立以及成立初期的工作会议都在醉花林俱乐部举行。我担任记录，誊清之后，请黎总的秘书郑琇锦帮忙打字(那时候报馆还没有进入电脑化阶段)。

我被安排在文化组。文化组的会议在金门会馆举行，主任是方汝奎(已故)，方百成任秘书。我们的任务是要在1987年春节过后不久举办“宗乡之夜”，是一场综合性的文娱节目，另一场是地方戏曲表演。

1987年中，我们接到了新任务，总会联合报馆、中华总商会和人协等于1988年的春节期间在新加坡河畔举办“春到河畔迎新年”，请来了北京歌舞团(其实是国家级的总政歌舞团)，台北的表演及民俗展览以及香港的红歌星徐小凤等。表演水平很高，民俗示范与展览很吸引人，每个晚上都人山人海。

1987年上海民族乐团来新演出(左为该乐团团长，著名古琴演奏家龚一，中为时任社会发展部政务部长庄日昆，右为时任社会发展部长黄根成)

这一年，文化组联同其他组一同办了一个“青春浪花”的项目。对象是大专和中学生，有座谈会、诗文展览和演出。我们组织各院校及国大的学生呈现节目，演出过后留住了多位学生加入文化组，成为新生力量。直到今天，有些当年的“青春浪花”学生还来支援“春到河畔迎新年”。

上海民族乐团带动我国华乐

这一年总会还主办了“上海民族乐团”的演出。这项演出非常轰动，带动了我国华乐的发展，酝酿了新加坡华乐团的诞生。

上海民族乐团于1987年11月6日至9日，在维多利亚音乐厅举行5场音乐会。在这之前，虽然中国民乐演奏家莅新演出的机会不少，可是，以一

团56位演奏家的强大阵容莅新演奏还是第一次，更何况上海民族乐团是拥有许多大师级名家的音乐团体。开始售票不久，门票就被抢购一空，星期日的学生场(日场)只在学校出售。

该乐团的团长是著名古琴演奏家龚一，团员包括指挥兼作曲家瞿春泉与马圣龙，作曲家顾冠仁，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与肖白镛，笛子演奏家孔庆宝，青年琵琶演奏家杨惟。此外，两位青年歌唱家曹燕珍和张梅珍也演唱中国民歌。

这次的演出有综合场，乐队专场，独奏家专场，一共演奏60多首曲目，场场曲目不同。团长龚一的古琴独奏《潇湘水云》与《神人畅》把观众带入一个久远的优美境界，那神奇的演奏把古人与今人的距离拉近了。龚一为他那把800年的古琴注入了新的生命。

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演奏的《长城随想曲》紧扣观众的心弦；肖白镛演奏《满江红》、《二泉映月》、《战马奔腾》等不同风格的乐章，曲曲俱佳，使观众如痴如醉。

此外，笛子演奏家孔庆宝、琵琶演奏家杨惟，杨琴独奏瞿建青，芦笙独奏李裕祥等，他们的高水准演奏令观众赞赏不已。作曲家顾冠仁，舞台监督区家宝，乐器管理和生活管委等个个都上台演奏。

上海民族乐团演奏会不仅风靡了新加坡观众，不少马来西亚的观众也远道而来，分享了这次高水准的演出。许多从马国南来的观众买不到门票，聚集在门外不愿离开。秘书冯清莲冒着“违规”的风险，让这些观众无票入场席地而坐，一饱耳福。

演奏会的余音

在新加坡演出期间，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知道肖白镛在演出过后会到香港，托他带东西给她在香港的女学生霍世洁，于是两人有了沟通。肖白镛到了香港完成任务后常与霍世洁来往，并结为夫妇，这是演奏会的佳话之一。

演奏会结束后，指挥瞿春泉留在本地一段日子，在福州会馆为本地会馆的华乐团作短期训练。据知，他也曾协助人协华乐团。1997年新加坡华乐团成立时，上海民族乐团的3名团员瞿建青，赵剑华和马晓兰来新加坡加入华乐团；他们是新加坡华乐团的第一批团员。

瞿建青是华乐团的首席扬琴，她也到国立大学，中正中学总校和艺术中学教扬琴。赵剑华是闵惠芬的学生，他是华乐团的首席二胡，他也是中正中学(义顺)华乐团的指挥。马晓兰是指挥马圣龙的女儿，她是华乐团的竖琴和古筝演奏家，也在中正和四德女中教学，他们三人已成为新加坡公民。

“华人传统”展览

1990年宗乡总会在莱佛士城举办盛大的“华人传统”展览，笔者有幸参与一些工作，并在《早报》写报道。当年的莱佛士城大厅很宽敞，这项活动分为静态和动态两部分。静态展览有图片展览，展示华人南来的历史，会馆的发展，传统行业以及传统节日等。

文物方面，展出了向黄亚福家族借来的黄亚福穿过的清朝官服，向冈州会馆借来的青龙偃月刀(大关刀，需7条大汉才能扛起)，广福古庙的古钟等，这些都是百年以上的历史文物。

动态方面，请来了著名篆刻家胡少敏示范篆刻手艺；我国著名的温州木雕家葛清春示范木雕功夫。退出

1990年“华人传统”展览

1990年在莱佛士城举办“华人传统”展览

宗乡总会成立初期的文化组成员(前排左一为本文作者)

电台的潮语讲古大王黄正经也来了，他率领一群儿童前来吟唱潮州儿歌，由他向观众讲解儿歌的内容。就像过去讲故事一样，吸引许多人到场听他的声音。各方言群的会馆也轮流表演地方戏曲。

“华人传统”展览一连举行7天，吸引了许多人及游客前来参观，展览的图片还出版成册。

怀念张荣

与我们一同筹组宗乡总会，成立后，在总会的成长过程中贡献良多的一些长辈已经归道山了，其中笔者最怀念的是张荣。张荣是广东会馆的会长，广东会馆是总会的七大创会会馆之一，顺理成章地，他自1986年直到2003年3月24日病逝，一直是总会的理事，担任财政或副财政的职务。

张荣(1922-2003)是一位跨越宗乡会馆、工商团体、社区组织、体育团体和慈善机构的超级义工。他是高尔夫球高手，曾荣获一杆入洞，冠军及亚军等荣衔。从1968年起，他推动以高尔夫球比赛为各慈善团体筹款活动超过100多次，其中包括为晚晴园、宗乡基金及社区团体等筹款。

谈起筹款，人人都称赞张荣为“高手”，由他领导的筹款活动，成绩一定美满。他很会营造捐款气氛，宗乡总会庆祝成立15年时，他以广东会馆的名义捐了4万元给宗乡会馆基金，为了带动捐款的气氛，他即席多捐2万元，当晚果然带动了多位嘉宾即席认捐，使筹款的金额超出了原订的目标。

张荣的办公室，文件夹堆积如山，一半是业务，另一半是各个团体的文件夹，他每天都花一个多小时阅读会议记录及文件。他认为办事要认真，尤其是那些自己当主席或主任的团体，凡事必须自己先策划一番，不能等开会的时候随便听取发言而做决定。

张荣不是非常富裕的人却慷慨捐献，带动捐款。他对所服务团体的工作认真，且平易近人，是一位服务社会者的典范。

小结

在宗乡总会服务了20余年，结识了不少当文化义工的朋友，他们那种无私的，任劳任怨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批投入宗乡总会的义工当中许多人陆续离开或退休了，只有方百成持续为总会服务30年，而柯木林虽是第一批工委成员之一，其间有一段颇长的日子，因到外地工作而中断服务，近年来他复出积极投入总会工作。文化组的沈世新也是一名元老。

在总会服务的日子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在义务工作中与伙伴们建立起来的友谊是真挚的。

(作者是已退休新闻工作者，现从事文史研究)

“石叻坡记忆之三：新加坡历史悬案”座谈会(2013年，左二为本文作者)

梦想与家园

文 · 徐李颖　图 · 编辑部

十五年前，和大部分怀揣着瑰丽梦想的年轻人一样，我渴望知识、渴望跋涉、渴望游历，渴望轻盈的梦想在告别故乡的坚实的脚步中一步步变成沉甸甸的果实。

对于出生成在北方古城的我，世界上遥远而最具异国情调的地方，莫过于北半球最南端的那方土地。于是，我就这样带着好奇的目光来到这里，在美丽的校园遨游知识的海洋，在摩登的金融区捕捉最尖端的潮流，在浓郁南洋风情的小巷探访先辈们的足迹，在信仰各异的庙宇教堂间穿梭思考。

年轻的我完全被这个城市所吸引。我想，了解它的最深入的方式就是寻找华人祖辈们的历史、并探寻他们的精神信仰。可是当我提出把研究本地民间宗教当作自己的科研方向时，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理解和支持。一个北方来的姑娘，要研究南洋最不起眼的民间庙宇，听起来那么格格不入。偶然的机会，我的研究计划得到宗乡总会的认可，他们授予我一份珍贵的奖学金，从此我真正踏上了华人文化研究的殿堂。那时，我对宗乡总会并不了解，只是感激他们伸出的热情的双手，帮助我这个外来的学子，实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个梦想。

2007年年末我学成归来，正式加入宗乡总会学术组。在这里，我不仅遇到志同道合的同仁，更通过宗乡总会丰富多彩的活动，打开了一扇通往狮城历史和文化的大门。宗乡总会，它不仅仅是所有会馆的领头人，它更承载着新加坡全体华族的历史、记忆、信念和情感。而今，融入了新移民这支新鲜血液的宗乡总会，承担起了新的历史使命、绽放出更璀璨的光辉。

宗乡总会的同仁，从来不曾忘记历史。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历史文物展览、寻访古迹之旅，使后辈得以回望祖先的足迹、铭记族人的使命，追寻我们的来路与归途。

宗乡总会的同仁，深知族群凝聚的可贵，它致力于打破族群间的樊篱，举办节日嘉年华、华社分享会、会馆走透透等活动，使不同方言群、地缘群，甚至不同种族的人相互了解、增深情谊。

宗乡总会的同仁，无比热爱足下的这方土地、为自己微小却自强不息的国家而自豪。知识竞赛、“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爱国歌曲大家唱，这些老少皆宜、益智有趣的活动，让老移民和新移民对我们生活的国土都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宗乡总会的同仁，从未忘记宗乡组织的使命，为乐龄者举办健康讲座，为青年人组织体育活动，为创业者开拓视野，为艺术家提供展现才华的舞台，为新移民提供温暖切实的帮助。

宗乡总会，是我和我的梦想落地生根的第一站。没有它，也许我的学术理想不会那么快实现；没有它，或许我不会在这里筑造家园；没有它，那些许许多多热爱华族文化、寻找族群认同的新加坡人或许还在迷茫中徘徊。

宗乡总会的三十年，是努力呵护华人文化、凝聚国人同心的三十年。是在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时，不忘初心、常念本源的三十年。而未来，宗乡总会将会一如既往地守护我们的梦想和家园！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

“三十而立”话总会

编者按：

为庆祝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三十周年，宗乡总会邀请各界代表及总会理事于2015年8月11日在宗乡总会二楼会议室召开了“三十而立话总会——昨天·今天·明天”内部座谈会，以总结宗乡总会过去的成绩，审视现在的工作，以及规划未来的发展。座谈会上，各界代表踊跃发言，积极建言，提出了很多宗乡总会发展需面对的问题，以及一些建议。《源》杂志将这次座谈会的内容整理出来，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宗乡总会理事，以及关心总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为总会多提宝贵意见，共同推动宗乡总会的进一步发展。

座谈会主席：严孟达(《源》杂志编委会主任)

与会者：吴学光(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林任君(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任总编辑)、梁荣锦(《海峡时报》高级撰稿员)、钟声坚(宗乡总会副会长)、方百成(宗乡总会副秘书长)、柯木林(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周兆呈(宗乡总会社会事务委员会主任)

总会三十年成果丰硕

严孟达：首先回顾一下宗乡总会三十年发展的一些成果。宗乡总会的缘起是1984年12月2日，当时的185间会馆的600多位代表在潮州八邑会馆举行座谈会，主题是宗乡会馆在新时代扮演的角色，会议的主要成果是提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联合总会，作为宗乡会馆的最高代表机构。1986年1月27日宗乡总会正式成立。成立以来，宗乡总会就肩负着带动华人社会，推展华族文化事业，发扬华族优良传统的使命。会员团体从最初的70个增加到今天的220个。三十年来，总会做了一些招牌活动，比如1987年和新加坡报业控股联合推出“春到河畔迎新年”，此后这项活动成了新

严孟达

加坡春节的必要节目；1990年创办宗乡幼稚园；1992年成立华社自助会；1993年成立华文课外读物理事会；1995年创立了华裔馆，同年又设立中文系高级学位奖学金；1996年设立华族贫困家庭援助金及助学金等等。总会也出版了不少的刊物，现在最重要的是《源》杂志双月刊和《华汇》季刊，这两本杂志已经有了一定的口碑和读者群。这三十年总会无论在社会活动，还是教育方面、文化方面，都做了很多。

今天总会来到三十岁这个关口，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我们对总会三十年的表现做总结的时候，想听听大家对总会三十年的发展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方百成：1970年代末，新加坡这些会馆都面临着一个存亡的问题，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小会馆开始动了。当时方氏总会邀请多个宗乡团体召开研讨会，讨论会馆应该怎么走以及走向哪里？结果就上报了，很多会馆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这样一开头，1986年就成立了宗乡总会。总会初期做的工作也不是太多，因为整个核心动力不足。后来才开始说，总会应该是辅助政府国策的不足。

柯木林：其实当总会还在筹备阶段时我就参加了，那个时候的秘书长是蔡锦淞，他给了我一个愿景，可以把总会作为文化和学术的平台。在第一次的筹委会会议上，我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既然号称是新加坡最大的一个华人团体，所做的事情必须是其他会馆难以办到的，就是要做一些大型的活动；第二要做一些有意义，可以拿得出来的东西，这个是总会的成绩册，这两点我们是做到了。至于是否能在更大层面上凝聚华人社会，或者说把华族文化发扬光大，在总会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后是否有所改变，这个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没有证据来证明在总会成立之前是这样，总会成立之后是那样。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春节。当华人已逐步倾向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春到河畔”引起整个华人社会的关注，甚至海外有人也特地过来看这里的春节怎么过的。但是还有其他节日，比如端午节、重阳节、中元节等，总会的参与非常少。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调查，在挽救整个华人社会趋向西方化这个大趋势中，是否因为总会的成立而放缓了脚步，这一点值得大家关注。

严孟达：这也是当时总会成立的背景，因为当时华文教育没有了，整个社会已经相当西化。刚才也提到，那时候都害怕以后连华人春节都没有人要庆祝了，后来才有“春到河畔”这个想法出来。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春到河畔”的确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总会接班之后，每年都办得有声有色。

宗乡总会代表谁？

梁荣锦：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会馆的活动，不过从我开始做记者的时候，差不多有三十多年前，就一直有关注和报道华社及会馆的新闻，在总会还没成立之前，我已经开始报道。我希望我们这次讨论的是：会馆到底代表什么？是代表讲华语社群，还是华族社群。我们要开始想这个问题。如果说是代表讲华语社群，那么我们

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调查，在挽救整个华人社会趋向西方化这个大趋势中，是否因为总会的成立而放缓了脚步，这一点值得大家关注。

柯木林

代表的群体会越来越缩小。这是因为教育、语文政策等种种问题造成的。如果是代表华族社群，我们真的做得不够，因为很多华族，尤其是讲不同语言的华族，他们不认同会馆及总会的工作。所以要怎么办？刚才提到会馆做了很多大型的活动，比如“春到河畔”，不过，最终的问题是会馆本身的存亡问题，如果只是想到那些大会馆，没有问题，不过还有很多小会馆。三十多年来，从我开始在《海峡时报》做采访的时候，就谈这个会馆存亡的问题，没有青年人接班，三十年后我们还在谈这个问题，问题并没有解决。

林任君：刚才提到宗乡总会代表谁的问题，我认为至少代表三大群体，第一是讲华语和方言的人；第二是认同或接受华族文化的人，这些就包括不讲华语的，只要认同或接受华族文化，他们也可能参与一些有兴趣的活动；第三个就是这几十年来，从外国来的新的华族移民，并不一定是公民，总之是华族人士。

我从来没有参加宗乡总会的工作，直到最近才成为中华语言文化基金的一个评委。所以我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面来看，我觉得总会要有这样的代表性。只要认同华族文化就可以，当然有些人他是华族，但他根本不认同华族文化，这也无所谓。

梁荣锦：但是他们不认同会馆，不认同总会，又有什么用？

林任君：但是总会的活动他也可以参加，不一定要认同主办机构。

梁荣锦：我觉得这是个比较有距离的接触。我还要讲回以前，就是我小的时候，就跟会馆有接触，因为那个时候会馆每个月上门来收月捐，有一个代办就每一家去收，虽然是几块钱，如果有丧事，他们便会出席。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就建立了一个会馆与会员的关系，现在完全没有了。当然，我不是说现在要上门收月捐，我只是想说有必要接触，从而建立关系。

钟声坚：如果从我作为一个外来移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三十年前成立宗乡总会，是很有智慧的决定。通过总会，把这些会馆统一起来，这就是智慧，而且也是一种进步；第二，新加坡的的劳、资、政三者的关系为什么能够和谐？新加坡为什么能够有一种优质的社会细胞？我对政府不太了解，我认为从新加坡的社会来说，因为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睛是中华总商会，是代表商业团体，另一只眼睛是宗乡总会，这两个机构的讯息可以直接和政府沟通，使政府不会同民间、同商团有很大的脱离。这种非官方的，软文化的沟通系统，可能它的效果比官方的效果更加有用。所以宗乡总会的存在，是有它很好的价值的。

再者，新加坡有它的特殊性，有的会馆已经有一两百年了，它可以延续下来，继续发展，这就说明它有它的价值，这个价值体现在哪里呢？现在中国有很多地方在补课，补什么课呢？比方说，一个广东人到北京去工作，你只有那几个朋友约着一起吃吃饭，或者北京人到广东来工作，他们找不到组织的，除了他自身的这些关系网络，社会没有给他建立一个平台。新加坡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优秀，只要你愿意，外来的人马上可以找到组织。比如说你是哪里人，就可以参加哪里的会馆，或者你姓什么，也可以参加那个姓氏的公会，马上可以对接。要建立这样一个诚信的社会体系，没有那么容易，我觉得新加坡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钟声坚

林任君：我想紧接着这点补充，刚才提到华社的领导机构，传统上华社的领导机构是中华总商会。社团虽有百多个，但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华文报，还有华校和南洋大学，也曾扮演华社领导角色。后来华校没有了，南大也关门了，华文报自从《报章与印刷馆法令》颁布后，就不再由家族拥有，所以不可能成为一个华社的领导机构，虽然它跟华社是保持一种共生关系。中华总商会的主要宗旨和目的在于促进华商和经济的发展，它在传统上一直扮演文化机构的角色，是因为没有其他领导机构。所以我同意声坚的说法，三十年前成立宗乡总会是非常必要的。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政府不能代表华社，只能协助促进华社发展。宗乡总会和中华商会共同领导华社，相辅相成，各有分工。

吸引年轻一代

吴学光：刚才所肯定的宗乡总会和中华总商会所扮演的角色，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觉得在历史上，过去、现在、将来它们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被肯定的。但是，我觉得梁荣锦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今天或将来，总会所要面对的，是如何去进一步开展它的工作？实际上中华总

吴学光

我觉得宗乡总会是任重道远的，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如果把它分解开来，艺术团体、读书会等等，很多不同的人会来参与。但我们始终要谨记一条，必须要起到引领社会走向一个更优雅的社会的作用，如果一直沉沦在下面的媚俗，整个机构的形象也就降低了。

商会也面对这个问题，青年一代对总商会的认同感到底有多少？如果只用英语或者华语不是很好的人，基本上跟总商会有很深的隔膜。这是两种文化的一种隔膜，宗乡总会我不太熟悉，所以今天我讲的话，有可能是在不了解宗乡总会很多当前的任务下所说的，有说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承前启后，能够让讲英语的80后这群人参与总会的活动，同总会建立紧密的联系？我觉得这不单是总会的问题，甚至整个国家也都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随着他们的文化思想的改变，认同感和效忠感都会有一定的变化。经过这漫长的三十年以后，我们如何去看待今后的三十年？

年轻人的表达方式可能已经是另外的一种方式，怎么样跟他们相处？作为父母，我已经改变我的方式，我不能强调我以前所用的方式，这个也同样应用到总会，甚至国家都要做一番改革，因为年轻一代在各种文化的交织下，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梁荣锦：三十年前，我们也是谈同样的问题，就是要改变，因为年轻一代不同了。三十年后，我觉得总会、会馆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要想的、要做的是怎么改变？

吴学光：我完全同意你说的这一点。我们现在很残酷地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局面，总商会现在最年轻的也是快五十的人了，这些人至少是在有华文教育的环境中成长的人，可是再往下看，的确有大问题。

钟声坚：这个问题是整个社会的现象。每个社会都是这样，年轻人想的东西，同成年人想的东西不一样，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总商会也好，宗乡总会也好，要尽量想办法，因为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现实就放弃，从社会来说，从政府来说，要怎么样去争取，去引导。

梁荣锦：我觉得会馆要很大幅度地改型。我观察了三十年后，并没有什么变动。我觉得总会的领导层应该想这个问题，而且要行动。

吴学光：总商会现在也在想这个问题，如何引起新的一代对总商会这样一个机构的兴趣？很多年轻人叫总商会是老年俱乐部，这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面对。面对它的时候，不能再谈辉煌的成就，这些辉煌的成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下，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所达成的。在建国以前，总商会起着巨大的作用，可是建国之后，只是一种辅助政府的作用。可是三十年之后，从辅助要走向什么样的道路，我觉得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概念。

柯木林：我总结了这个时代有两个特点：第一，这是一个挑战权威的时代；第二个这是一个对传统没有敬畏的时代。为什么会这样？ 这不是总会所能挽救的。正如刚才钟声坚先生所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外面看到所谓西方式的民主，西方式的理念，就是要挑战权威。我认为这个值得思考，是不是应该在教育方面能够稍微有点改变？

吴学光：但是我觉得整个新加坡的文化结构，经过这三十年的变化，已经基本上成型。我们还是要很勇敢地去面对目前的这个现实，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谈的已经不是教育部该怎么样，这是有很大的困难的，而是说作为宗乡总会，作为中华总商会，我们还能做什么？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考虑，比较现实一点。我们的责任就是说有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我们也不要去看大方向，政府要改革什么，这不是现在可以谈的问题。而是既然

有这个的现象，既然是一种辅助性的机构，那就要产生一种辅助的作用，而不是整个扭转的作用。

严孟达：其实，政府希望宗乡总会发挥的作用，就是保存华人社会的色彩，要不然华人社会的色彩会越来越淡。

钟声坚：说实在话，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多东西要来新加坡学习，新加坡所保存的这些文化比中国还丰富，新加坡在传统保留的方面还是非常完整的。

严孟达：问题是即使是保留下来，年轻人也认为这是古老落后的东西。

钟声坚：我觉得到一定的程度他们还是会欣赏。

挑战和机遇并存

林任君：刚才说保留华人色彩，我觉得这是宗乡总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新加坡的华族占了大部分，如果没有这样的机构来推广带有本地特色的华人文化，那是不行的。比如“春到河畔”到现在为止，农历新年气氛还是很浓的。还有中秋节，当然也带着商业意义，但我认为这也无妨，有人推动才有生命力，才能保存。宗乡总会过去都有在做这样的事情，今后还可以扮演它的角色，所以也不需要太悲观。中国的影响力增加之后，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也会随之增加，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局面。我们或许不应像过去那样担心太过西化的问题，现在已经力挽狂澜了，也许有一天我们反过来要担心太过中化的问题，我觉得历史是在向前发展的。

吴学光：我觉得总会的功劳和贡献，尤其近几年来，是不可否定的。实际上现在要谈的是接下来总会的方式方法的问题，我反而对总会接下来所推动的东西更容易被人接受是有信心的。为什么这样想呢？在我们的年代，英文教育和华文教育是分得清清楚楚，这两边基本上没有交融。经过三十年的融合后，我现在看我的孩子讲英文和讲华文之间没有任何隔膜了，他们完全是能够沟通的，中间也没有存在你是华校生还是英校生的问题。我反而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去推动文化活动，更容易被年轻人所接受，只是方法问题而已，因为抵触心态没有了。

周兆呈：我非常同意吴会长的看法。从一个横向的切面看，当我们在谈新加坡的华族文化和华族传统的时候，往往是只看到自己社会的问题。但其实横向跟其他社会比较，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其他华人社会其实都面临相似的问题，就是年轻人对不同文化的一个接受程度。但是在新加坡，我举个例子，就是华艺节的时候，因为华艺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比较优秀的话剧、舞蹈、戏剧等，你会发现其中的观众很大程度，或者说很大比例是年轻人，而且很多是受英文教育的年轻人，来看用华语表达的戏剧。换句话讲，他们对华族文化，或者是说用新形式呈现的华族文化是有兴趣的，而且是有接受能力、欣赏能力和鉴赏能力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并不是意味着说总会或者其他华人社团承担的传播及推广的功能到了一个末路，而是说要怎么用一种新的方式，采纳新的途径来推广，来让年轻人接受。

周兆呈

另外从纵向的历史来看的话，我觉得刚才梁荣锦先生提到总会或者其他宗乡团体的代表性的问题。我觉得即便是五六十年代，或者更早的年代，华文教育比较强的年代，甚至是受华文教育人数比较多的年代，宗乡会馆所具有的会员的代表性也不会是说全民都参与宗乡会馆，这是整个社会的现实，就是组织一般都是少数的，不是社会绝大多数参与的事情。

华族文化中心可作文化臂膀

梁荣锦：我在英文报馆里工作，天天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讲英语社群不认同宗乡会馆。因为我从小对宗乡会馆、华文华语、华族文化就有感情了，所以我写得起劲，但我的同事们都不感兴趣。

吴学光：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海峡时报》做一些调查，或者组织一些座谈会，请讲英语的社群谈谈，他们对于宗乡总会这样的组织，希望能从中看到什么，或许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同一频道上讨论事情，我觉得应该聆听多频道的声音。

林任君：这个过去有很多人在讲，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容易行得通。刚才提到华艺节，我是非常同意，华艺节这样的节目，其实就是宗乡总会可以拿过来做。现在成立了华族文化中心，它和宗乡总会是两位一体的，它可以作为宗乡总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臂膀。华族文化中心其实就可以扮演吸引不讲华语的群体的角色，甚至吸引非华族。如果滨海艺术中心愿

意合作的话，像华艺节这类标杆性的活动可以吸引各个群体。华族文化中心可以做的有很多，比如说推广不同层次的华族文化。有了华族文化中心这个臂膀之后，宗乡总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文化影响力，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钟声坚：我想华族文化中心是有很大帮助的，可以建立一个更好的平台。刚才谈到挑战，这是要面对的，传统的东西对年轻人没有很大的吸引力，那么这方面我们要去主动争取。刚才学光说的，我也是认同，我们也不需要太过悲观。因为现在华社也是跟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在这个大背景下，华族文化不是越来越没落，而是有一定的声音。

严孟达：我觉得现在是中国崛起的时候，它也要输出文化方面的软实力，新加坡对中国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很多高水准的艺术表演，很多地方戏，在中国本身是不容易看到的，而在新加坡，像华艺节、春到河畔等活动带来很多高水准的表演，这些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软实力的输出。

林任君：用历史的长镜头来看，现在是大势所趋，现在反而是要准备怎么样应对中国文化大潮的冲击。可能现在宗乡总会和华族文化中心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样保留本地华族的南洋性格，或者说华族文化的南洋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的文化之所以有今天这样多姿多彩，既继承自中国文化，也结合了南洋、西方的文化，这也是我们跟中国的文化不同的地方，恰恰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东西，才有我们的吸引力。如果不保留这种南洋性格的话，将来可能被另外一股浪潮冲击，我们就可能失去自我。

我觉得这是总会这个时候应该做

林任君

的，应该发展不同层次的华人文化，刚才提到的华艺节是高端的。像这些标杆性的节目，如华艺节、春到河畔，还有华族文化节，新谣等，由宗乡总会和华族文化中心来领导是最合适的。还有一些比较大众化的、草根的文化，像中元节、歌台等具有本地南洋性格华族色彩的，这些我觉得宗乡总会都可以推广，当然不是要全部自己做，不过至少可以支持。甚至是本土电影，也可以考虑。

另外，从组织结构上看，宗乡总会是以血缘和地缘为主，非常少的准会员，我觉得宗乡总会可以扩大它的会员，招收一些主要以华语为主的团体，包括文化团体，甚至是个别会馆办的学校的校友会，扩大影响力。

周兆呈：准会员其实已经有了，可能一些艺术团体一看是宗乡总会，觉得这个相关性没那么强，就没有参与。

梁荣锦：主要的是宗乡总会有什么可以吸引它们？为什么它们要参加？

林任君：比如华族文化中心这个资源，如果是准会员的话，可以优待，比如场地可以有优先权等，可能还有一些其他资源可以提供给它们。

梁荣锦：好像很多会馆还没有成为总会的会员，可能有超过一百个。我觉得要让他们成为会员后，觉得很骄傲，他们才会有认同感。怎么样才会产生认同感？就是要树立宗乡总会的品牌了。

柯木林：刚才任君兄说的一点我是相当同意的。我觉得宗乡总会可以成立一些分支机构，一些文化团体可以参加这分支机构。

吴学光：作为一个文化的提倡者，既要普及文化，但又不能媚俗于文化，因为文化还有倡导作用，要引领一个社会走向更优雅，更高的一种艺术境界。所以刚才说把总会分成几个领域，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不能由一个宗乡总会体现出上中下三个层次。作为一个华社的领导，必须还是要在优雅文化上提升人民的素质，提升人民的欣赏水平，但是往往这是吃力不讨好，而且也是曲高和寡的，可是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做，所以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高人民的素质。我觉得宗乡总会是任重道远的，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如果把它分解开来，艺术团体、读书会等等，很多不同的人会来参与。但我们始终要谨记一条，必须要起到引领社会走向一个更优雅的社会的作用，如果一直沉沦在下面的媚俗，整个机构的形象也就降低了。

林任君：我同意这一点，就是兼容并蓄，要让这种多元性存在，提升到所谓的优雅境界。比如说歌台，我这几年主管所有华文报，有了多一点接触，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低俗；再比如说新谣，新谣有它的优雅，这些都应该是宗乡总会统揽的对象。

钟声坚：我们要把民间的工作保留并提升，也不能说用高雅去取代它，它有它的民间特色。

梁荣锦：因为我的圈子，大多是

梁荣锦

讲英语的，他们不是很重视华社。所以我刚才谈总会的代表性，要代表全体华族，所以怎么把讲英语的华族社群融进去，让他们认同总会，当然不是要迎合他们，而是要争取他们。

林任君：我觉得让它自然的发展，可以通过文化的吸引力，潜移默化地融合。

周兆呈：还是以华艺节做例子，在这样一个公共空间里面，你会遇到不同背景的人在同一个场合，不管是读早报的，还是读海峡的，你都会在那边遇到，一个共同的兴趣把他们凝聚在一起，而不是说因为你们背景不同所以要把你们融合。

方百成：总会也做过集思营，谈过这个问题。我们就希望成为一个华社最高的领导机构，如果能够的话，成为一个新加坡华族的中心点。现在总商会也在转型，慢慢偏向做商业的，以前负责的文教方面，可以和总会整合，我们过去有很多活动是两个机构都参与的。融合讲英语社群是没有错的，包括现在华族文化中心，也在谈华族文化是什么。我最近也提议，华族文化中心还没真正往外推展活动的时候，应先找准定位。但既然是华族文化中心，就一定要有华人文化的元素。

融合新移民

梁荣锦：以前，整个华人群体分为两个，受英文教育的和受华文教育的，现在因为国家政策的改变，这个划分就模糊了。不过因为有了新移民，现在又有了第三个华人群体了，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他们有自己的背景和文化。他们很多也不要参加宗乡会馆，可能他们来的地方跟旧移民的不一样。

方百成：但是我个人觉得，新移民可能就是生活习惯有很大的不一样，但在文化认同上和我们的差别不大。

钟声坚：从宗乡总会来说，还是要包容进来，让新移民找到一种归属感。

周兆呈：我觉得新移民从人数与他的组织心态来讲，参加社团、参加总会也好，还是少数。华族新移民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人数是最多的。坦白讲，很多人离开大陆来到新加坡，本身都是不大愿意参加组织的，一是因为很多人对团体性的组织有逆反心理，第二个是他也不需要。现在移民的形态发生很大改变，比如说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还有英文能力，都跟过去很不一样，对这些社团没有什么依赖，但是也有一些新移民愿意参与新移民社团、本地社团，包括总会举办的活动，这里面有各种原因，有的是一种社交的需要，有的是事业、职业发展的需要，还有回报社会、参与、融入社会主动的意识，这里面有不同的背景。总的来看，新移民对总会的认识还不是特别的深，对于总会的历史、功能、角色、地位等等，很多人其实还不是很了解。即便是加入到总会成为会员的一些新移民社团，比如说天府会、华源会、天津会，他们的负责人因为和总会打交道比较多，对总会比较熟悉，但有一些如果没有参加总会的活动，其实也未必了解总会历史的脉络，功能和角色。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总会对新移民还有一个积极推动，引导融入的角色去扮演，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扩大影响力，任重而道远

吴学光：我觉得今天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三十年来，宗乡总会发展到今天，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但是时至今日，世界的局势变了，如何去看待今后三十年宗乡总会的发展，这个从战略上，战术上都要有一个重新的考量。那么我的乐观是什么呢？我的乐观是现在已经没有英校生和华校生的分别，也没有对华族文化有很大的排斥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看待宗乡总会未来的活动？要发扬光大华族文化，在战略上、战术上有什么考虑？

方百成：这是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会馆的存在和新加坡人口的转变相关。年轻人对所谓社团是什么不是很清楚。像宗乡总会这样一个机构，以什么姿态出现，反而是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时候了。必须得改变自己，否则没有办法接触其他人，然后要年轻化，因为年轻人的世界，和我们是不一样的。要从一些成员开始年轻化，因为我们想不出年轻人要的东西，但是也不能放手完全让他们做，所以这才是困难，要年轻也要保持会馆的精神。

林任君：刚才提到，总会应该扩大会员的类别，要吸引非血缘、非地缘的团体，如果其他团体能够通过总会得到他们单独得不到的好处，可能可以往这方面思考。

总会对于被它所团结的群体而言，有什么利用价值？我们谈文化，谈教育，总会有什么价值来跟人家说文化？从总会这边又能得到什么好处？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它却是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方百成

方百成：一个团体、一个组织，让别人来认同你，来参加、走进来，你必须得有你的价值，你的价值在哪里？你被利用的价值在哪里？如果没有被利用的价值，很难吸引人来的。总会对于被它所团结的群体而言，有什么利用价值？我们谈文化，谈教育，总会有什么价值来跟人家说文化？从总会这边又能得到什么好处？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它却是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林任君：我刚才说，华族文化中心是和总会两位一体的，现在要吸引一些文化团体入会，将来可以在使用华族文化中心的会所、场所，有各种优先权，可能这就是一个诱因。宗乡总会跟华族文化中心结合在一起，可以发挥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方百成：这是一个机会，但是要看领导层有没有办法负担这个责任。要团结这些文化团体，它们的第一个问题可能会是，总会可以赞助我们吗？场地可以免费吗？所以如果你能够符合这些群体的要求的话，有人愿意留下来。宗乡总会如果能结合华族文化中心，去做这样的事情，就可以团结很多的华社，尤其是文化团体、艺术团体，如果要华族的文化能够延续，这点是很重要的。

严孟达：刚才我们谈到要做一个调查。通过这么多的活动，目前总会已经有一定的形象了。可以调查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对总会的印象是什么，在新时代总会对年轻一代到底还有没有影响力。

柯木林：过去的调查都局限于会馆，这次要全方位的，否则得到的数据是不正确的。当然有专业公司在做这事，但是我们必须设计调查问卷。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成立分支机构，一些宗乡总会不方便做的事，可以由分支机构做。我也提过要成立兴趣圈，有些受英文教育但对华族文化非常感兴趣的人可以参加。这等于总会有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对华社，另外一个是对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兴趣圈可以做这事。

周兆呈：2010年蔡会长接任总会时也提到了建立兴趣圈。

柯木林：但是一直没有真正做起来！

严孟达：还有就是刚才所讲的，扩大准会员。以后总会的活动可以邀请这些文化团体参与，让他们先接触到总会。

方百成：其实宗乡总会早就这样做，但是宗乡总会内部本身有个问题，就是总会目前所进行的活动，都需要经费，而宗乡总会本身最弱的一环就是没有钱。总会的活动经费本身还须有向政府申请赞助，因为申请政府经费是有一定要求的，这些要求的条件可能跟我们推展的，跟各个会馆要做的，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宗乡总会最大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就是必须得先壮大自己，不然每一样要推展的活动，都受到经费的困扰。

林任君：是否可以利用中华语言文化基金的钱来搞一些标杆性的活动，一部分可以拿来做标杆性的活动，一部分可以拿来资助这些文化活动。

严孟达：座谈会进行了差不多快两个小时了，大家都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见。那么，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整理：欧雅丽)

2015年“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结束后秘书处职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合影

锦上添花
——宗乡总会秘书处的改变

文 · 马进强　图 · 编辑部

宗乡总会秘书处是总会的手与足。近30年总会秘书处管理层没有很大的改变，基本上帮助总会保留了它的传统价值观与历史资料，为这几年来从新出击的宗乡总会，奠了一个很稳固的基础。这还得归功于前辈们的努力，还有不久前荣休的执行总秘书林文丹女士。

有了良好的基础，新行政的改变就成锦上添花了。让秘书处员工了解这是一个不带个人主义的组织，每个成员的工作都是为了整个宗乡团体。秘书处的工作是执行总会的宗旨、愿景与理事会上规划出的方向，也要时时刻刻牢记传承和弘扬华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但要在新一代新加坡人里挖掘，同时培养出有这种理念与有相关工作经验的员工，谈何容易。所幸的是，形式上的改变，加上顺应现代人能接受的管理理念，我们的团队已经渐渐地步入了这个方向。如今的秘书处也在积极地同会员会馆多方面沟通，互相参与各自组织的活动。

另一个改变是秘书处把整体工作做了重新的调整，让语文比较驾轻就熟的部门接手活动组比较耗时的新闻稿，确实立刻取得成效，员工的工作分派顿时平衡。在费用上，采取资源共享，灌输商业管理理念也为总会节省了一些费用。

总会也面对缺乏运用华文的环境。因此，总会尝试在不同领域提供机会让新一代新加坡人有更多机会接触华文，《源》杂志就是其管道之一。从总会成立就开始出版发行的《源》杂志，近来就在整体设计方面做了一番的改变：采用协调色，使图文色彩和谐，版面清新、大气，加上一些英文翻译的文章，确实收到不少的赞赏。学校、书店、社团的订阅在逐步递增。

新一代的人，有新一代索取知识与信息的渠道。手机运用程序(App)是个不可缺少的渠道。宗乡总会在短短的一年内就有了三个App，从收揽各会馆的刊物，到历史走廊的数码化，可见总会是与时共进的。重要的是，在这三个App中，竟有一个是针对年幼儿童与青少年，总会的高瞻远瞩，可想可知。

“中庸”是华人处世之道，更是一个烙印在宗乡总会秘书处的原则。秘书处会以此原则，行事尽力做到不偏不倚。同时，新的管理方式，使总会的运作更加有效，活动更加精彩。愿这锦上添出的花，是新一代新加坡华人灌溉出来的一朵漂亮的好花。

(作者为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执行总秘书)

各司其职 和衷共济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各部门介绍

文图 · 编辑部

总会大厦鸟瞰

产业委员会

自1997年5月起，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永久会所就设于大巴窑二巷(前兴亚启蒙学校校址)，其中包括了办公室、大小礼堂、会议室等。产业委员会于2012年9月成立，总会大厦的装修工程也于2012年完成。大厦在装修后整体面貌焕然一新，秘书处办公室也变得更加宽敞舒适。

产业委员会主要负责总会秘书处的场地及产业管理。其中包括设施齐全的大小礼堂、历史走廊展览以及九龙壁。总会大厦的大礼堂举办过无数的活动，如每年的“新春团拜”、“杰出会馆奖颁奖典礼”等，大礼堂也可出租，为各种大型活动提供一个设施完善的活动场地。总会大厦的小礼堂也是一个多功能的会场，《新加坡华人通史》的新闻发布会以及今年的“青年团与部长交流会”都成功地在小礼堂举行。装修后的总会大厦也修建了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捐赠的九龙壁，为总会增添了许多光彩。

为了继续推广华族语言、文化及价值观，总会大厦原有的内部露天部分也改建成封闭的天井，并设计为历史走廊展览厅。历史走廊展览介绍了六大方言群的华人传统节日与习俗、华人社群的团结与互助、总会成立的历史以及华社先贤的史迹等内容。

于2012年底设立名为“光阴的故事”的历史走廊， 把浩瀚历史资料，图文并茂地展现出来，深具教育意义。参观者能够近距离了解新加坡华社的百年变迁，内容分为七大部分：追本溯源、下南洋、分担风雨、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捐赠给宗乡总会的九龙壁

大厦在装修后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宗乡总会大厦的局部景观

百年树人、落地生根、会馆团结和展望未来。

为了拓展华社的文化与文创产业，宗乡总会发起并筹建了“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该中心的成立，其宗旨是希望不同华社团体之间将会有更加紧密的联系，共同打造华族文化的品牌，丰富我国的多元文化风貌。产业委员会也负责协助监督文化中心的建设工程。

会所内的历史走廊

印度传统文化馆之旅 (2015)

社会事务委员会

社会事务委员会旨在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加强不同种族间的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

为此，社会事务委员会组织了如下各类活动:

为了帮助新移民了解本地的法律、医疗体制等知识以及认识新加坡社会的不同面貌，委员会自2011年开始，定期举办“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历次讲座的主题包括《新马民俗的传承》(2011年10月)、《新加坡的医疗和保健制度》(2012年4月)、《如何更好地安家置业》(2012年7月)、《善用新加坡市场投资理财工具》(2012年11月)、《如何在新加坡创业》(2013年2月)、《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历史脉络与商务环境》(2013年4月)、《南洋咖啡香》(2013年7月)、《读懂新加坡国民的集体潜意识》(2013年10月)、《印度族歌舞风情》(2014年4月)、《成功完成与新加坡社会的融合》(2014年6月)等。2015年4月的讲座更首次以“电影放映暨交流会”的方式进行，通过放映本地导演郭智轩的《霉运大厦》及与剧中演员郭亮的交流，让出席者更深入了解新加坡。

为了让新移民有更多机会认识各宗乡会馆与我国的历史文化，社会事务委员会也定期举办“会馆

“认识新加坡”知识竞赛(2015年)

走透透”与“新加坡文化之旅”活动，带领新移民参观会馆及文化古迹。“会馆走透透”活动曾带领新移民参观了新加坡南安会馆及凤山寺(2011年10月)、新加坡福建会馆及天福宫(2013年4月)、冈州会馆(2013年11月)、中央锡克庙(2014年4月)、新加坡土生华人博物馆(2014年11月)等。除此之外，为促进新移民对本地民俗的认识，社会事务委员会也趁农历七月中元节之际，举办到韭菜芭城隍庙三清宫与应和会馆双龙山参观的“中元习俗之旅”。继“会馆走透透”大获好评后，委员会也决定将活动范围扩大，于2015年三月起开展“新加坡文化之旅”的系列活动，分阶段走访我国四大族群的地标性建筑及文化遗产，先后走进Eurasian Community House(2015年4月)与印度传统文化馆(2015年5月)。

此外，社会事务组每年也举办“端午节嘉年华会”，邀请会馆、新移民以及各族群参与，为不同的文化群体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认识和融入的平台。历届嘉年华活动精彩纷呈，包括多种族共同参与的文娱表演、趣味旱龙舟比赛、小朋友发挥绘画才能的全国中小学美术比赛、摄影发烧友的摄影大赛，各会馆和友好团体参与的籍贯特色小吃美食廊。精彩的表演，丰富的活动，令人食指大动的小吃，让每一个参与者，流连忘返。

为了庆祝新加坡建国50周年、宗乡总会成立30周年，社会事务委员会经过一年的精心筹备，联合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和联合早报网，于2015年成功举办了“我的新加坡故事”微电影大赛。这次比赛吸引了116部作品，参赛者年龄横跨14岁到84岁，参赛作品包括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台湾、巴西、英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本地电影制作爱好者、海内外心系新加坡的国人和友人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艺和表达新加坡记忆及情感的平台。

社会事务委员会也举办多届“认识新加坡知识竞赛”，让新移民和本地居民更加了解新加坡社会及其独特的传统民俗、文化生态和生活方式。2015年，比赛历时八个月，87个团队参与了角逐。在学习和比赛中，新移民与本地各种族居民充分交流，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认识新加坡知识竞赛”还结合总会主办的“端午嘉年华会”与人民协会举办的“融合嘉年华会”活动，相得益彰、多姿有趣。“宗乡掠影”摄影比赛则记录了总会各项精彩活动以及人物风采等具有华族传统文化元素的精彩瞬间。

尊老敬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传承多年的传统美德。社会事务委员会怀着拳拳之心，从2013起，每年与青年委员会、华社自助理事会联办关怀乐龄Project C.A.R.E.活动，让年迈长者感受到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的尊重与关心。历次活动都有近千老人参与，志愿者报名屡创新高。

值此新加坡50华诞举国同庆的日子，社会事务委员会放眼未来，将继续加强华族文化的传播和弘扬，通过多种形式鼓励新移民与本地社会不同种族间的交流和融合，为新加坡的社会和谐、国泰民安，做出不懈的努力。

华社关怀乐龄日(2015年)

端午嘉年华会(2015)

会员事务委员会

顾名思义，会员事务委员会旨在加强会员之间的凝聚力，并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促进会员团体之间的沟通，加强彼此的了解和联系。与此同时，委员会也肩负招募新会员的重任，尽力为会员团体提供支援，解决难题。为了更有效的了解会馆，服务会员，委员会也挨家挨户走访会馆，通过近距离交流，达到团结会馆，共创辉煌的目标。

自2011年起，宗乡总会领导及会员事务委员会便走出大巴窑，到各个会馆聚集的地区举办“会馆分区交流会”，希望借此机会加强区域团体间的交流与合作，整合资源，共同促进会务发展。分区交流会成功在全岛各个区域举行，部分华社领袖、部长、议员都曾担任座上嘉宾，为与会者排忧解难。会员团体亦踊跃响应，现场反应热络。

今年，会员事务委员会把触角深入更多的宗乡组织，邀请非会员出席团体交流会，互相交换意见和看法。继一场“广东团体交流会”获得好评后，委员会再接再厉举办“琼属团体交流会”，紧接着还计划为其他地缘和血缘组织举办类似活动。委员会盼能借此平台拉近宗乡总会与各宗乡社团的距离，增进彼此情谊，拓展合作机会。

为了鼓励宗乡团体在弘扬华族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会员事务委员会设立“年度杰出会馆奖”，至今已迈入第四届。自奖项颁发以来，已有17间杰出会馆膺此殊荣，同时另有17间优秀会馆获得表扬。获奖者来自各个宗乡组织，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都有亮眼的表现。值得一提的是，在评选的过程中发掘不少“小刀锯大树”的例子，证

宗乡总会30周年高尔夫筹款赛

健康嘉年华会2015

2014年度杰出会馆奖得主与主宾合影

明无论规模大小，只要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也能有一番作为。在最新一届的“年度杰出会馆奖”中，评审团增设了“推展青年事务”的新评选标准。令人深感鼓舞的是，不少会馆已改头换面，积极提携新生代成为会内中坚分子，并成功推出许多有利于会务发展、提升形象的政策与活动。这无疑是为华社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也肯定了奖项设立的意义。

为了让会员团体对“公益机构”(IPC)有更全面的认识，会员事务委员会特于今年6月举办“公益机构”分享会，活动也得到陈振声部长的支持与参与。受邀专员在会上分享专业知识，为与会者讲解公益机构的概念及福利并同时解答疑问，令大家受益匪浅。

除此之外，会员事务委员会也举办了不少常年活动，如：分享医药保健资讯，提升健康意识的“宗乡总会健康嘉年华”；旨在加强联系，促进情谊的“宗乡杯高尔夫球赛”；推广奕棋文化的象棋比赛、围棋比赛等等。活动多姿多彩，力求与时俱进，让会员团体与宗乡总会一同成长，自我增值。

多年来，会员事务委员会竭尽所能为属下会员团体提供协助，谋求福利，同时也积极联系全国各大宗乡组织，以建立一个强而有效的联络网，共同促进华团华社的发展。委员会诚挚感谢众团体予以的鼎力支持，每一份鼓励都是前进的动力。展望未来，会员事务委员会冀盼能秉持同样的信念，与会员团体们携手共进，开拓进取，一同迈向新里程碑。

三十而立。

文化委员会

文化委员会秉承过去的传统，致力于传承和发扬华族文化的工作，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推动本地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它也提供一个平台，让各会馆的文艺团体有机会合作，组织大型演出，让各组织间相互切磋交流，互相激励，以提升本身的表演水平，为我国建立更好的文化氛围献力。

自2013年以来，委员会在原有的常年活动中，添加了“走入校园”这个项目，希望把华族文化，进一步带入校园，让莘莘学子对华族的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委员会曾两度到依布拉欣小学，分别介绍福建儿歌以及传统粤剧，让同学们认识这两个方言族群的民间艺术，并有机会亲自向主讲老师学习，同学们反应热烈。委员会也在德明中学举办“华族文化习俗”的讲演，同样受到师生的欢迎。期间，委员会主办了一场由黎沸辉和詹辉朕老师主讲的“词曲创作与表演艺术”讲座，与会者无不获益良多！今年7月21日，委员会联合永定会馆，到传统的英校——莱佛士女中，进行了一场对各族学生的讲演，广泛地介绍了中华文化，内容包括武术、国画、书法、华乐、棋艺等，希望非华族学生也能和华族子弟一起，领略华族文化的优美。而这，也突显了宗乡总会和属团间紧密的合作关系。

常年的活动方面，委员会把“爱国歌曲大家唱”这个项目，打造成与民同乐、大家齐欢唱的国庆文娱演出。许多参与的民众，每年都会期盼这个节目的到来。2015年的“爱国歌

新春团拜(2015)

曲大家唱”，加入了乌克丽丽乐团表演，为参与的民众带来了更多惊喜。

“乡情乡韵”是文化委员会的另一个重点活动。2013年，委员会制作了一台深获好评的华乐专场演出，2014年则以各方言族群的儿歌和民谣为主轴，制作了一场“童真雅韵”音乐晚会。今年，委员会首次打破传统，以类似音乐剧的形式，把建国五十年来，新加坡如何形成特有的人文色彩，用历史图片和各个时代在我国流行过的歌曲，通过祖孙之间的对话、歌曲和舞蹈一一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委员会第一次试图把特有的新加坡文化，系统性地用舞台音乐剧般的表演，用各个时期具代表性的曲目来讲述国家、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让年青人一探我们走过的足迹。

另一项重点活动为“新春团拜”。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通商中国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办的“新春团拜”，今年主办方特邀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莅临担任主宾，与大家共叙情谊，喜迎新春。其他出席的贵宾还包括颜金勇部长、陈振声部长、杨莉明高级政务部长、李奕贤高级政务部长、沈颖政务部长、刘燕玲政务次长、国会议员以及外交使节。

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是需要长时间耕耘和散播的事业，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正是肩负这个重任的主要民间组织。当然，文化的内涵不只是语言、艺术、习俗；也包括建筑、饮食、社会行为规范等等。文化委员会当然希望在整体传承与发扬华族文化的同时，兼具融合各方言族群、各族同胞的文化、习俗。因此，文化委员会希望在财政上获得更大的支持，同时能更灵活自主地调整服务对象和范围，以便发挥更好的效能。两年来委员会作出了一些新的尝试和努力，冀望将来能更具创意思维，在总会和各属团的支持下，为我华族文化加倍努力。

《乡情乡韵》(2015)

《爱国歌曲大家唱》(2015)

“家书抵万金”新加坡侨批文化展座谈会(2012年)

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旨在推动新加坡华族历史的学术研究和史料整理，尤其重视新加坡华人移民历史及华族会馆史料，并通过出版专著，举办相关系列活动，提高公众对华族历史和传统的认识。除了联系海内外学术机构，共同推动“保存华族史料”与“普及历史知识”的工作外，学术委员会亦为宗乡总会的出版期刊及相关活动出谋划策。

自1986年成立以来，学术委员会(原称研究与出版组)即开展一系列活动，并整理出版了一批历史专著，如《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1986年3月)、《新华历史人物列传》(1995年11月)，及拍摄首部华人历史记录片《抚今追昔》(1987年6月)等，希望借此让新加坡华人历史和文化得到普及与传承。

2012年至今，委员会已成功举办四期“石叻坡记忆”系列讲座。讲座内容包括我国四座“历史名楼”和“星洲四才子”的故事，侨批文物展和研究心得分享，以及与公众一同探讨新加坡历史上悬而未决、尚存争议的事件。系列讲座得到公众的热烈支持与相应。2015年10月，委员会将继续这一系列，举办《名人与庙宇》座谈会，旨在带领公众探索人和庙的情意结，领略南洋庙宇文化，提高公众对新华历史的认识与兴趣。

学术委员会深刻了解，华人历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突破地域的限制。为了加强新马两地学术领域的联系与互动，2013年9月，委员会与槟城韩江学院合作举行了以《百年盘点：

《关公文化》讲座(2014)

峇峇人物与文化》为主题的三州府论坛，邀请本地、马来西亚和中国学者参与，盘点百年来峇峇人物对南洋的贡献和给后人的启发。2014年8月，委员会邀请了中国著名历史人物画家曾成聪、四川成都武侯祠研究员梅铮铮担任《关公文化》讲座的主讲嘉宾，吸引了很多对关公、三国文化感兴趣的新加坡民众，反响热烈。

今年11月，为庆祝新加坡共和国成立50周年暨宗乡总会成立30周年，宗乡总会出版《新加坡华人通史》专著，由学术委员会主任柯木林担任主编。这本书涵盖了14世纪迄今新加坡近700年的历史，筹备工作耗时三年，动员了新、马、中、港、澳(洲)37位文史学者共同编撰完成。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华文书写的新加坡华人通史，这本书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性的疏理，可以让读者从全方位、多角度了解新加坡华人的历史与发展。为了方便更多新加坡人阅读，该书也计划出版英文版。

多年来，学术委员会致力于新华历史的研究与整理，所出版史著力求做到保存史料、勘正史实，同时也为文史学者与大众提供了分享与交流的平台，各系列座谈会反响踊跃。学术委员会的工作也得到学界的肯定，被厦门大学认可为学术研究合作伙伴。展望未来，学术委员会亦将一如既往，继续推出一系列有关新加坡华族历史文化的活动，为普及华族历史与弘扬华族文化作出贡献。

青年委员会

青年体育节篮球赛

自1996年起，宗乡总会为了因应社会的变化，成立了青年事务组(后改为青年委员会)。青年委员会负责与会馆青年组织联系与交流，旨在推动和促进青年人参与会务及凝聚会馆的青年。委员会通过举办各种青年活动，如“青年事务组15周年庆典暨青年论坛”、“宗乡会馆青年达人秀”、“青年领袖集思营”、“关怀乐龄活动”、“宗乡青年体育节”、“青年团与部长交流会”、竞走活动等，为会馆青年人搭建接触与交流的平台。青年委员会还设立了面簿，以新颖和创意的手法，增进与青年之间的互动，从中吸引更多青年人认识及参与会馆。

“承先启后，共创未来”是青年委员会提出的口号。它寓意着前辈的殷切期望，承载着他们传承下来的智慧。委员会希望从这一步开始，偕同各会馆社团的青年组织，一同开启未来的那扇门，将会馆的价值、华族文化的精髓传承下去，一起为会馆乃至华社的未来作出贡献。

在近几年来，青年委员会努力通过一系列精彩的活动，让青年对宗乡会馆产生兴趣与加深了解，鼓励青年积极参与在宗乡会馆举办的活动。委员会更希望提供青年之间交流与互动的机会，相互交流思想和经验，以达到团结

2014年青年集思营 (马六甲)

各会馆社团的青年组织的目的。为了加强青年组织之间的联系与了解，青年委员也举办“青年团与部长交流会”。2015年的“青年团与部长交流会”邀请了黄循财部长来分享不同课题的看法，令参与者获益良多。

为了增进会馆青年的交流和友谊，加强彼此的合作，协助和鼓励会馆青年团共同开展体育活动，培养年轻人团结友爱积极进取的精神，青年委员会举办了“宗乡青年体育节”。今年将是第三届举办“宗乡青年体育节”，委员会盼能借此平台增进会馆青年的情谊，促进彼此的合作。

委员会在2014年也与华社自助理事会(华助会)联办了“关怀乐龄活动”。这项社区活动号召了700名义工来陪伴自各福利团体的500名乐龄人士，游览位于滨海湾花园的“花穹”以及到万兴楼用餐。陈振声部长、颜金勇部长也参与了这项社区活动。这次的社区活动促进了青年与乐龄人士的交流，也强调了委员会对建国一代的重视。

青年委员会也积极与各青年组织联系，不仅定期与中华总商会、通商中国、新移民留学生组织等会面，探讨合作的计划；同时也与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前身是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以及全国青年理事会等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成立前的大义走(2005)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宗乡总会奖学金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是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前任主席黄祖耀所倡议，目的是为了提升我国的华文水平。

黄祖耀在2004年为祝贺李显龙接任总理的晚宴上，正式宣布宗乡总会和中华总商会联合成立“中华语言文化基金”，以协助民间组织推动中华语言和文化的发展。两个机构为基金筹得800多万元，加上教育部一元对一元的资助，基金一共筹得1600多万元的资金。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委员会于2006年初开始接受公众的申请，所有本国注册的社团、注册公司、文化与教育机构，只要提出有助于提升华文水平、弘扬华族文化，而又具有创意和深广影响的项目，均可向基金申请赞助。

基金成立至今已九年，共资助了两百多个项目及活动，受惠组织50余个，金额超过1000万元，所赞助的项目包括比赛、刊物、课程、讲座、表演艺术、综合活动等。此外，基金还与不同的组织和机构联办了大型知识竞赛“华文智多星”、“飞越蓝海”

论坛、“华文？谁怕谁！”、驻校作家计划、中学校园阅读计划等活动。

2011年，基金接获一名善心人士的捐款，遂与政府申请一元对一元的赞助，联合教育部设立“华文最佳进步奖”。此奖项开放给全国小学参与，旨在鼓励学生提升华文水平。每间小学每个年级(一至六年级)各推选一名获奖者，每名获奖学生可得50元书券及奖状一张。截至今年，有180所小学参与这个奖项，基金在推广华文华语方面的努力受到高度肯定。

基金其中一项大型活动——“童心童曲”全国儿童歌曲创作比赛也获得公众热烈响应，共接获78件参赛作品。经过专业人士的严格评审，共有20首作品脱颖而出。2014年，基金将歌曲收录在“童心童曲”原创儿歌专辑当中，印制2000张，免费派送到全国学前教育中心、小学、电台、电视台、相关政府机构及非营利团体，以发挥推广效益。此专辑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儿童所设计，歌词浅白易懂，富含教育意义。冀盼透过轻松有趣的唱游方式，培养孩童对华文华语的兴趣，寓教于乐。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分别由遴选小组及管理委员会组成，各司其职。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包括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华社等领域，负责审查及推荐申请项目。管委会则由宗乡总会、中华总商会以及教育部代表组成，主要负责管理基金会及批准活动项目的申请。基金每年分别召开四次遴选审查会议以及四次管委审批会议，以确保基金运作顺利。

宗乡总会奖学金

宗乡总会奖学金是宗乡总会在2011年初庆祝总会成立25周年之际推出，目的是鼓励本地年轻人到中国顶尖大学修读本科学位，为我国培养双语双文化人才。

总会每年资助最多五名优秀学生前往中国的顶尖大学深造。五年来，在宗乡总会奖学金下受惠的学生共有21人，其中已有两人顺利毕业。其他学生分别负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复旦大学深造，学习国际关系、金融经济、语言与文学、考古等专业，总资助额高达580万元。

奖学金得主们不仅品学兼优，赴中国升学后在学识、思想、视野、人脉等各方面也有更广的拓展。此外，他们也深知“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道理，趁着假期空档积极服务华团，学习宗乡组织的运作。

宗乡总会为作育英才不遗余力，希冀学生们学成归来后能热心回馈社会，成为华社的中流砥柱。

2015年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

三十而立。

宗乡网及宗乡汇典

网络宗乡英才——宗乡网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自1998年就设立了网站，通过网际网络传播信息。网站分别在2009年和2012年先后改革了两次。现在大家看到的宗乡网是第三个设计，自2012年开始启用至今已有三年多。

从宗乡网设立之初，总会就与时并进，希望通过互联网与外界和会员团体互通信息。宗乡网的另一目的，是希望没有自身网站的会员团体也能利用总会的网站，上载活动消息让更多民众参与。对已经设有自身网站的会馆，总会网站也可作为另一宣传活动的管道。

为鼓励会员团体更多地使用网站的功能，吸纳互联网的新知识与新观念，总会秘书处自2009年始就多次举办讲座和课程，教导会员团体相关知识。

宗乡网欢迎会员团体传送活动海报的电子版，或简单的活动介绍(100至200字之间，中或英版本皆可)至mailto:webadmin@sfcca.sg。

《宗乡汇典》推介会现场

穿梭中华文化——宗乡汇典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为与时俱进、保存和传承中华文化，宗乡总会于2014年开发了移动软件“宗乡汇典”。这个项目的重点是要加强会馆之间的沟通与联系，让更多群众，特别是让年轻一代接触和了解华族文化，从而加强华族社区的凝聚力。宗乡总会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加强与年轻一代沟通，配合当今科技把会员与会馆紧密联系起来；同时让用户能够拥有珍贵的文化资源，引领用户穿梭中华文化。

“宗乡汇典”移动软件为各会馆提供了专属的数码空间让旗下的会员与会馆取得联系。会员可以阅览刊物、观看视频、注册活动等。会馆所提供的文化资产也得以永久保留下来，以后任何时刻皆可随即阅览。 用户还能方便地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圈上分享会馆刊物资料及各种相关信息。我们希望借助这个移动平台，吸引更多科技爱好者对会馆相关活动进行传播和转载，壮大宣扬中华文化的团队，为加强华社的发展做出贡献。“宗乡汇典”可从苹果商店(App Store)和谷歌商店(Google Play)下载。

《宗乡汇典》的宣传海报

三十而立。

宗乡总会期刊

涓涓清流，润泽星洲
——《源》杂志

《源》杂志是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喉舌刊物”，创刊于1986年1月，即宗乡总会举行隆重的成立典礼时就开始出版发行。因此，《源》几乎与总会同岁，也步入了而立之年。

杂志的内容以弘扬华族文化、追溯本土历史、关注社会发展、呈现风土民俗、聚焦华社活动、反映狮城百态、论述观点看法、反映人文景观为主，至今已出版了117期，堪称新加坡最重要的文化平台之一，也是本地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近年来，《源》杂志经过几次的变革：增加本土内容的比重，加上部分的英文摘要，再配以色彩协调、美观大气的版面设计，深得读者青睐。目前，杂志又拓宽栏目，设立“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为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打造文化景观而不遗余力。

《源》杂志一路走来，除了历届编委、主编、编辑的共同努力之外，还得到了宗乡总会理事、国民融合理事会以及众多作者、读者等机构和个人的支持。追根溯源，弘扬华族文化，原本就是《源》宗旨。《源》一定会饮水思源，再接再厉，像涓涓清流，润泽星洲，奔涌不息。

华夏精英，汇聚狮城
——《华汇》

《华汇》是继本地文化双月刊《源》之后，另一本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筹划、创办的华文杂志，每三个月发行一期。

宗乡总会以关怀并团结新移民社群为出发点，推出这本结合时事、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科技、休闲等于一册的杂志。编采团队秉持着以人为本的精神，竭诚为读者呈现贴近生活，内容充实的刊物。每一期，杂志都会请名家以及专业人士撰文，为读者提供实用的生活资讯。

《华汇》除了展现新移民文化，也融合了多姿多彩的本土特色，以致力于协助新移民更有效地融入新加坡，进而产生归属感。与此同时，《华汇》也希望建立一个双向的沟通平台，增进新移民与本地社群间的互动和交流，促进社会和谐与国家凝聚力。

迄今为止，《华汇》已出版了十三期。宗乡总会将每期杂志免费派发给新移民组织、会员团体、学校、社区、图书馆等机构。此杂志也获得了国民融合理事会的常年赞助。

五年的足迹
2011年1月至2015年11月
宗乡总会大事记

编者按:

过去的五年来，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举办了很多活动，为领导我国的宗乡团体弘扬华族文化和打造和谐社会而努力。《源》杂志将这五年的活动分条列出，记录下宗乡总会这五年的足迹。这是一份档案，也是宗乡总会的一份成绩单，可为总会将来的发展提供参考。欲了解宗乡总会自1985年注册成立至2010年这二十五年的大事记，请参阅《总会20》特刊和《总会25年》特刊。

2011年

1月12日　欢迎澳门特首崔世安午宴

澳门特首崔世安于1月中抵新访问，新加坡福建会馆与宗乡总会于1月12日联办欢迎午宴，接待崔世安特首以及代表团。总会副主席何侨生及数位理事也参与其盛。

1月18日　25周年庆典暨筹款晚会

宗乡总会在费尔蒙酒店宴会厅举行25周年庆典暨筹款晚宴。当晚宴开135桌，超过1300人出席了晚宴。晚宴邀请到内阁资政李光耀阁下担任主宾。晚宴筹款总数突破400万元的目标，达到450万6900元。为增进与会馆间的交流，李光耀资政特别安排一个对话会，让各会馆代表提问，获得热烈反应。此外，李光耀资政也赠送一幅刻着“和衷共济”的大型匾额予宗乡总会。匾额于1月30日挂在总会大门入口处上端。

2月1日-2月13日　春到河畔2011

由春到河畔工委会主席成汉通先生领导，宗乡总会、报业控股华文集团、旅游局、中华总商会及人民协会联办的“春到河畔2011”于2月1日至2月13日一连13天在滨海湾浮动舞台隆重举行。开幕主宾为李光耀资政。

2月5日　2011年新春团拜

宗乡总会与通商中国在宗乡总会大礼堂联办2011年新春团拜。主办此次活动旨在藉此新春佳节，让会馆会员以及在华经商的新加坡企业家欢聚一堂，共叙乡情亲情，相互交流沟通。这是宗乡总会首次举办新春团拜活动。

2月11日-12日　妆艺大游行

由人民协会主办的妆艺大游行，宗乡总会也受邀派代表参与。

2月12日-5月14日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再次推出“华文智多星2011”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与新传媒继2008年之后，再次联手推出大型电视节目“华文智多星2011”。此项活动吸引了本地64所中学报名参与，每所学校派出3位学生组成一团，学生必须是新加坡公民。“华文智多星2011”从2011年2月12日至2011年5月14日每周六晚上九时，在新传媒8频道播出，13集的节目总共获得了超过170万的收视率。冠军队伍为华侨中学，亚军为维多利亚学校，季军为丹绒加东女校，殿军为文殊中学。

2月19日-20日　宗乡总会集思营

宗乡总会8位理事、23位执委以及7位秘书处职员共38人，在蔡天宝会长的带领下，赴民丹岛展开2天1夜的集思营活动。会上提出并通过了总会新的宗旨和愿景，也制定了新的策略。

3月2日　政府华社联络组与宗乡会馆对话会

由人力部部长颜金勇领导的政府华社联络组与宗乡总会及会馆领导进行一场对话。当晚出席的政府华社联络组成员包括颜部长、贸工部兼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高级政务次长陈振泉和丰加集选区议员洪茂诚。对话内容包括宗乡团体对2011年财政预算案的看法，以及会馆所面对的问题及希望政府给予哪一方面的协助。

4月3日　“闽帮人物与闽商精神”研讨会

为了维护新加坡文化遗产，宗乡总会和国家图书馆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举行“闽帮人物与闽商精神”研讨会。这场研讨会邀请了4名来自国内外的主讲者，针对新加坡福建族群过去一百年来对新加坡经济、教育及社会等方面的贡献进行探讨。

5月5日-8月28日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奖学金

为了培养我国双语双文化优秀人才，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特设立奖学金，每年资助五名优秀的学生前往中国的顶尖大学攻读本科学位。奖学金开放给具有初院学历或其他相等资格学历的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申请成功者将获得每人每年1万5000新元的奖学金。宗乡总会在2011年8月28日的“宗乡之夜：乡情乡韵”音乐晚会上为首批5位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举行奖学金颁发仪式。

5月21日　全国宗乡会馆分享大会

300多名来自不同会馆组织的领袖和成员聚集一堂，参加由宗乡总会主办的“全国宗乡会馆分享大会”。大会邀请了多间会馆社团代表前来主讲，介绍和讨论目前宗乡团体所关心和感兴趣的5大课题。会上也邀请了政府部门官员详细介绍政府资助金的申请办法，以及曾福庆律师谈论设立公益慈善机构(IPC)的基本条件。

5月24日　赈济日本天灾

日本仙台发生311地震后不久，总会即呼吁会员团体踊跃捐款，奉献爱心，协助日本灾民渡过难关。会员团体捐赠的款项由宗乡总会汇总，共筹得11万3358元。

6月4日　《从历史文化角度谈在华经商》讲座

宗乡总会和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在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联办《从历史文化角度谈在华经商》讲座，由本地著名历史学者兼宗乡总会研究与出版组主任柯木林主讲，吸引了100名各会馆人士及公众出席聆听。

6月5日　2011年端午节嘉年华会

宗乡总会及大巴窑中民众联络所在大巴窑图书馆前广场联办“2011年端午节嘉年华会”。

6月25日　青年事务组15周年庆典暨青年论坛

宗乡总会举办的“青年事务组15周年庆典暨青年论坛”，吸引超过350人出席，当中包括支持单位中华总商会青年企业家联系网、通商中国、新加坡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新加坡中国高校校友联合会约100名的代表。主宾为贸工部政务部长张思乐先生。本活动除了提出口号“承先启后，共创未来”，也推出网站和面簿(facebook)，吸引年轻人。会上也邀请了3位本地杰出会馆青年(福建会馆蔡添荣医生、冈州会馆梁国权先生、同安会馆刘道炜律师)，以及1位活跃于会馆的新移民青年(晋江会馆柯鸿景)，分享他们参与会馆的心得和经历。

6月27日　分区与会馆领导交流会

为了加强与宗乡会馆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凝聚彼此的关系，宗乡总会展开了两轮的分区交流活动。分区轮流与会馆交流目标除了是总会的会员之外，也邀请该区域的非会员宗乡团体前来参与，希望他们进一步了解总会之后，加入总会成为会员。第一次聚会定在武吉巴苏区的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家族自治会会所，卫生部长颜金勇、教育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次长沈颖，及丹戎巴葛集选区议员谢世儒医生也应邀前来参与。

7月28日　前副总理陈庆炎博士来访总会

前副总理陈庆炎博士来访总会，与宗乡总会及属下会员团体代表针对国家政策及华社问题进行交流。

8月7日　第五届“爱国歌曲大家唱”国庆晚会

宗乡总会在大巴窑建屋发展局中心广场举行第五届“爱国歌曲大家唱”国庆晚会。总会希望借此号召会员团体通过美妙的歌声歌颂、祝贺我国建国46周年。主席在会上致词时，宣布李显龙总理成为宗乡总会成立25年来的第一位赞助人。李显龙总理也到场与民同乐。

8月14日　新移民中元习俗之旅

为促进新移民对本地民俗的认识，宗乡总会社会事务组举办了一场“新移民中元习俗之旅”，邀请了7间新移民组织，包括天府会、山西会馆、华源会、天津会、九龙会、新加坡学者学生联合会以及新加坡高校校友联合会，组成30多人的团队，在三清宫听专人讲解中元节的习俗，参与者也在韭菜芭城隍庙的中元节晚会享用宴席，并一睹福物投标的盛况。

8月16日　分区与会馆领导交流会

第二次聚会定在芽笼区，于丰顺会馆举行，卫生部长颜金勇、总统候选人陈庆炎博士、白沙-榜鹅集选区议员颜添宝及蔡厝港集选区议员任梓铭也应邀前来参与。

8月28日　宗乡之夜：乡情乡韵

宗乡总会汇集客属总会华乐团、应和会馆华乐团、惠安公会华乐团、安溪会馆古筝组、安溪会馆南音社及同美社南音社的力量，在新加坡华乐团音乐厅呈献了一场声乐曼妙的 “宗乡之夜：乡情乡韵” 音乐会。

9月11日　首届新加坡华语演讲公开赛

宗乡总会、新加坡管理学院讲演会，以及联合早报联办“首届新加坡华语演讲公开赛”。在“我是演讲王，等你来称王”的口号下，比赛共吸引了超过120名各国籍的参赛者角逐青年组(18岁至45岁)与长青组(45岁以上)奖项，争夺“我是讲演王”的头衔。共进行三场比赛——7月31日的初赛，8月21日的复赛，以及9月11日在新加坡管理学院举行的大决赛。

9月13日　年度杰出会馆奖

宗乡总会举行记者会，正式推出“年度杰出会馆奖”。此奖项的设立是为了鼓励宗乡团体在弘扬华族文化及促进社会、国家和谐方面做出积极贡献，举办更多有意义的活动。参选的会馆可介绍其在本年度最具特色的一至两个活动，活动时间范围从2010年10月到2011年10月31日。奖项邀得七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担任评审，由郭振羽教授担任评委会主席。

9月17日　第26届会员大会 通过修改章程

宗乡总会在大巴窑会所礼堂召开了第26届常年会员大会。当天，宗乡总会也首次颁发会员证书予属下会员团体，增强会员团体对总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会上通过了宗乡总会修改章程的议案，并明确总会的宗旨和愿景。

9月17日　新跃大学-宗乡总会学士课程资助金

宗乡总会与新跃大学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正式推出“新跃大学-宗乡总会学士课程资助金”。资助金将提供5个名额给宗乡总会及属下会员团体的会员和职员，申请新跃大学的5项华文学士课程。

9月23日　第一届宗乡杯高尔夫球赛

第一届宗乡杯高尔夫球赛在新加坡岛屿俱乐部圆满举行。比赛分上午与下午两场，吸引了200名球手参加这项赛事。当晚的颁奖典礼设在宗乡总会大礼堂，晚会主宾为卫生部长颜金勇先生。团体奖、冠、亚、季军分别由谢氏总会、永春会馆和白氏公会夺得。

9月29日　分区交流会

在茶阳(大埔)会馆举行的第三次分区交流会，共有88名出席者。卫生部长颜金勇、高级政务次长沈颖、白沙-榜鹅集选区议员颜添宝和马林百列集选区议员陈佩玲也出席了当晚的交流会。

10月8日　新中文化交流演出

为促进新中文化交流，宗乡总会与中国海外文化交流协会艺术团在宗乡总会礼堂联合呈现 “新中文化交流演出”。

10月23日　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

宗乡总会在会所礼堂首次举办“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以“新马民俗的传承”为主题，邀请了本地著名马来族汉语学者耶亚华，以及宗乡总会社会事务组副主任韩进元为主讲人，分别介绍新加坡马来族群的文化及华人的民俗文化。

10月30日　会馆走透透

宗乡总会社会事务组首次举办“会馆走透透”系列活动，邀请了10余位新移民参观新加坡南安会馆及凤山寺，让新移民走入会馆，促进他们对本地会馆的认识。

11月21日　“向李光耀 吴作栋致敬”晚宴

新加坡宗乡总会和中华总商会联手，在新达新加坡国际会议与博览中心二楼宴会厅举办“向李光耀、吴作栋致敬”晚宴，共1200人出席。当晚发布了《李光耀与华社》和《吴作栋与华社》这两本专辑，来表达新加坡华社对两位新加坡前总理的崇高敬意。

12月4日　宗乡会馆青年达人秀

宗乡总会青年事务组在乌节路青年公园举办“宗乡会

馆青年达人秀”，当天汇集了多间会馆及新移民组织的16支参赛队伍参与，呈献多元化的精彩表演。另外，现场也布置了12间会馆的展览摊位，及设立了趣味的历史图片走廊。

12月10日-11日　第二届宗乡杯全国围棋锦标赛

由宗乡总会主办，18间会馆联办，围棋协会协办的“第二届宗乡杯全国围棋锦标赛”一连两天在总会礼堂举行。

2012年

1月14日　“年度杰出会馆奖”得奖名单出炉

首次推出的“杰出会馆奖”获得了众多会馆的热烈回响，共有38间报名参与。荣获杰出会馆奖的会馆包括：南洋客属总会、新加坡厦门公会、新加坡福建会馆、新加坡福州会馆、符氏社。而4间获得优秀奖的会馆分别为广西暨高州会馆、天府会、龙溪会馆以及同安会馆。

1月21日至1月29日　春到河畔2012

“春到河畔2012”从2012年1月21日至1月29日，在滨海湾浮动舞台隆重举行，9天的活动吸引了近100万名公众到访。

1月25日　新春团拜

宗乡总会与通商中国联合主办2012年新春团拜，主宾为总理李显龙先生。

2月3日　全国华乐马拉松

全国华乐马拉松成功聚集了31支华乐团体参与，于2月3日至25日在全岛各地上演44场华乐演出，参与演出的表演者多达1,200人，年龄介于10岁至67岁，共吸引了2万多名观众。

2月25日　“跨国婚恋”讲座

宗乡总会社会事务组在总会礼堂举办“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之二，以“跨国婚恋”为主题，邀请了来自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媒学院的周琼媛助理研究员，以及企业家张润芝女士，从实例分析研究和个人亲身经验的角度，为大家分析跨国婚恋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调整的建议。

3月14日　第五次分区与会馆领导交流会

第五次分区与会馆领导交流会在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举行，对象为金融区及西区会馆。

3月19日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拜访总会

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赵阳率领的6人代表团到访总会。

3月24日　会馆走透透

由宗乡总会社会事务组举办的“会馆走透透”，共有20多人参观潮州八邑会馆。

4月7日　四大名楼 重启石叻坡记忆

宗乡总会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石叻坡记忆》活动系列之一：新加坡四大历史名楼座谈会。四位历史学者，柯木林、吴庆辉、潘宣辉及陈继廉，分别将南生花园、振裕园、晚晴园和金钟大厦的历史娓娓道来。

4月28日　新加坡医疗和保健制度

宗乡总会社会事务组在总会会议厅举办“新加坡医疗和保健制度”讲座，邀请到康威医疗集团总裁兼执行董事蓝秉汶医生，以及新加坡癌症中心的黄淑仪女士主讲。

5月18日　第六次分区与会馆领导交流会

第六次分区与会馆领导交流会在南舜同宗会顺利举行。

5月26日　青年领袖齐聚 共议会馆青年活动

宗乡总会青年事务组联合全国青年理事会在乌节路青年社区中心 (*SCAPE) 的会议厅举办“青年领袖集思营”。当天聚集了90名来自各个会馆、新移民组织、中华总商会青企网、通商中国、中国留学生组织等，年龄介于16岁至45岁的青年，为会馆未来的活动进行思考，分享彼此的经验，探讨举办适合青年人的活动。

6月17日　端午节嘉年华会

宗乡总会与大巴窑中民众俱乐部在大巴窑图书馆前广场联合举办“端午节嘉年华会”。

6月18日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代表团到访

由何亚非副会长率领的3人代表团到访总会。

7月28日　如何更好地安家置业 - 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

宗乡总会在总会二楼会议厅举办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之四：“如何更好地安家置业”，为公众解答我国各种房屋买卖制度及手续。

8月9日　国庆勋章

在宗乡总会努力争取下，从2007年开始，总会获准向社青体部推荐国庆勋章候选人。2012年国庆日公布新加坡福建会馆副会长蔡成宗荣获公共服务奖章 (PBM) 。

8月11日　爱国歌曲大家唱

宗乡总会举办第六届“爱国歌曲大家唱”国庆晚会。

8月24日　蜕变与转型：新加坡的会馆文化

宗乡总会副秘书长方百成先生和研究与出版组主任柯木林先生于2012年8月24日在宗乡总会二楼会议厅接待了第三届亚洲青年华语论坛海内外师生。柯木林主任为来访的师生主讲了课题《蜕变与转型：新加坡的会馆文化》。

8月25日　2012年宗乡总会奖学金颁奖仪式

宗乡总会在会所举行了“2012年宗乡总会奖学金颁奖仪式”，共有4位学生荣获宗乡总会奖学金。

9月6日　第二届宗乡杯高尔夫球赛

第二届宗乡杯高尔夫球赛圆满举行，共有36组会员球队，144名球员参与比赛。

9月8日　第二十七届会员大会

宗乡总会召开第二十七届会员大会，并进行了第十四届的理事选举，选出了14名新理事。

9月8日　《华汇》出版

继《源》之后，宗乡总会推出第二本华文期刊《华汇》(季刊)。《华汇》以关怀并团结新移民社群为出发点，展现新移民文化，也融合本土特色，协助新移民融入。

9月29日　第十四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宗乡总会召开了第十四届理事会复选会议，会上选出了宗乡总会新一届理事及执委。当天也举行了第十四届理事暨执委会就职典礼。

9月13日至2013年1月27日　家书抵万金 —— 新加坡侨批文化展

由宗乡总会、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以及泉州市综合档案馆联合主办的“家书抵万金 —— 新加坡侨批文化展”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7楼展厅展出。并于2012年9月15日举办了相关的讲座。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志贤、来自中国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的学者黄青海以及泉州市档案馆副馆长叶芬蓉分别为大家讲述了有关“侨批”的研究心得。

9月22日　乡情乡韵

宗乡总会在芳林公园举办“乡情乡韵2012”音乐晚会活动。今年“乡情乡韵”荣幸受邀成为“华族文化节”亮点项目之一。

10月13日　宗乡总会健康嘉年华会

宗乡总会会员事务组在总会大礼堂举办第一届“宗乡总会嘉年华会”。

11月3日　会馆走透透

宗乡总会举办第三次的“会馆走透透”活动，参观了海南会馆及应和会馆。

11月11日　宗乡文化行

宗乡总会青年事务组举办“宗乡文化行”竞走活动，走一趟文化与历史交融的时光道路。

11月17日至18日　第七届全国学生象棋锦标赛

宗乡总会会员事务组举行第七届宗乡杯全国学生象棋锦标赛。

11月24日　善用新加坡市场投资理财工具

宗乡总会社会事务委员会举办的新移民与新加坡系列讲座之投资理财。

2013年

1月5日　“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

宗乡总会在会所大礼堂举行了“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

1月12日至13日　集思营

宗乡总会在马六甲惠胜酒店举行集思营活动，集思广益为总会的未来发展制定目标和策略方针。

1月20日　“幸福之歌”大型春节晚会

宗乡总会与新加坡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共同为近2000名观众，呈献一场用幸福打造的“幸福之歌”大型春节晚会。

2月8日至16日　“春到河畔2013”

2013年的“春到河畔”连续九天在滨海湾浮动舞台隆重举行。

2月12日　新春团拜2013

宗乡总会与通商中国在宗乡总会大礼堂举办2013年新春团拜。主宾陈庆炎总统也到场与嘉宾一起欢度新春。

2月15日　杰出会馆奖2012/宗乡之夜

2012的赛事获得30间会馆团体的参与，荣获杰出会馆奖的是：九龙会、苏氏公会、新加坡六桂堂、新加坡晋江会馆以及新加坡福建会馆。而5间获得优秀奖的会馆分别为雷州会馆、新加坡广东会馆、新加坡龙溪会馆、新加坡惠安公会以及茶阳(大埔)会馆。在2月15日所举办的“宗乡之夜”上，由教育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次长沈颖女士颁发奖座给10间得奖会馆。

2月23日　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 —— 如何在新加坡创业

由宗乡总会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办的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 —— 如何在新加坡创业。

2月28日　人口白皮书座谈会

为了让会员团体进一步了解人口白皮书的内容，同时收集华社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宗乡总会在宗乡总会大礼堂举行专场座谈会，以便达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目的。总理公署部长傅海燕向与会者讲解人口白皮书的内容与政策，并解答与交流相关问题。

3月10日　青年团定期聚餐会

宗乡总会邀请了中华总商会青企网、通商中国、新加坡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新加坡中国高校校友联合会的青年团进行交流，通过讨论及分享彼此的经验，探讨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及联办活动的模式。

4月14日　华社关怀乐龄日-Project C.A.R.E

宗乡总会首次与华社自助理事会合作联办华社关怀乐龄日在樟宜商业园区举行。由社会事务委员会及青年委员会共同负责的活动，成功招徕众多义工，带领1000多位乐龄人士购买日常用品，并招待他们享用午餐。

4月21日　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之五-“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历史脉络与商务环境”

为了让新移民了解本地华人先辈选择移民来新加坡的历史背景，社会事务委员会邀请三江会馆会长李秉萱博士为大家讲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历史脉络与商务环境》。

4月27日　会馆走透透-新加坡福建会馆及天福宫

社会事务委员会举行 “会馆走透透”系列活动，参观新加坡福建会馆及天福宫。

5月4日和5月11日　石叻坡记忆之三：“新加坡历史悬案”1&2

学术委员会在国家图书馆5楼举办的“新加坡历史悬案”座谈会，主讲者包括：柯木林、陈达生、吴华、萧学民、陈有利、吴庆辉、林志强和吴安全。

5月18日　民众联合嘉年华2013

为促进社会融合及提供交流平台，宗乡总会与人民协会举行“民众融合嘉年华2013”。

5月19日　华社分享交流大会

由宗乡总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社自助理事会和通商中国首次联合主办的“华社分享交流大会”在宗乡总会大礼堂举行。

6月8日　宗乡总会健康嘉年华

宗乡总会会员事务委员会与新加坡保健促进局在宗乡总会为属下会馆会员举办“宗乡总会健康嘉年华”。活动为60岁或以上的年长者做健康体检，保健促进局的医师也在当天讲解骨质疏松症及如何预防跌倒。

6月9日　端午节嘉年华会2013

宗乡总会与大巴窑中民众俱乐部在大巴窑图书馆广场联办 “2013端午嘉年华会”。

7月6日　青年团聚餐会之相约在宗乡

青年委员会在宗乡总会举办“青年团聚餐会”，活动也邀请中华总商会青企网、通商中国及各新移民组织的青年团出席，分享彼此的经验，探讨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及联办活动的模式。

7月13日　宗乡总会青年达人Show2013

青年事务组举办“宗乡会馆青年达人Show 2013”，以提供平台让青年人表演并展现才艺。

7月20日　恳亲大会经验分享会

为了与更多会馆分享举办恳亲大会的经验，宗乡总会举办恳亲大会分享会。

7月27日　南洋咖啡香-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

宗乡总会举办“新移民融入系列讲座 —— 南洋咖啡香”，主讲者为宗乡总会社会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本地著名连锁咖啡店“口福”的董事主席庞琳先生。

7月28日　“音乐创作的想象与实现”文化讲座

宗乡总会文化委员会举办“音乐创作的想像与实现”讲座，主讲者为著名音乐制作人黎沸挥先生和新加坡著名舞台戏剧导师詹辉朕先生，讨论的课题为歌曲创作及心得等。

8月10日　青年体育节

青年事务组和新加坡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联合举办“青年体育节2013”。

8月14日　第七届“爱国歌曲大家唱”国庆晚会

宗乡总会举办第七届“爱国歌曲大家唱”国庆晚会。

9月12日　第三届宗乡杯高尔夫球赛

宗乡总会会员事务委员会在新加坡岛屿俱乐部举办第三届宗乡杯高尔夫球赛。

9月21日　三州府论坛《百年盘点: 峇峇人物与文化》

为加强新马两地学术领域的联系与互动，宗乡总会举办了《三州府论坛》，此次论坛主题是《百年盘点：峇峇人物与文化》，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10月5日　“华语、方言与宗乡会馆”讲座

宗乡总会和新加坡汾阳郭氏公会联办“华语、方言与宗乡会馆”讲座，主讲者为现任新加坡新跃大学学术顾问郭振羽教授。

10月9日　会馆分区交流会

第三次会馆分区交流会在新加坡南安会馆举办。

10月26日　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 - 新移民如何读懂新加坡人的集体潜意识

宗乡总会社会事务委员会举办“新移民融入系列讲座 —— 新移民如何读懂新加坡人的集体潜意识”，从事心理辅导与治疗工作的刘德强先生，讲解有关新加坡人的国民性格，让新移民进一步了解新加坡国民的集体潜意识。

10月27日　“认识新加坡知识竞赛”总决赛

于2013年初开展的“认识新加坡知识竞赛”举行大决赛，共有8支队伍角逐冠军头衔，荣获冠军奖项的是由潘松庆、梁丽云、叶明生和张健欢组成的队伍。

11月2日　会馆走透透之冈州会馆

会馆走透透之冈州会馆圆满举行。

11月2日　青年团聚餐会

2013年第三次聚餐会在福清会馆举行，出席者除了各会馆的青年团代表之外，还有中国高校校友会的成员。

11月24日　第三届宗乡杯全国学生围棋锦标赛

宗乡总会与新加坡围棋总会联合主办“第三届宗乡杯全国学生围棋锦标赛”。

12月4日　“乡情乡韵”音乐晚会

“乡情乡韵”音乐晚会在新加坡华乐团音乐厅举行。

12月14日　“缘来就是你”社交活动

由宗乡总会青年委员会主办的“缘来就是你”在旧国会大厦的Livehouse举行。

12月28日　新移民融入系列讲座 —— 创业邻里 · 掌握未来

新加坡全国商联会的代表李成利博士和谢赛英女士主讲“创业邻里 · 掌握未来”，让出席者得以了解邻里企业在新加坡社区所扮演的角色。

2014年

1月5日　“产业信托人”法律讲座

宗乡总会特邀三位知名律师，许廷芳律师、白南泉律师和曾福庆律师为会馆领导讲解与分析相关课题。

1月10日　分区与会馆领导交流会

第四次分区与会馆领导交流会在新加坡武吉班让福建公会举行。

1月29日至2月8日　春到河畔2014

为期11天的“春到河畔2014”在滨海湾浮动舞台隆重举行，共吸引了123万人次前来观光。

2月2日　新春团拜2014

宗乡总会与通商中国联合主办2014年新春团拜，主宾为张志贤副总理。

2月5日　“宗乡掠影”全年摄影比赛

宗乡总会社会事务委员会于2013年1月份至12月份举行了“宗乡掠影”全年摄影比赛， 颁奖礼于2014年2月5日的“宗乡之夜”晚会上举行。

2月22日　青年团与部长交流会

宗乡总会青年委员会在宗乡总会会议厅举行青年团与部长交流会。总会很荣幸地邀请到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陈振声前来与青年团员对话交流，分享青年人对国家社会等课题的看法。

3月13日　“终身健保双全”对话会

为了收集华社代表对终身健保双全的意见和建议，并让会员团体进一步了解我国的医疗保健制度，宗乡总会举行交流对话会，对话会当天迎来约50名华社代表，针对终身健保双全的机制、保费等进行讨论。

4月4日　2013年度杰出会馆奖

共有39家会员团体报名参加角逐“2013年度杰出会馆奖”，杰出会馆奖：福建会馆、冈州会馆、龙溪会馆、南安会馆和颜氏公会。优秀会馆奖：安溪会馆、永定会馆、武吉知马海南联谊会、金门会馆和厦门公会。 颁奖礼于2014年4月4日(星期五)以晚宴形式在宗乡总会礼堂进行。

4月18日　会馆走透透

宗乡总会社会事务委员会举办“会馆走透透”系列活动，参观地点为中央锡克庙(Central Sikh Temple)。

4月26日　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之“狮城印度族歌舞风情”

宗乡总会社会事务委员会举办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之“狮城印度族歌舞风情”，印度族律师金智华(Jeeva Joethy)以华语演说，讲解印族文化。

4月27日　Project C.A.R.E.

宗乡总会第二次与华社自助理事会联办Project C.A.R.E 2014。700名义工们陪伴来自各福利团体的500名乐龄人士游览位于滨海湾花园的“花穹”和到万兴楼用餐。

5月24日　“星洲四才子”座谈会

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在国家图书馆举办“星洲四才子”座谈会，讲者柯木林、林纬毅博士、叶若诗和何奕恺博士分别介绍了星洲四才子 —— 叶季允、士僧释瑞于、邱菽园和李俊承。

6月至11月　“我的新加坡故事”微电影大赛

宗乡总会、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和联合早报网联办“我的新加坡故事”微电影大赛。

7月至10月　宗乡青年体育节2014

宗乡总会青年委员会联合新加坡南安会馆、新加坡符氏社、新加坡广东会馆、新加坡永春会馆及 新加坡晋江会馆举办“宗乡青年体育节2014”。

8月1日　爱国歌曲大家唱

宗乡总会主办“爱国歌曲大家唱”与民同欢共庆。

8月5日　2014年度宗乡总会奖学金

5名学生荣获“2014年度宗乡总会奖学金”。

8月9日　国庆勋章

宗乡总会于2013年12月中向属下会员团体征求提名，经过内部评选，总会于2014年1月初正式向社青体部提呈3位候选人。2014年国庆日公布南洋柯氏公会主席柯毓麟和南洋赖氏公会会长赖涯桥荣获公共服务奖章。

8月23日　“关公文化”讲座

来自中国福建泉州的著名关公人物画家曾成聪，和四川成都武侯祠的研究员梅铮铮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介绍关公文化。

8月31日　“2013年度杰出会馆奖”得奖会馆分享会

宗乡总会会员事务委员会举行“2013年度杰出会馆奖”得奖会馆分享会，邀请获得2013年度杰出会馆奖得主，分享各会馆得奖的心得。

9月20日　“宗乡汇典”综合数码移动平台　《图说石叻坡》推介仪式

宗乡总会在会员大会上正式宣布“宗乡汇典”综合数码移动平台试用期开始，各会馆可利用这个平台，展示会馆刊物、视频和活动资讯，该平台于2014年12月份正式启用。《图说石叻坡》一书也在会员大会上举行了推介仪式。

9月24日　第四届宗乡杯高尔夫球赛

宗乡总会在实里达俱乐部举办第四届宗乡杯高尔夫球赛。

9月29日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动土仪式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在新加坡大会堂举行动土仪式。

10月11日　免费微电影分享会

3角60度电视制作公司执行监制洪益兴和堂堂映画导演兼执行监制周伟堂在南洋艺术学院分享他们如何述说他们的“新加坡微电影故事”。

10月18日　宗乡总会健康嘉年华

宗乡总会会员事务委员会与新加坡保健促进局为宗乡总会属下会馆会员举办“宗乡总会健康嘉年华”。

11月1日　“认识新加坡”知识竞赛

宗乡总会举办“认识新加坡”知识竞赛，通过互动性的竞赛，介绍本地的传统民俗、文化生态和生活方式。

11月13日　青年团与部长交流会

宗乡总会青年委员会举办青年团与部长交流会，人力部部长陈川仁先生将前来与青年团员对话交流，分享青年人对国家社会等课题的看法。

11月14日　“一切从故事开始”微电影分享会

导演任锦添和甘龙发在义安理工学院的微电影分享会上，分享他们如何记录人生的酸甜苦辣。

11月16日　第八届全国学生象棋锦标赛

宗乡总会及新加坡象棋总会联合主办“第八届宗乡杯全国学生象棋比赛”。

11月29日　会馆走透透 - 新加坡华人土生博物馆

社会事务委员会举办“会馆走透透”系列活动，参观新加坡华人土生博物馆。

2015年

1月17日　“认识新加坡”知识竞赛嘉年华

宗乡总会连同人民协会举办的为期8个月的“认识新加坡”知识竞赛举行决赛，本次活动以嘉年华的形式呈现。

2月17日-28日　春到河畔2015

为期12天的“春到河畔2015”在滨海湾浮动舞台隆重举行。

2月21日　新春团拜2014

宗乡总会、通商中国以及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携手主办2015年新春团拜。

3月8日　青年交流会2015

宗乡总会青年委员会举办青年交流会2015，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通讯及新闻部第二部长黄循财出席了此次活动。

3月27日　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追悼会

宗乡总会联同中华总商会、华社自助理事会、通商中国，以及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马来专业人士协会、新加坡印度人发展协会和欧亚裔协会携手举办追悼会，共同向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致敬。

4月12日　新移民系列讲座之《霉运大厦》电影放映会暨座谈会

本次系列讲座以“电影放映暨交流会”的方式，在邵氏丽都戏院放映本地导演郭智轩的首部长片《霉运大厦》(Unlucky Plaza)，放映结束后特邀剧中演员郭亮前来与观众分享心得。

4月19日　Project C.A.R.E.

宗乡总会和华社自助理事会安排700名义工陪伴500名年长人士游览S.E.A海洋馆。

4月25日　新加坡文化之旅 - 欧亚人协会

宗乡总会自2015年3月起开展的“新加坡文化之旅”系列活动，首站走访欧亚人协会。

4月25日　2014年度杰出会馆奖

宗乡总会举办2014年杰出会馆奖颁奖礼，获得杰出会馆奖的有：新加坡中山会馆、新加坡惠安公会、丰永大公会、新加坡南安会馆、潮州八邑会馆；获得优秀会馆奖的有：新加坡永春会馆、新加坡黄氏总会、南洋胡氏总会、新加坡海南会馆、新加坡福清会馆。

5月14日　宗乡总会与广东团体交流会

为了加强与广东团体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宗乡总会会员事务委员会举办了与广东团体交流会。

5月16日　“我的新加坡故事微电影大赛”颁奖典礼

宗乡总会、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和早报网联办的“我

的新加坡故事”微电影大赛在新加坡艺术学院剧场举行颁奖典礼。

5月16日　新加坡文化之旅——印度传统文化馆

宗乡总会举办第二次“新加坡文化之旅”，走访印度传统文化馆。

6月14日　2015 端午嘉年华

宗乡总会、大巴窑中民众俱乐部及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合举行2015年端午嘉年华会。

6月30日　“公益机构”分享会

宗乡总会举行“公益机构”分享会，特邀慈善总监以及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人员分享如何获得公益机构资格以及拥有此资格的好处等相关讯息。

7月8日　《新加坡华人通史》

宗乡总会召开记者会，宣布为庆祝新加坡建国50周年及宗乡总会成立30周年而出版的历史巨著《新加坡华人通史》编辑完成，开始接受预订。

7月18日　宗乡总会健康嘉年华

宗乡总会会员事务委员会为属下会馆会员举办“宗乡总会健康嘉年华”，特邀卫生部长颜金勇到场介绍终身健保双全配套，为与会者解答疑问。另外，张磊中医师及陈言森心脏医生也分别以中西医的角度分享保健资讯。

7月26日　乡情乡韵之狮城原韵

由宗乡总会主办的“乡情乡韵”在维多利亚剧院上演。为配合新加坡建国50周年，今年以“狮城原韵”为主题，透过音乐剧的形式回顾我国的建国历程。

7月29日　宗乡总会与琼属团体交流会

宗乡总会会员事务委员会举办与琼属团体交流会。

8月1日　第九届爱国歌曲大家唱

宗乡总会与华族文化中心联手举办第九届“爱国歌曲大家唱”国庆晚会。

8月9日　国庆勋章

国庆日公布宗乡总会副会长兼新加坡海陆丰会馆荣誉会长钟声坚荣获公共服务奖章。

8月16日　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跨国婚姻的酸甜苦乐”

宗乡总会在海南会馆举办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跨国婚姻的酸甜苦乐”，飞跃社区服务的林孔怀副主任以“跨国婚姻的挑战与支持”为主题，介绍社会及家庭发展部(MSF)的新方案，分享跨国婚恋的个中挑战。讲座也邀请到外籍新娘叶璞现身说法，分享异国婚恋的经历。另一名主讲嘉宾吴碧山律师则将讲解伴侣们所普遍面对的法律问题。

9月2日　宗乡总会高尔夫球筹款赛

为配合总会30周年庆典，宗乡总会举办“宗乡总会高尔夫球筹款赛”，为本会筹募资金。

9月3日　青年交流会

宗乡总会青年委员会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举行“青年交流会”。

10月4日　第三届宗乡青年体育节

在2015年7月至10月举行的第三届宗乡青年体育节于10月4日圆满闭幕。

10月17日　基本军训中心Basic Military Training Centre(BMTC)开放日

受新加坡国防部NEXUS部门之托，宗乡总会邀请会员团体出席基本军训中心Basic Military Training Centre(BMTC)开放日。

10月18日　“新加坡文化之旅——哈迪杰回教堂”

宗乡总会带领参与者走访坐落在芽笼的哈迪杰回教堂(Khadijah Mosque)，感受伊斯兰文明。

10月24日　“名人与庙宇”座谈会

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举办“名人与庙宇”座谈会，带领公众探索人和庙的情意结，领略南洋庙宇文化。

11月9日　30周年庆暨筹款晚宴

宗乡总会在圣淘沙名胜世界罗盘宴会厅举行总会30周年庆暨筹款晚宴，李显龙总理担任大会主宾。聚集多位历史学者精心编写的《新加坡华人通史》也在晚宴上举行了推介仪式。

(资料整理：欧雅丽 李叶明)

青年交流会参与者合影(2015)

宗乡青年齐聚圣淘沙交流

文 · 欧雅丽 (本刊记者)　图 · 编辑部

2015年9月3日傍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青年委员会与其他会员团体青年团代表共计80多名青年齐聚圣淘沙环球影城进行交流。与会青年代表不仅一起游玩了游乐项目，还以时下年轻人喜欢的网络分享及网络言论相关话题展开了讨论，现场气氛轻松而热烈。

在交流会开始之前，宗乡青年代表们一起游玩了“变形金刚3D对决之旅”和“斯匹堡大导演主持的电影特效片场”两项游乐设施。惊险、刺激的游乐项目让彼此并不熟悉的与会代表们减少了陌生感，大家都放松下来，为接下来的交流会培养了良好的气氛。

交流会在环球影院内的餐厅举行，宗乡总会青年委员会主任白毅柏在致欢迎词时说，宗乡总会十分关注年轻人的发展，特别是会馆的动向，因此总会的青年委员会经常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全方位照顾年轻人的喜好和需求，以吸引更多新生代走入会馆。同时，为了鼓励宗乡团体积极开展青年事务，宗乡总会2014年度的杰出会馆奖也开始增设“提倡会馆青年运动”的评分标准，从中发掘了不少社团新力量，让人深感鼓舞。

如今，人们身处在资讯爆炸的年代，网际网络及科技产品为生活带来无穷的便利，同时也产生了种种弊端。有些人利用科技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散播负面思想，或任意谩骂、毁谤，企图破坏社会秩序与安宁。针对这种现象，宗乡总会在本次的交流会特别设置了讨论环节，让与会者就网络分享及网络言论相关话题进行讨论，分享各自的看法。

80多名代表被随机分成四组，各组就有关网际网路的不同问题展开讨论，比如对于网民为了自我利益在网站或博客上载带有煽动或挑拨性意见的看法；为何有人喜欢把自己的生活点滴都放在网上？什么是“网上健康”？需要遵守什么网上道德与游戏规则等等。四位义务引导员分别引导四组成员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经过近半小时的热烈讨论，代表们相互交换了意见，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代表们也就一些问题达成共识，比如对于那些带有煽动或挑拨性意见的观点不能盲目接受，要自己明辨是非；对于一些有害他人或社会的言论不要主动传播；在网上分享私人生活要懂得保护个人隐私；与网友交流时要尊重他人；不能侵犯他人隐私和损害他人名誉等。白毅柏主任表示，通过这样的讨论，也是要勉励青年们引以为鉴，凡事三思而后行，学习互相尊重，以打造一个互助友爱、团结包容的社会。

本次交流会于当晚9时左右圆满结束。白主任表示，宗乡总会一直都非常重视和各会员团体青年团的交流与合作，类似的交流会今后还会多多举办。与会青年们通过这次交流会结识了新的朋友，也分享了各自所属会馆的经验。来自陕西同乡会的汪婧说，陕西同乡会刚刚加入宗乡总会成为会员，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宗乡总会青年委员会的活动，没想到这么有趣，今后若有机会还会参与宗乡总会的活动。

开启投票箱的时刻

计票工作紧张有序

宗乡总会第十五届理事暨执委会就职

文图 · 欧雅丽 (本刊记者)

2015年10月2日下午，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召开第十五届理事会复选会议，选出了新一届理事及执委。会后第十五届理事暨执委会宣誓就职，蔡天宝众望所归连任会长，副会长由何侨生和钟声坚担任。

根据宗乡总会章程，理事会的31名成员，其中7名发起会员代表为当然理事，14名由会员团体投票选出会员团体代表，另外10名由新理事会委任，受委代表不一定代表某个会员团体，可以以个人身份进入理事会服务。

新理事会发起会员理事是：福建会馆(蔡天宝)、潮州八邑会馆(蔡纪典)、广东会馆(何国才)、南洋客属总会(何侨生)、海南会馆 (潘家海)、三江会馆(李秉萱)、福州会馆(洪宝兴)。

14名会员团体代表在2015年9月19日召开的会员大会上选出。本届选举参与投选的会员团体共有112个，被提名的会员团体代表共有18名，最终得票较多的14名参选代表获选为新一届理事。14名获选团体代表包括：南洋方氏总会(方百成)、金门会馆(陈笃汉)、新加坡安溪会馆(刘国华)、新加坡南安会馆(陈奕福)、茶阳(大埔)会馆(何谦诚)、冈州会馆(李国基)、福清会馆(林伟民)、永定会馆(曾宪民)、黄氏总会(黄保华)、琼海同乡会(庞琳)、九龙会(陈文平)、天府会(杜志强)、白氏公会(白敬平)，以及高氏公会(高允裕)。

被委任的10名理事包括郭明忠、吴绍均、郑桂发、陈奕福、尹崇明、白毅柏、周兆呈、柯木林、蔡成宗、刘智评。

新一届理事暨执委会中，李国基继续担任秘书长，副秘书长是潘家海和吴绍钧，财政是方百成，副财政是郑桂发和郭明忠。执行委员会下面有六个小组：会员事务委员会由白毅柏当主任，副主任是张自章和陈英来。社会事务委员会由周兆呈任主任，副主任是李秉萱和庞琳。文化委员会的主任是尹崇明，副主任是黄保华和林璧利。学术委员会的主任是柯木林，副主任是林伟民和李叶明。青年委员会的主任是陈奕福，副主任是李伟聪和陈本忠。产业委员会的主任是曾宪民，副主任是符敦珏和吴文昌。

此外，黄祖耀任名誉会长，名誉理事包括林理化、方水金、蔡锦淞、梁庆经、陈新荣、水铭漳、林光景和李亚丰。

与上一届理事暨执委会相比，第十五届理事会引进了四名新理事，包括何谦诚、黄保华、庞琳和陈文平，以及四位新执委，包括张自章、林璧利、陈本忠和吴文昌。新移民代表也从原来的四人增加到七人，包括钟声坚、陈文平、杜志强、周兆呈、林璧利、李叶明、陈本忠。

蔡天宝会长在就职典礼上表示，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去建立和巩固总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让总会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值得去思考，甚至要适当的调整总会的一些工作方向，要到年轻人当中，多听听他们的声音。接下来，除了凝聚宗乡团体和弘扬传统文化，总会也计划延伸触角，开展更多的项目，以便更好地传播宗乡文化，培养年轻的接班人，将总会打造成一个和谐、富有朝气的团体。

百年中山会馆 焕发年轻活力

文 · 欧雅丽(本刊记者)　图 · 中山会馆

在老一辈新加坡人的记忆里，牛车水一带的恭锡街(Keong Siak Street)曾经是著名的红灯区，如今这里已看不到昔日的风月景象，取而代之的是精品酒店、个性餐厅、各种文创小店，使这片充满南洋风情的街区成为年轻人喜欢的潮流圣地。拥有近180年历史的新加坡中山会馆就坐落在这片街区。和因为创意产业进驻而变身时尚街区的恭锡街一样，古老的中山会馆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个只有233名基本会员的老会馆，因为拥有一个成员多达54名的青年团而迸发出新的活力。

苦心栽培会馆年轻一代

新加坡中山会馆创立于1837年，由曾做过新加坡首任总督莱佛士爵士的厨师的中山人梁亚胜创办。初名香公司，不久改名为香邑公司，1845年再易名为香邑馆，1879年改为香山会馆，以符合香山县的实名。1937年，为纪念中国国父孙中山，中国国民政府把孙中山的家乡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会馆随之改名为中山会馆。成立至今，中山会馆始终秉持创会宗旨，促进乡亲团体，共谋乡亲福利及社会福利，发扬互助精神。

和新加坡的其他会馆一样，中山会馆曾经也面临着缺乏新血、后继无人的困境。2007年，中山会馆开始积极吸引年轻人入会。中山会馆顾问许运佳是会员年轻化的主要推手。为了吸引年轻一代加入会馆，他于2007年首次赞助祖籍中山的年轻人回乡寻根，结果吸引了20多名年轻人参加。这些年轻人后来也积极参与会馆活动。过去七八年，许运佳先后赞助了四次中山青年回乡寻根之旅，还不时赞助青年团的其他活动。今年2月，他在85岁寿宴上特地捐款5万元给中山会馆青年团作为活动经费。

许运佳17岁从中山来到新加坡谋生，起初在一家机器厂当学徒。31岁那年，他受会馆乡亲鼓励，自主创业，白手起家创立源利集团。他在受访时表示，他的成功受惠于会馆，他对会馆有着深厚的感情。会馆要传承，需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担任领导，因此会馆青年团的活动要尽量支持。

在许运佳的推动下，中山会馆采取一系列举措，积极吸引年轻人参与会馆活动。为了鼓励年轻人多到会馆走动，中山会馆在会所提供最快速的无线宽频服务，还购置了多台电脑、大屏幕的电视、专业的卡拉ok点唱系统、游戏机等设施，让年轻人可以在会馆上网、玩电玩、看电影、唱歌，甚至在会馆过夜。青年团不时举办烧烤会、打保龄球等青年人喜爱的活动，还和会馆妇女组一起去安老院做义工。

年轻人成会馆活动主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中山会馆青年团已经有54名团员，这些团员的年龄都在36岁以下。在今年初会馆理事改选中，42名理事中有17名都在36岁以下，而且大多被推选担任

小组的副主任职，如副秘书长、副康乐等。他们都积极参与会馆会务的推展工作。

中山会馆秘书长刘仲淦说，会馆要吸引年轻人，必须要懂得“放钱”和“放权”。“放钱”就是要舍得出钱赞助青年团的活动，“放权”就是要让年轻人能参与到会馆的会务中，让他们自己筹办活动，老一辈要能听取他们的意见，让他们挑起开展会务的重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老一辈可以从旁指导，教授经验，不过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用说教的方式，要用年轻人能够接受的轻松活泼的方式。

去年，中山会馆举办“世界中山同乡恳亲大会”，就放手让青年团统筹统办。青年团充分发挥创意，策划了一系列活动，如举办“中山情，新梦想”世界征文比赛、“文化中国，名家讲坛”中医养生讲座、“新青年，新梦想”世界中山青年讲座，一连三天，内容精彩，深获海内外中山乡亲赞赏。恳亲大会晚宴当晚，青年团用遥控飞行器在会场上方表演“龙飞凤舞”、木偶兵鼓乐队表演水鼓，还用魔术手法移交会旗给下届主办地的代表，别出心裁的节目给来宾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外，中山会馆的许多常年会务活动也交由青年团策划筹办，比如每年颁发奖学金，中秋节庆祝活动等。青年人的加入，让会馆充满生机，老一辈也从年轻人那里学到很多新鲜东西。已在中山会馆工作30多年的座办杜旺仔虽已年逾七十，但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都能熟练使用，还常常请教青年团成员新的电脑操作系统的用法。

凭借青年团的亮眼表现，中山会馆荣获了宗乡总会颁发的“2014年度杰出会馆奖”。杰出会馆奖评审团对其的评语为：“中山会馆再次焕发活力，吸引和引导年轻一辈到会馆参加活动的有效手法，值得其他会馆观摩和学习。”

最年轻的青年团团长

目前，中山会馆青年团团长由理工学院学生袁可欣担任，她今年才19岁。2014年1月，当可欣通过青年团成员投票被选为团长时，只有18岁，是本地宗乡团体青年团中最年轻的团长。虽然年纪小，但她已是会馆的老会员了，自12岁起她就跟着爷爷奶奶参加中山会馆的活动，可以说从小在会馆长大，跟会馆有着很深的感情。

可欣说，在中山会馆这些年，交到了很多自己校园外的朋友，她也跟长辈们学习了很多，比如组织会议、筹办活动等。长辈们都非常支持青年团的活动，也很支持她的工作。会馆活动还提高了她的粤语和华语的水平。

青年团副团长刘琦芬今年36岁，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几年前由早已是会馆会员的叔叔介绍，开始参加会馆活动。在此之前，她对会馆的印象是一个只讲方言的乐龄组织，参加宗乡组织是那些怕输的家长让孩子进名校的最佳途径。加入会馆后，她才发现会馆非常积极地推动年轻人参与，活动安排也很有意思。会馆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她的四个孩子有了与其他长辈们交流的机会，能够与其他青少年一起参与活动，拓展视野，并且通过会馆的活动认识华族的传统。

当谈及会馆如何吸引年轻人时，可欣表示，应该鼓励会馆的会员们带自己的孩子参与会馆的活动，从小培养他们对会馆的感情。年轻会员可以介绍自己的亲戚朋友加入会馆，如果能在这里找到朋友，那么他们就很乐意参与会馆的活动，对会馆也比较有归属感。绮芬则表示，会馆应该组织兴趣小组，并举办一些年轻人喜欢的活动，如郊游、长跑等，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另外，会馆也应扩大宣传渠道，将会馆讯息放在网络上，吸引更多人注意。

青年团举办很多年青人喜欢的活动

会馆组织青年团成员回中山交流

台湾名厨阿基师出席“福建美食天地”，与观众做近距离接触

福建菜与新加坡福建文化节

文图 · 陈伟玉

新加坡的华人人口约占75%，其中最大的方言群是福建人，主要来自福建省。由于福建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山地多，土地贫瘠，无法耕种，所以靠海维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门户大开，福建人为了生存，大量移居新加坡，同时将原乡的传统文化包括饮食习惯和技能也带到新加坡，造就了本地华人社会的多元化。

新加坡素来有美食天堂之美誉，其饮食文化具有多元性、融合性、地域性和国际性的特征。福建会馆为了庆祝成立175周年，举办第五届新加坡福建文化节之美食节“福之古早味”。2015年9月4日至5日上午10至下午4点在天福宫前广场，与闽属会馆合办“福建美食天地”，销售各式各样福建菜肴及特产。

另外，自9月4日至18日在直落亚逸街137号，举办文化展《福建菜的故事》，推介十余道福建菜的来历及烹调过程。福建会馆于9月4日至18日期间，与聚春园、莆田餐馆和茗珍奋记这三家著名福建菜馆合作，推出“福享美味”之旅，让公众品尝福建美食佳肴。此外，邀请台湾名厨郑衍基，又称“阿基师”，于9月5日到新加坡主持“名厨阿基师之约”现场烹饪示范讲座。除了举办美食节活动以外，福建会馆还创作一首《福建人，做阵行》的主题曲，赞扬福建人勇于拼搏的精神。

参展福建菜的特色

“福建美食天地”的活动共有九间闽属会馆及两家闽籍餐馆参展。福建会馆借由此平台以凝聚乡情，促进宗谊，弘扬传统饮食文化。福建会馆展销的是豆沙饼、马蹄酥、云片糕以及红龟粿等小吃，由老饼家“陈福成”提供，另外还销售薄饼、矿泉水和饮料。马蹄酥虽然是同安的特产，但是同安会馆在这次活动中销售酒，分别有中国和法国葡萄酒、花雕酒、玫瑰露、女儿红、人参酒和福州米酒。花雕酒、玫瑰露、女儿红、人参酒和福州米酒具有烹饪调味以及强身健体祛寒等功效。

晋江会馆销售的是碱仔粿和糯米饭，充满古早味，尤其是碱仔粿更是

市面上少有人销售的传统小食。碱仔粿，俗称矶子糕，采用碱水拌米粉蒸成，可以配椰糖浆(Gula Melaka)和卤汁食用。晋江会馆特别委托晋江人开设餐馆制作碱仔粿，两天供应140份。展销时，由妇女组和会员将碱仔粿切成块状装在塑盒销售。糯米饭，又称油饭，在糯米饭加入虾米、香菇和三层肉，蒸得恰到好处，才会变得软，但又不失嚼劲，吃起来不会腻人，味道更香更浓。糯米饭是该会馆董事夫人烹调，供销售200盒。

惠安会馆推介肉羹面线签，在新加坡很少有人销售，由一家“泉南珍”摊主提供，采用猪肉、白菜、小虾、面线和豆签(即是米豆制成的扁面条)同煮，然后加上番薯粉勾芡即成。肉羹面线签的面条吃起来滑润顺口，深受公众青睐。

永定县位于福建省西南部，为客家人聚居地。永定会馆第一次参展福建会馆举办的美食节活动，推介五香虾饼和炒米粉。曾宪民会长为了此次活动，全家总动员，包括儿子、媳妇、妻子及亲属都来帮忙烹饪及销售。五香虾饼包括虾饼、虾枣、油条苏东、豆枝鱼肉、芋酥、鱼丸，由曾家亲戚独家秘制，供销售200盒。曾夫人喜欢烹饪及研究各种料理的制作，如芋子包、算盘子和炆猪脚等，经常在永定会馆开班授课，教导成人烹饪及儿童制作糕点。

安溪盛产茶，其中铁观音最为有名。铁观音原产安溪县西坪镇，起源于清朝雍正(1725-1735)年间，可见历史悠久。安溪铁观音属于乌龙茶，乌龙茶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的半发酵茶类。其树势不大，枝条披张，叶色深绿，叶质柔软肥厚，芽叶肥壮。安溪会馆邀请“白新春茶行”在福建美食节设一个茶摊，介绍特级普洱茶和福建各类名茶，如金奖金毫普洱熟饼、陈年普洱、特级香片、正岩大红袍、极品肉桂、罗岩黄金柱、观音王、超级香极极、一等铁观音等。另外，又邀请“金品香食品工业(私人)有限公司”展销肉干皇、旺来肉干和肉丝等食品。据白福春所述，新加坡的肉干源自福建厦门，当地肉干是用冬天冷风吹干腌制的肉片，然后再去烘烤而制。“肉干皇”主要采用瘦肉制作，肉片较厚；而旺来肉干在瘦肉上加入新鲜黄梨揉制，再去烧烤，所以味道独特。肉干是每逢佳节必备的食品之一，亦是新加坡人迎来送往的最佳礼品。

南安会馆为了参与此次美食节，特地从原乡邀请名厨到新加坡来制作南安小吃，如诗山卤面、香菇蛋汤、粕丸和炒薯粉。诗山卤面是南安诗山凤山寺山脚下最广为流传的经济小吃。食材是生面条、瘦肉、海蛎、香菇、虾米、蚝干和蛋。凡到诗山进香的香客，必定品尝诗山卤面。而香菇蛋汤则是南安民

永定会馆会长曾宪民(左一)及其美食团队

南安会馆的炒薯粉

间极其受欢迎的小菜，食材是香菇、生笋、鸭蛋、瘦肉和高汤。再者，粕丸是用五花肉、葱头和马舌菜揉成一团，然后沾上番薯粉、面粉和鸡蛋拌成的蛋液油炸而成。南安人又称粕丸为最寄乡思的团圆丸，其肉馅软嫩酥脆，又不油腻，吃起来让人回味无穷。另一道炒薯粉，采用三层肉、洋葱、猪心菜、薯粉片、香菇、蚝干和肉羹一齐炒，过后加蒜叶即成，好像炒粿条那般，吃起来香滑可口。

金门会馆推出芋糜和宴菜，由会馆妇女组亲自下厨烹调；另外，还有贩卖金门特产，如金门面线和金门XO酱，从金门进口。芋糜的用料丰富，分别有芋头、虾米、蚝干、香菇、三层肉与豆干，而配料有花生、葱油酥及青葱。为了煮这道菜，妇女组主厨凌晨四、五点就到会馆开始准备烹调。宴菜是金门特有的宴席菜，也是金门人每逢大日子，如喜宴、周年纪念宴会，一定会有的一道宴菜。食材是大白菜、猪肉、香菇和红萝卜等，全部切丝与大骨汤同煮，勾芡起锅，又清脆爽口。金门面线是纯手工制作，所以较有弹性，而且煮的时候也比较不会断掉。金门面线XO酱是专为面线秘制的调味酱，用料包括干贝、鱿鱼、虾仁、辣椒和红葱头。

福州会馆推出红糟鸡、福州鱼丸、福州燕丸、白粿干和福州面线，由“萧钟华餐室”提供。福州鱼丸是采用鳗鱼、西刀鱼、番薯鱼和红鱼混合打制，然后在鱼丸里放入肉碎就成，而红糟鸡则是用酿红糟煮成。白粿干和福州面线是直接从福州进口销售。

除了闽属会馆参与以外，福建会馆也邀请专门制作传统福建糕点起家的餐饮公司“喜友”供应芋粿，又称芋头糕、金瓜粿、南瓜糕和笋粿，还有甜品如冷冻汤圆西米露和汤圆糖水(热)。“喜友”曾在裕廊东开设餐馆，目前专营餐饮供应，属于东江集团的公司。

“美香楼”是一家老字号福建菜餐馆，目前已经传至第三代经营。自2006年福建会馆举办美食节以来，“美香楼”每次都有参展。此次活动销售福建扣肉包、五香虾枣、麻糍和蚝仔面线，尤其福建扣肉包很受欢迎，排队抢购。另外，“美香楼”还分享了五道菜(八宝全鸭、红烧扣肉、花生汤、香脆蚝煎及鱼头芋汤)的烹饪过程，透过多媒体的方式，展示在文化展中，供观众学习烹调。

文化展与台湾名厨阿基师烹饪讲座

文化展的主题是《福建菜的故事》，图文并茂地介绍福建菜的典故，分别有佛跳墙、鸡汤汆海蚌、太平燕、春卷、肉骨茶、妈祖面线、光饼(征东饼)、太平面、七星鱼丸、福建红糟鱼、荔枝肉、扣肉包和芋泥等。台湾名厨阿基师也出席“福建美食天地”，与观众做近距离接触和交流。他说：“新加坡的福建菜比较道地一点，因为台湾的闽南菜都强调创新，所以就会做出改变。”他在参观文化展时，特地讲解图中“福寿全”三字，指出源自福州话。诗人作了一句“坛启荤香飘四邻，佛闻弃禅跳墙来”，也就成为佛跳墙的由来。5日晚上7点，阿基师在信立路5号多功能礼堂，主持及示范“糟鱼”和“太平长寿面”的烹调诀窍。他在会场烹调太平长寿面，祝贺福建会馆成立175周年。当晚观众席高朋满座，且观众反应热烈，赞不绝口。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金门会馆馆妇女组与台湾名厨阿基师

美香楼 — 福建扣肉包

用华文讲述“精彩”

文图 · 黄兰诗

华文义工导览员的诞生、成长

2004年5月29日，《联合早报》的生活版，有一则新闻标题为：“用华语讲解历史”。该标题的上面还有一行细小文字：“新加坡历史博物馆首批华语讲解员今天登场。”虽然寥寥数语，并不引人注目，但首批华语讲解员的“今天登场”，在新加坡历史博物馆导览史上却也算“石破天惊”的大事，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访客们在作为国家博物馆的新加坡历史博物馆，可以看到华文义工的身影，享受华文导览服务了。

当初，博物馆的导览以英文为主要媒介语，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面对访客对华文导览愈加热切的期望，博物馆方面决定打破英文116年来的“一统天下”，从2004年起使用华文导览员。为了培养合格的义工，馆方专门开设了培训课程。当年报名参加培训者中，有50人有幸获选参加培训，其中完成全部课程者47人，最后成为导览员者32人。他们大多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凭，来自教育界、金融界、科技界、设计领域，也有家庭主妇和退休人士等等，各自背景不同，工作经验和生活经历也相异，可谓来自“五湖四海”，因为志同道合凝聚在了一起。华文义工自此成为历史博物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华文义工团队诞生后，首先在新加坡河畔的临时展厅登场。最初导览

员没有排班制，来参观的访客若需要华文导览，须事先要求博物馆安排，就是说导览员都是根据需求临时上阵。华文义工成立“华文义工执委会”，负责统筹自己的导览工作后，义工们有了自己的“自治”组织，有了自己的“家”。执委会在工作中不断摸索经验，2006年国家博物馆(现址)完成大修葺之后，义工们获得了更大的舞台，执委会亦顺应“形势”变化，充分发挥作用，在管理方面更加系统化和合理化，建立了固定的排班制度，定期举办各类讲座或内部分享会等，在提高导览员自身知识和讲解技巧等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团队意识。

华文义工这个大家庭走了十年，第一批的成员只剩下13名，但一路上不断有新成员加入。到目前为止，国家博物馆的义工导览团队已达57名组员，可谓“人丁兴旺，生生不息”。

追求“专业”

华文义工都对历史，尤其是本土历史情有独钟，因而历史“细胞”相对而言比较发达，对于导览这一工作也是满腔热情，但作为一个称职尽责的义务导览员，仅此还远远不够。

有人说导览员不是专家而是“杂家”。这完全是由其特殊的工作性质使然。国家博物馆的展览厅分为常设馆和特别展览两大部分。前者的展览内容是新加坡本土的历史，加上4个生活馆，一共5个常设展览厅，主题内容基本不变动。对于这一部分，导览员经过多年导览，基本上都“如数家珍”；后者是在特别展览厅进行展览，每一、两季就换上全新的主题，从本土到海外、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从历史到美术等跨度非常大，因此每场特别展览都是新的挑战。导览员就像是充电池，需要不断充电，不同的是每次充的电不同，充的是不同的知识。

要做一个尽责的“专业”导览员，还需要精心“备课”。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能够圆满完成导览任务，让访客满意，对于每个新展览，义工们几乎都是从零开始准备，少不了上课学习，查找资料，走场揣摩，完善导览稿，设计讲解路线等等。考虑到访客们可能会“节外生枝”，提出一些题外问题，义工们都会围绕展题，尽量扩大相关资料的收集和学习，力求有问必答，尽显“专业”。

要做一个尽责的“专业”导览员，还必须“义”字当头。对于义工而言，自愿贡献个人的时间及精力，不图任何物质回报，乃是“义”之所在。导览员八成以上都有本职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跟进博物馆的活动，面对特别展览不断变换的主题，不难想象每个人为之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不过，导览员们都恰似一群发烧友，长期以来乐此不疲，再忙也会尽心投入这份业余工作。对他(她)们而言，既能和观众分享宝贵知识，又能与志同道合者相互切磋心得，就是所图的“回报”了。

导览是否“专业”，能否自始至终吸引访客的注意力，可谓主要的评判标准。为此，导览员们非常注重听取访客的反馈，彼此之间也经常交流经验，分享导览心得，尽量弄清访客们想听怎样的讲解，了解其喜好和需求，因人施讲。当然，除此之外，导览员也会付出一定的“爱”。义工们不仅会事先熟悉展物的相关知识，更会“爱”上展物。只有达到此境界，才会全身心地探寻与展物相关的每一点资讯、每一则故事、每一个惊人之处，才会用热情和生动的语言来讲解。也只有这样的导览，才能吸引访客。

再接再厉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所举办的展览，无论是常设展“新加坡历史展览馆”和“生活馆”，还是特展，如：《乌克兰黄金珍宝展》、《新加坡1960》、《列支敦士登大公国珍品特

导览员陈珀如(右)从资深研究员兼策展人May Khuen Chung手中接过十年文化义工奖

展》、《庞贝遗物看古罗马人的日常生活》、《现实与梦想》、《旗遇》、《变迁万画》、《我们：让定格的故事延伸》等等都可以看到华文义工团队活跃的身影。自固定排班制度建立后，每周一、六和周日的特定时间，导览员都会风雨无阻地准时到场，在博物馆柜台一角静候到访的客人，义务提供“华语”导览服务。

据统计，十年以来，接受华语导览的访客人数达上万人，除了本地华族，还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地的游客。就一个多元民族的蕞尔岛国来说，以上数据还是令人鼓舞的。华族是新加坡的多数民族，但华语的使用却有限，但愿通过这样的舞台，让华族社群通过自身母语了解过去，珍惜现在和洞察未来，也希望华语导览在推动华语的普及方面能尽微薄之力。

义工们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从博物馆收到的访客来信看，其内容都是表扬华文义工们热情耐心的工作态度，赞扬义工导览水平专业。这种褒奖无疑给义工们极大的鼓舞。

为了肯定既往的成绩，鼓励义工们再接再厉，2014年的5月31日，馆方暨华文义工团队执委会颁发了“十年文化义工奖”的奖牌和奖状。13位义工导览员获此殊荣，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人获得此奖，也会有二十、三十年奖出现。

时光荏苒，我们首批华语导览员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了十年有余，回顾这段历程，在倍感自豪的同时，也深感导览员工作之平凡而特殊。我们虽然只是义务团体，但实际上每个人都以“专业”为己任，将自己视为博物馆的代言人。

希望通过本文的介绍，能得到华语社群对新加坡本地华文义工导览员的关注，给予更多的支持和鼓励，使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用华文讲述“精彩”。

（作者为国家博物馆华文义务导览员）

十年义工文化奖牌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历史馆导览现场

书法艺术 拓广于民间

文 · 尤今

“新加坡生活节奏快速，为了松懈身心，许多人在下班后，都会找个消闲活动。书法，具有修身养性的作用，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是很好的慢活方式，也是一种饱含文化内涵的休闲方式。”

——陈亮

拥有三千余年历史的书法，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然而，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里，快捷便利的电脑已经取代了书写工具，书法的实用价值逐渐淡去。这一门需要极大耐心慢慢练就的古老艺术，在新加坡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里，会不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呢?

为了了解书法在新加坡的学习状况，南洋女子中学的13名少年记者访问了陈亮老师和吴晓燕老师；也同时访问了成年学员叶菁菁和钟福强、在籍学生崔钰和宣颖。

陈亮老师是新加坡美术总会秘书长，授课于天逸书院，勤学书法30余载，功底扎实。她指出，新加坡生活节奏快速，为了松懈身心，许多人在下班后，都会找个消闲活动。书法，具有修身养性的作用，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是很好的慢活方式，也是一种饱含文化内涵的休闲方式。在工余之暇，让自己在舒适的氛围写书法，是对自己的一大奖赏。

鉴于此，在百忙中拨冗到天逸书院成人班学习书法者，包括了各行各业与各种年龄层者。目前全职以书法创作和授课为生的陈亮表示：在新加坡，尽管对书法学习有兴趣者大不乏人，遗憾的是，上班族有太多公事的牵绊，因此，时学时停；不过，也有些人，抱着极大的热忱，风雨不改地坚持上课。

叶菁菁是陈亮的学生，目前经营书局，抽空学习书法，纯粹是对中华文化的向往与热爱。她认为电脑打出来的汉字是永远也取代不了书法艺术的，因为书法的字体变化多端，富于生命力；但电脑的字又僵又直，死死板板的，把书法的精髓都“谋杀”了。

上市公司董事钟福强也是陈亮的学生，纯受英文教育的他，初习书法时，连自己的华文名也不会写，然而，经过半年的努力后，已经懂得欣赏书法的美了，可见语言并不是学习书法的障碍。

在校园里，书法的传承一直持续不断。

新加坡许多中小学都设有书法培训班，以南洋女中为例，目前就有30余位学生每周在书法培训班勤练书法。一向积极推广中华文化的王梅凤校长认为，让学生学习汉字的书写艺术，能够丰富他们的艺术修养与内涵，也可以助以陶冶性情。

在校园里授课的书法老师吴晓燕指出，每个不同年龄层的学生们，性格和学习热忱不一，因此，教学方法必须做出不同的调整。12岁以下不谙世事的小学生，她以近乎哄骗的方式进行趣味性教学；在叛逆期游走的初中生，她循循善诱，晓之以理；思想比较成熟的高中生呢，她就会根据学生的作业提出看法，共同讨论。

南中书法培训班的佼佼者，是宣颖和崔钰。

宣颖觉得学习书法能帮助她培养专注的能力，若想把字写好，就必须心无旁骛。书法也能教学生如何做人，宣颖举了颜真卿的楷书为例，它的笔画工整端正，写字时，必须坐得端正，笔拿稳，才能把字写好；她从中得到了启示：要把事情做成功，每一个细节都不可放过。崔钰呢，则觉得学书法能培养敏锐的观察力，书写者需要仔细揣摩书法家的一笔一画，之后，才能更好地运用到自己的书法上。书法也有利于培养耐心和毅力，必得一笔一划练起，横竖撇捺，单单一个笔画需要练习百遍才能练精。

书法这门深邃美丽的艺术，在校园内外诸多书法老师热心的推动下，生生不息。衷心希望，假以时日，书法学习能够成为新加坡人的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

书法艺术的传扬
——访陈亮老师及其学生

访问与撰写 · 张宇宁、陈韦璇、林乐佳、黄雯雯、周亭萱、徐文馨、谢颂芳、蔡恺凌、谢幸仪

我们从地铁站出来，就看到了满脸笑容的陈亮老师拎着一大袋面包和矿泉水朝我们走来，她的热诚立马感染了我们，她的健谈也化解了彼此初次晤面的陌生与隔阂。

我们随着她来到了她所授课的天逸书院。

课室里，坐着的是在百忙当中拨冗前来学习书法的成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尽管年龄不同，性格各异，然而，他们对于学习书法的热忱却是一致的。

悉心指导他们的，正是陈亮老师。

陈亮老师具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眸子，在学员专注练字时，她敏锐地观察，一针见血地抓出毛病而加以纠正；学员表现好时，她当然也不吝赞美。有些学员，重复犯错，她总鼓励他们继续苦练，直到每一个细节都练得完美为止。在教学上，她最强调的是与学员的沟通。

学习之乐，尽在不言中

天逸书院书法班的学员

陈亮老师是新加坡美术总会秘书长，自幼勤学书法，功底扎实。她以颜柳楷书为基础，广泛临摹众家名人碑帖，尤擅行草，在30余载学习书法的艰辛道路上，不断探索，精益求精。尤足称道的是，她得天独厚，左手右手书法各具特色——右手书法大气磅礴、意境高远；左手书法质朴空灵、古意盎然。书法作品多次受邀参加国内外大展，并获得国内外机构及收藏家收藏。

陈亮老师的书法培训班，可以分为少年班和成人班。她指出，新加坡的教学媒介以英语为主，年轻的一代，对中华文化认识不多，因此，她刻意在少年班里加入弟子规的学习和成语故事的讲解，一方面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也借此加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识。

至于成人班，知识的涵盖面就广得多了。首先，她会深入浅出地让学员了解汉字的演变、书法发展的历史和各大名家的书法风格，借以帮助他们确定自己的学习方向，打个比方，学员如果有兴趣学颜真卿的书法，就必须充分了解颜真卿书法那种雄伟开阔的磅礴气势，学习起来，才会得心应手。她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演员在进入一个特定的角色前，就必须要先了解这个角色的生活背景，才能恰如其分地把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

学习书法　生活优雅

陈亮老师指出，书法，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更是东方美学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著名书法家沈尹默称：书法无色而有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旋律，引人欣赏，心畅神怡。另一位著名书法家钟繇在《笔法》中提出：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书法宛若一道乌黑的墨线，横空而来，在洁白的宣纸上留下了一连串的美妙音符与韵律。虽然，现代人的生活进入了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电脑取代了书写工具，书法的实用价值逐渐淡去，然而，书法独特的艺术价值，却是无可取代的。

陈亮老师希望通过书法学习，提倡一种优雅闲适的生活方式。她说：“新加坡生活节奏快速，为了松懈身心，许多人在下班后，都会找个消闲活动，诸如：瑜伽、健身、绘画、插花、音乐等等。书法具有修身养性的作用，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是一个很好的慢活方式，也是一种饱含文化内涵的休闲方式。此外，如果学钢琴，需要耗资买一架钢琴，但是，书法便捷得很，只要有毛笔、墨汁和纸，就可以任意挥毫了。待慢慢进入状况，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能力，可以再添置精美的文房清玩珍品。”她微笑地说，工余之暇，让自己在舒适的氛围写书法，是对自己的奖赏。

陈亮老师指出：对于初学书法者，许多基本的细节都不可以忽略。比方说，坐的姿势、执笔的方式、运笔的方法等等，都有所讲究。如果拿笔的方法错了，书法也很难掌握得好；倘若在练书法的时候歪头歪脑，不一会儿，腰背就会酸痛了。

至于从何种书体开始，她说没有固定的标准，大部分先学楷书，也有从隶书，甚至篆书着手的，见仁见智。一般上，陈亮老师会让初学者先学楷书。她指出，楷书又名正书，从隶书逐渐演变而来，整体横平竖直，笔画分明，工整规范，干净利落。在结构上强调笔画和部首均衡分布、重心平稳、比例适当、字形端正，因而成为了学习其他书体的基础。历史上涌现了许多楷书名家，如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頫、虞世南等等，都是楷书的佼佼者。陈亮老师

的教学一般上喜欢从柳公权开始。她说，楷书中有“颜筋柳骨”之说，这里的“骨” 是指字刚猛有力，气势雄强。现代美学家宗白华认为“骨”就是笔墨落纸有力、突出，从内部发挥一种力量，虽不讲透视却可以有立体感，对我们产生一种感动的力量。所以从柳体楷书清劲刚健、遒劲秀挺的字体入门，能帮助学员打下扎实的基础。

桃李满天下的陈亮老师，是否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学生呢?

一询及此，陈亮老师便双目湛湛生光地说：“有位学员钟福强，是纯粹受英文教育的，上课之前，从来不曾碰过毛笔，连自己的华文名字都不会写。上课的第一天，连怎么握毛笔都不会。但是，他学得非常专心，非常用心，学了不久，便能写出不错的字。”顿了顿，又说：“有时，一点基础也没有，反而容易教，因为他就好像是一张白纸嘛，你教他做什么，他就完全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受英文教育者，最大的难处在于他们不熟悉笔顺，也不清楚字形的结构，所以，写出来的字，可能这里少一点，那里少一横，不过，这种现象，慢慢便会纠正过来。”

接着，陈亮老师又举了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位牙医，做事非常严谨。她行医长达50年，可能因为职业需要步步为营的关系，她写字的时候，尽管我已详尽解释了字体的结构，可她还是不放心，反反复复地、仔仔细细地研究每一横每一划每一撇要放在哪里，就像补牙拔牙一样，必须百发百中，不能够有稍稍一点偏差！”

在学书法这一码事上面，天分是否至关重要呢?

对此，陈亮老师表示，有些人一出手，字就写得非常漂亮，老师讲课，他能很快抓到重点，经过指点之后，进步快速，不论是笔画、线条、字形、结构，都非常好。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天才哦！真有伯乐发现了千里马的兴奋。但是，只上了短短几堂课，他就忙于其他事，暂停了书法的学习。所以说，天分固然重要，可是，坚持和努力却更重要。有的学生，平平稳稳的，没有一步登天的想头，就是持续不断地学，旷日持久，就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比那位天才同学写得更好。所以说，学书法，首先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其次，必须持之以恒地下功夫，才能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每一个人都有着迥然而异的书法风格，在比赛里，如何判定水平的高低呢?

陈亮老师表示：书法的风格，百花齐放，有者遒劲有力、有者柔美内蕴；有者如流水、有者如细雨，尽管风格不同，还是有高低之分。大到作品整体的章法布局，气韵意境，或是具体到笔画线条，运笔的方法、字形的结构，包括墨法的讲究，都值得一一推敲，以论高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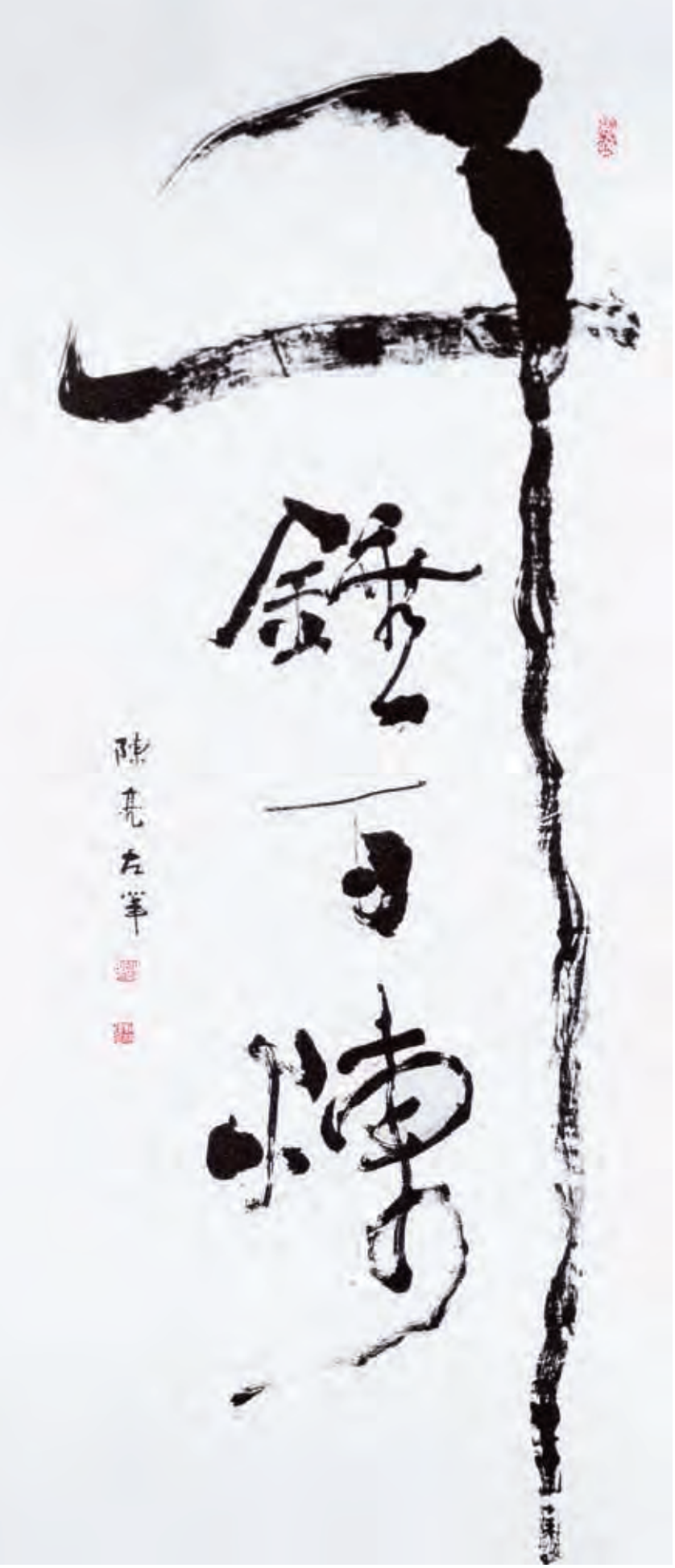
师法自然　打动人心

我们要求陈亮老师谈谈她在书法教导方面的心得，她说了两大要诀。

其一是：“师法自然”——打开五官，用你的眼睛、用你的嗅觉、用你的身上的其他器官尽情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

陈亮老师指出，学习书法使她拥有一颗感知美的心。书法艺术，与自然界的一切相关，与生命相通。诚如书圣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所着《笔阵图》中云：“点，似高山之坠石”，“横，如千里之阵云”，“竖，如万岁之枯藤”…… 形容一个“点”，好似一块从高处坠落的石头，里面包含着速度、力量、重量以及质感。“横(一)”，也就是一根线条，按着不同个性的书写者，呈现出或厚重、或纤细、或斩钉截铁、或缠绵婉转的感觉，“千里之阵云”，是沉静辽阔的大地上云层流动的记忆，是开阔的胸怀。万岁枯藤般的“竖”，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感受自然界的美，融入书法，作品就能牵动人心。

陈亮老师(右一)与南中少年记者合影



《千锤百炼》(左笔)

其二是：“要打动人心”，艺术创作，无论是书法、绘画、文学还是音乐，作品要能打动人心，进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过目不忘。陈亮老师曾经在2002年的创意书法展上展出一幅两米多，气势宏伟的作品《千锤百炼》，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多年以后，有人遇到她，已不记得陈亮老师的姓名，然而谈及《千锤百炼》，依然赞叹不已。陈亮老师说，一件作品就是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标记，即使别人可能淡忘了自己的姓名和样貌了，但对于作品还是念念不忘。

陈亮老师认为“独创性”对于书法艺术是极为重要的，好的书法，是必须有内涵、有创作理念和背景故事的，你必须把自己整个人放在里面。她以《千锤百炼》这幅作品来加以说明：“那时，我住在靠近中峇鲁处，外面大兴土木，却正好碰上我要考试，工地上打地基的声音，使我烦得不得了，完全无法专心读书。这时，我突然想到‘千锤百炼’这四个字，生活就真的是要靠这样锤炼出来的。想着想着，我的心就慢慢地静了下来。境由心生，当我写《千锤百炼》这幅书法时，尽管外面还是闹声喧天，可我已是心静如水了。以这种开悟的心境写出来的书法，便有了另外一种味道。”

无数桃李　受惠无穷

陈亮老师桃李满天下，我们访问了其中的两位学员叶菁菁女士和钟福强先生。

桃李之一：叶菁菁女士

一踏入书局，就进入了一个为书香缠绕的静谧世界。迎接我们的，正是这家书局的经营者叶菁菁女士。

叶菁菁告诉我们，20多年前，当她从福建移民到新加坡后，就很想学习书法，多年来，出去旅游时，有机会看到文房四宝，就会买回来收着，期待有机会用上，这纯粹是对中华文化瑰宝的神往与热爱。到了2012年，她才找到机会开始学习书法。

叶菁菁的第一支毛笔，是和丈夫第一次去北京时买的，它蕴藏着两人共同的美好记忆。她说，好的毛笔，毛不可以太细、太软；柔软度要够，又要有弹性，要顺手，不常脱毛。

初学书法时，叶菁菁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她的笔很“不听话”。她笑嘻嘻地说：“你要它直，它却弯；你要它弯，它又直……”看到自己竟然写出那么丑的字，实在受不了呀！但是，对书法浓厚的兴趣却

叶菁菁(右一)接受访问后摄

使她“勇往直前”。

叶菁菁最喜欢的书法家，是中国的四大楷书家之一赵孟頫。赵孟頫的行楷很秀气，也很生动。在秀气中，又透出了骨气，此外，他书法的结构也很严谨。叶菁菁说，以她目前的水平，学行楷是最合适不过的，因为行楷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清清楚楚，易于上手。

曾经，叶菁菁临摹赵孟頫的帖，但是，写了无数张都不满意，一次又一次地揉掉、丢弃，心情糟透了。过后，叶菁菁意识到，心情对写书法是非常重要的。心情平和时，书法自然就会写得比较好，反之，就会越写越糟糕。她悟出了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强迫自己一直写下去，要休息；让心情平复了，才重新挑战自己。

叶菁菁指出：写书法时要坐得端正，让心沉稳下来。若是要临帖，一定要先读帖，不可以马上提笔就写。读帖时，必须注意字形结构。比如：一个小小的点，位置非常重要。若点不到位，整个字就很可能斜掉，失去了原先的样貌。读完帖之后，下一步是“书空”，也就是在空中书写。接下来，把整个字背下来，胸有成竹之后，才开始写。提笔写时，有更多的讲究。运笔的方法、用墨的方法，等等。就连纸，都可能影响作品的完美。纸的吸水性、柔软度，都是考量的因素。书法，是非常讲究细节的。

身为陈亮老师的学生，叶菁菁认为陈老师的教学法与众不同。在学生学习书法技巧之前，她总会介绍某种字体的特点和背景，让学生对书法的历史有个整体的概念，并且让他们学会如何欣赏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理论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实践是让学生掌握书法技巧，而理论则能打好基础，让学生了解书法背景。学生在学习某一种字体为主的过程中，陈亮老师还会花一两堂课让他们练习临摹不同名家的字，让他们感受不同的风格，并且进行对比，这有效的教学方法能帮助同学更快速地掌握书写技巧。

谈及书法比赛的意义，叶菁菁表示：学习本是修身养性，寻找内心平静的过程，而比赛又充满了竞争意识，看似有些冲突，但是，比赛的真正意义有三点。第一，是参与的精神。第二，是为了推广中华文化。第三，是为了对自己书法的进步有所肯定。所谓“各花入各眼”，虽然风格不同，但从作品整体的结构，安排和格局，以及笔法和墨法，是可以清楚看出一个人的功底的。

尽管目前电脑已经能打出很完美的汉字，但它永远代替不了书法。书法的字体直而不直，横而不横，变化多端，且非常灵活；但电脑的字又直又硬，很死板，完全失去了书法的灵气和神韵。电脑表达不出书法家的性格和心情，把书法的精髓都“谋杀”了。

桃李之二：钟福强先生

在陈亮老师“天逸书院”的成人书法班里，只有一位男性学员，他

钟福强享受练字的快乐

就是现年47岁的上市公司董事钟福强先生。这位受英文教育的男士，对于中华文化接触不多，但好学的他并没有因为语言的障碍而影响学习书法的热忱。

钟福强表示，他至今只学了半年的书法。由于华文基础不够扎实，在学习的过程中常常闹笑话，写出的字不是少了一点、就是少了一撇、要不就少了一捺，搞得陈亮老师在检查作业时不时叹道：“咦，怎么这个字看起来怪怪的？”该怎么克服这个障碍呢？钟福强笑答：“学咯，没有什么困难嘛，不会就要慢慢练习，等于是给自己一个压力。”可见，“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钟福强经过六个月的刻苦练习，已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书法水平，也开始懂得欣赏书法的美了。

钟福强喜欢跑步，这是一项激烈的活动，恰恰跟书法要求的心平气和背道而驰，他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呢？

对此，钟福强有个极妙的解释：“我如果跑马拉松的话，是长跑，你必须保持平和的心境，才能完成这长达四个小时的慢跑。表面上，你不断地在跑，但是，你的脑子是十分安静的。这个道理，其实跟书法是蛮接近的；因为写字时，你的手虽然在动，但是，你的心必须非常宁静，才能专心地把那个字写好。”

初习书法的钟福强，学的是柳公权和颜真卿的书法，他认为要把字写好，必须拥有“双心”——耐心和专心。

对于有意学书法的人，他最想说的一句话便是：

“想学就学，不要犹豫。”

校园墨香
——访吴晓燕老师及其学生

访问及撰写 · 章奕文、张韵琦、廖嘉欣、张玮真

谈起书法，吴晓燕老师的心情如沐春风

走进吴晓燕老师的课堂，一阵墨香迎面扑来。

吴晓燕老师并没有站在讲台前一板一眼地授课，而是任由学生选择字帖进行练习。有者选择自己一贯临摹的字帖、有者上网寻找名家作品。学生们根据各自的喜好来练习书法，整间教室洋溢着一股轻松愉快的学习气氛。每个人或坐或站，手中执着或大或小的毛笔，蘸上墨汁，旋转笔锋，一个个鲜活的毛笔字便跃然纸上，赏心悦目。吴晓燕老师不停地在学生当中走来走去，仔细观察每一个学生执笔的方法，只要姿势稍有不对，或者，字形笔画稍有缺憾，都会被她一眼瞅出，她会弯下腰来，用各种手势对个别学生进行指导。当学生通过她的讲解，领悟到自己的错误而纠正后，吴晓燕老师便会欣慰地微笑。一节课两小时下来，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得到吴晓燕老师的指导与教诲，书法程度因而得以慢慢提升。

校园授课　生动为要

1999年，在老师的推荐下，吴晓燕老师在南洋小学展开了她的教学生涯。虽然之前也在柏盛小学、国专长老会小学等学校授过课，南洋小学却是吴晓燕老师的第一所常驻学校。

当时，南洋小学的王梅凤校长对她说道：“我衷心希望南洋小学能像端蒙中学一样，学生能够培养起学习书法的炽热风气，当人们一谈起书法时，就会提起南洋小学。”

王校长这一番话，成了吴晓燕老师多年来在校园推动书法的驱策力，也鼓舞了她持续不断地将书法传承下去，使书法能在校园里发扬光大。目前，她是南洋小学、南洋女中、华侨中学 (高中部)等等学校书法培训班的老师。

吴晓燕老师坦白承认，她并没有受过正式的教学训练，她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寻找适合自己、也适合学生的独特教学方式。

每个不同年龄层的学生们，性格和学习热忱都截然不同，这对刚涉足教学领域的吴晓燕老师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面对12岁以下不谙世事的小学生，她采用近乎哄骗方式，进行充满趣味性的教学；面对在叛逆期游走的初中生，她循循善诱，晓之以理；面对思想比较成熟的高中生，她就会根据学生写的书法提出她的看法，和学生一起讨论。

对于吴晓燕老师来说，给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上课，是最大的挑战。

南中学生聚精会神地学习书法

主要的原因是，书法许多重要的专用词汇，如侧锋、中锋等，太抽象了，小学生还不具备理解和领悟的能力，要向他们解释清楚，难度极大。然而，这并没有难倒吴晓燕老师。记得上课第一天，吴晓燕老师就颇为幽默地作了自我介绍。她故意地将“教你们书法”说成“教你们梳头发”，并配合肢体动作，假装梳头，逗乐了小朋友，课堂上充满了欢笑；课室一有了笑声，学习便是顺水推舟的事了。

吴晓燕老师曾经看过有些书法老师的授课，那些一板一眼的教学方式，虽然很严谨、很科学化，但却少了一些活力，难以为小学生所接受。为此，吴晓燕老师只能另辟蹊径。在上第一堂课时，她先与学生们聊天，刻意把书法撇在一边。通过谈话去了解他们对书法的理解力和掌握能力，再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比如说，“十”这个字，在书写时，竖笔要比横笔粗，吴晓燕老师便用肢体语言进行了示范，她将双臂向左右两边开展，说道：“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比双臂粗的。”从此以后，学生们一看到“十”这个字，就会想起老师的“肢体语言“，终生牢记竖笔较粗、横笔较细。

吴晓燕老师作品《雅拙》

吴晓燕老师作品《胸怀》

吴晓燕老师的这种教学方式，使课堂充满了活泼的气氛，学生们学得既轻松又愉快，小学生尤其容易接受。吴晓燕老师表示：处于年幼阶段的孩子，正是打地基的时候，老师有着极为重要的启蒙作用。正确的教学法、积极的学习态度，会给学生带来终身难忘的影响，因此，身为传承书法的老师，她慎重地看待每一堂课。

少年记者与吴老师的合影 左起：张玮真、张韵琦、吴晓燕老师、章姿文

修身养性　恬静平和

吴晓燕老师认为勤练书法，是能够修身养性的。所谓修身养性，便是能够通过长期练习书法，改变自己，提高自身的修养，使身心臻于恬静平和。她以自身为例：过去，她是个急性子，然而，学习书法后，她却学会了静下心来，把所有精力投注到笔砚中，脾气好转了许多。书法就像是她的终身伴侣，陪伴着她，让她学会了沉着冷静地应付一切，以微笑面对生活。

新加坡每年都会举办书法比赛，吸引书法高手一比高下。吴晓燕老师表示：她一直都不太赞成学生参加比赛。很多学生都会只是为了独占鳌头而拼命努力，失去了练习书法的意义。学书法应该是一个快乐的过程。

她六月份去马来西亚参加一项写生活动，活动过后，每一幅写生作品，不管水平高低，都拿出来展览。大家在观摩中，也提高了自身的水平，每一个参与者都很尽兴。她因此建议以没有竞争性的书法展览会来取代比赛。

吴晓燕老师认为学习书法的不二法门是勤奋。学海无涯，唯勤是岸；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投入和专心，是两大要诀，若“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将一无所成。

在访问结束前，吴晓燕老师微笑地作了一个有趣的总结：“书法不像文学，有很大的延伸空间。在这个天地里，不是黑就是白。书法世界里的黑，指的就是墨；书法世界里的白，指的就是纸；但是，蕴藏在黑白世界中的书法，有着无比活泼的生命力，而我们也可以从这个黑白世界中繁衍出无穷的变化。”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为了了解莘莘学子学习书法的状况，我们也访问了吴晓燕老师书法班上的两位学生崔钰和宣颖。

书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年就读南洋女子中学的中四班学生宣颖，学颜真卿的楷书就学了整整十年。而她的同学崔钰，也学了六年欧阳询的楷书。她们常年练习楷书，旨在把楷书的基础打好，才进而学习其它的字体。

崔钰与宣颖由于功课繁重，无法每天抽出固定的时间来练习，但是，在假期里或比赛前，她们就会拨出更多的时间来练字。她俩从来都不把书法视为一种负担，反之，她们认为书法是一种艺术，能让人静心，也能够纾缓压力。

说来有趣，崔钰起初学书法并不是自愿的。她父母认为能够写一手工整的字是很重要的，就要她学习书法。崔钰不感兴趣，勉强学习，渐渐的，她发现书法成为了自己的强项，就滋生了兴趣。宣颖呢，在小一的时候，由于学校要求学生学习书法，她初步接触书法之后，便爱上了。当书法被列为课外活动时，她便主动报名参加。

宣颖觉得学习书法能帮助她培养专注的能力，因为汉字这种源远流长的古老艺术，讲究结构和神韵，若想把字写好，就必须在练书法时，心无旁骛，摒除一切杂念。崔钰呢，则觉得书法能为她培养起敏锐的观察力。她说，书法不是光练就能写得好的。书写者需要仔细地揣摩书法家的一笔一画，之后，才能更好地运用到自己的书法上。书法也有利于培养耐心和毅力，一开始练习书法的时候，得一笔一划练起，横竖撇捺，单单一个笔画需要练习百遍才能练精。更令人惊讶的是，书法也能教学生如何做人。宣颖举了颜真卿的楷书为例，因为它的笔画工整端正，吴晓燕老师在教导学生的时候，也会教他们坐得端正，笔拿稳，才能把字写好。她从中得到了启示：要把事情做成功，每一个细节都不可放过。

崔钰与宣颖，是书法比赛的“沙场老将”。去年，她们还参加了一个国际性的比赛——“韩国书法巡回大赛”，分别赢得了大奖与金奖。崔钰认为比赛能提高自我的水准，通过互相切磋，了解自身的不足、汲取他人的长处。有得奖固然好，如果没有得奖，就化为动力，更加勤奋地练习。

小结

在新加坡，有许多书法老师就和吴晓燕一样，孜孜不倦地在校园内开设书法班，耐心地把书法这门的深邃美丽的艺术通过年轻的一代传承下去。尽管有人悲观地认为，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里，书法这门需要耐心来锤炼的艺术可能会渐趋没落。可是，有了热心传扬薪火的老师们、有了热心学习的莘莘学子，中国文化宝库里的书法艺术，是永远也不会被湮没的。

崔钰与陈宣颖

刺客之歌《广陵散》

文图 · 庄永康

刺客聂政一路走来的心理历程，都出自冷冷七弦。原作者把琴的二弦调低，与一弦同音，两相配合，构成说书当中的隆隆鼓点，一绝。

管平湖1954年定稿《广陵散》于北京
(《管平湖古琴曲集》插图)

且让我先说一段个人的小经历。

算来大概是十年前吧，听户不断流失的本地商业电台“丽的呼声”，突获政府赦令，允许它的中文台一半时间播出华人方言节目。当时，本人受节目制作人邀约做个广东话讲古单元。

做粤语节目，酬劳不计，反而自掏腰包买了大字本的两套武侠小说——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以作准备。考虑到版权问题，我打算不用唱片，而本身以古琴弹录节目的sig tune(开场乐)和音效。

《广陵散》，是选用的乐曲。

然而不知何故，计划没有下文，到了2012年，享寿63岁的“丽的呼声”也结束了营业。尽管后来听说复播，但已无接触。眼下提起这段往事，乃是想告诉大家，有心栽花的讲古节目虽然胎死腹中，但无心插柳的音效实践，却让我辗转搞通了全长近7分钟的节本《广陵散》。

乐曲歌颂孝义英雄

《广陵散》说的是一个战国刺客的故事，慷慨激昂、气势浑厚，自古以来便被认为不同凡响。更由于魏晋才子嵇康(223-262)行刑前弹奏此曲，叹为绝响，让乐曲增添不少悲壮色彩。

据明朝《神奇秘谱》所载，传自隋宫、已有九百多年历史的这个“正谱”，共有45段之多，是大曲中的大曲。编者朱权说他本身也没弹过，若无近代琴家管平湖(1897-1967)参明谱灌录22分22秒的足本，此曲恐怕也难以流传至今。[管平湖的《广陵散》收录于1995年龙音的专集，亦见于中国音乐大全古琴卷“老八张”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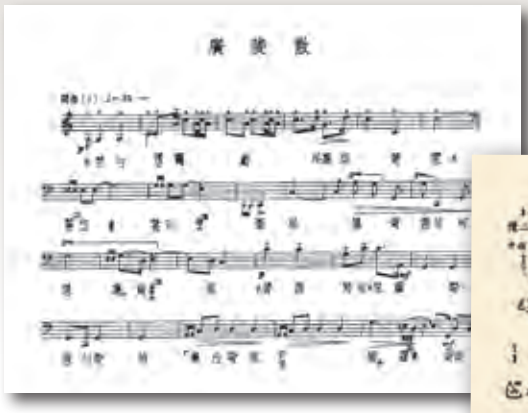
管平湖女弟子王迪(1923-2005)，曾与齐毓怡联署，在1982年第二期《音乐学丛刊》(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发表《琴曲广陵散初探》一文。其中指出，宋以前曲中并没有“开指”一段，让我们理解到，这首浩瀚大曲，是经历各朝各代，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形成的。

《广陵散》源出何处，已不可考，或有可能脱胎自东汉文学家蔡邕《琴操》中文字描述的《聂政刺韩王》一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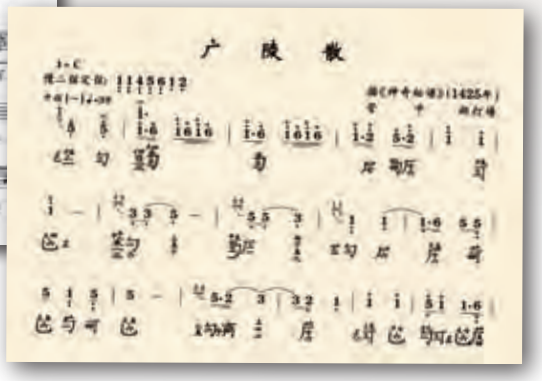
聂政名出《史记》刺客列传。战国时韩哀侯麾下有个大夫严仲子，因得罪韩相侠累，怕被诛灭，重金礼聘聂政刺杀政敌。史书上的聂政，是不折不扣的“职业杀手”。乐曲描绘聂政因报父仇而刺韩王，显然为了把主角的行为伦理化，歌颂他为孝义英雄。

曲名中的“广陵”相信是地名，一说为今天的扬州。“散”即散曲的意思，如果按照钢琴曲式，应是一首ballad(叙事曲)。

《广陵散》引人入胜，在于指法巧妙，变化多端，刺客聂政一路走来的心理历程，都出自冷冷七弦。原作者把琴的二弦调低，与一弦同音，两相配合，构成说书当中的隆隆鼓点，一绝。



五线谱与减字谱对照之《广陵散》(北京音乐出版社，1958年)



简谱与减字谱对照之《广陵散》(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

足本节本各有千秋

《神奇秘谱》中的《广陵散》共有45段，这里用阿拉伯数字标出乐段排序:

开指(1);

小序：止息(共三段，2 - 4);

大序：井里第一(5)，申诫第二(6)，顺物第三(7)，因时第四(8)，干时第五(9);

正声：取韩第一(10)，呼幽第二(11)，亡身第三(12)，作气第四(13)，含志第五(14)，沉思第六(15)，返魂第七(16)，徇物第八(17)，冲冠第九(18)，长虹第十(19)，寒风第十一(20)，发怒第十二(21)，烈妇第十三(22)，收义第十四(23)，扬名第十五(24)，含光第十六(25)，沉名第十七(26)，投剑第十八(27);

乱声：峻迹第一(28)，守质第二(29)，归政第三(30)，誓毕第四(31)，终思第五(32)，同志第六(33)，用事第七(34)，辞乡第八(35)，气冲第九(36)，微行第十(37);

后序：会止息意第一(38)，意绝第二(39)，悲志第三(40)，叹息第四(41)，长吁第五(42)，伤感第六(43)，恨愤第七(44)，计亡第八(45)。

管平湖指出，“正声”里面的“徇物”(总第17段)，一名移灯就座，是全曲的关键。这是个深沉郁结的乐段，“它刻画聂政在刺杀韩王的前夜，独自坐在灯下，眼前涌现出许多往事的情景，千头万绪，各种纷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若以“徇物”为全曲轴心，那么“徇物”之前的乐段都是主题的铺垫。开指，主人翁初现，苦练琴艺，以期吸引韩王，召他进宫，便可伺机刺韩。但，此行风险甚高，胜算难测，聂政的心态是游移不定的，甚至带些烦躁。“徇物”后，才决定行动，直到“投剑”(27)，完成使命。

“正声”之后的“乱声”(“乱”的意思是主曲的变奏)，加上“后序”，是超长的尾声，讲述后事的料理，近现代的演奏一般从略。这如琵琶曲《十面埋伏》，通常都以楚霸王乌江自刎的高潮结束，不必讲到胜利的汉军如何狂欢。

山东嘉祥汉武梁祠石室中《聂政刺韩王》石刻画像(拓本)

当然，足本的演奏还是反映了琴家的胸廓恢宏，耐力惊人。除管平湖外，美国琴家唐世璋的CD演绎，台湾琴家葛瀚聪在台北国家演奏厅的网上录像，皆为足本。

网上载有张子谦演奏录音，时长4分6秒，相信是最浓缩的节本，包括开指、止息(头段)、徇物(无重复)、冲冠、长虹、寒风、烈妇、含光、投剑(各段或抽取部分)。上文笔者研习约7分钟版本，乃根据上海琴家龚一所制五线谱与CD，并得纪志群老师忙中提点。

2010年购得人民音乐出版社“全国考试丛书”之《古琴曲集》，《广陵散》列第十级，管平湖打谱，后附“谱中与1958年出版的《广陵散》不同之处依照李祥霆演奏实况记写”字样。香港雨果唱片李凤云CD专集，其中《广陵散》是这个27段、以“投剑”为收结的版本。

另雨果1996年戴晓莲专集，《广陵散》长8分半，体裁适中，细节、层次也丰富。

(作者为本地自由撰稿人)

追逐风景的人

文图 · 邹璐

和何家良博士预约见面访谈的时间是在他刚从马来西亚写生回来不久，这位已经古稀之年的画坛前辈，从事艺术创作长达60年，至今坚持户外写生，并且任何时候看到他，都是精神饱满、笑容可掬、态度从容、气定神闲。

《闲居》1999

何家良博士在本地文化、艺术、教育、社区等众多领域享有崇高威望和持久的知名度，自1966年踏足政坛，获选为裕廊区国会议员，他的连任记录至1996年，长达30年之久。他也曾陆续担任多个政府部门的高级政务次长，其中包括教育部、交通及新闻部、新闻及艺术部以及环境发展部等，是不可多得的“政坛艺术家”。对此，本地知名先驱画家刘抗先生在文章中写道：“这令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联军的两位重要人物：一是坐镇英伦的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爵士，另一是受命统率联军进攻纳粹劲旅的美国埃森霍(也译作艾森豪威尔)将军。”他们两位在军政繁忙之余，亦寄情绘画艺术，“这种实质上肩负重大使命的重员，能在事业与艺术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相辅相成，度过人生至高无上旅程，委实是难能可贵的一幕。”

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政治人物，又跨界在艺术圈，何博士因此成为最受欢迎的艺术活动开幕嘉宾。我们无法统计何博士至今主持过多少场的画展开幕或其他艺文活动，但他是公认主持最多场的，并且他的开幕词也是很贴切的。这源于他作为油画家，在绘画写生，参加展览等方面总是和艺术界朋友打成一片，亲切随和，通过与不同语文、不同种族艺术家的密切交往，他也被认为是最懂得艺术家实际景况和本地艺文生态环境的人，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推动相关活动等方面，能够从多元角度、立场、视角获取平衡，提出更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指导。

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在1997年退出政坛后，出任南洋艺术学院(简称“南艺”)院长，在6年6个月的任职期间，不仅将学校主要文凭课程与世界著名大学挂钩，使到学校的专业排名获得提升，同时也发动为南艺筹款，建起崭新校舍。今天位于明古连街的三组隔街相望建筑群在闹市之中让人感受到淳朴脱俗的艺术气息，南艺正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无论在软件和硬件方面都获得全面提升。由于他在政治与艺术方面的重要贡献和成就，2001年荣获美国威斯康辛国际大学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

说到南洋艺术学院，这是他艺术启蒙的地方，1954他曾在当时的南洋美专(今南洋艺术学院)接受正规艺术教育，后来因为家境贫困无法完成美专三年的课程，但这位在校时间仅一年半的杰出校友，在跨越半个多世纪后，却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完成回馈母校的壮举。

何家良博士1937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广东顺德。5岁时经历日军南侵，新加坡沦陷，日治时期因日军移殖垦荒计划被迫举家迁往柔佛兴楼开芭，直到战后(1945年)才有机会重回新加坡。

家境贫寒耽搁了他的求学生涯，却并没有终止他的求学梦想。他在1949年就读新生学校，1955年进入中正中学，1960年获政府助学金进入南洋大学(物理系)，在南大读书期间又和一些爱好艺术的同学组织“南大美术协会”，并多次在新加坡博物馆画廊举办“南大校友画展”。60多年来，他的艺术创作之路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是在1963年毕业于南洋大学物理系获理学士学位后投身教育界，再进入政坛，出任政府高级领导职务，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写生和创作。我们不禁好奇：在艺术与物理，艺术与教育，艺术与社区，艺术与政治等诸多不同领域，您是怎么求取平衡，齐头并进的？何博士笑言，这没有什么难，艺术与这些领域并不是对

何博士坚持户外写生

立关系，相反它们之间很可能是相辅相成的，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你喜欢的，爱好会产生最大动力。

自1990年首次在中华总商会举办题为“怀旧景色”个人画展至今，何博士已经成功举办个展达12场之多，由此可见他是一位有坚守、有耐力、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人。期间共出版画册四本，分别是1995年与李炯才合作的《群情激昂画中留》；1996年何家良写生油画集《狮城揽胜》；2000年的《南洋乡土情》和2003年的《美哉大自然》。

从画展的命名，“怀旧景色”(1990年)、“绿满狮城”(1991年)、“绮丽风光”(1993年)等，到画册的书名，到观赏其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几乎是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风景画家。在他的笔下有新加坡早期甘榜渔村，马来半岛的蕉风椰雨，虽然也有其他地方的城市风景、古代遗迹，但出现最多的还是典型南洋风情。如此专注、统一、长情的创作路径在一般艺术家中是非常罕见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与何博士的性格，童年成长有着密切关系。依据佛洛依德理论，以潜意识为基础的人格结构学说主张人的心理乃是由潜意识、前意识以及意识所构成的。佛洛依德强调童年对于人格成长的深刻影响，认为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将深刻影响到他后来的人生。

何博士的童年是在马来半岛以及新加坡的甘榜峇达(Kampung Batak)长大，虽然家境贫寒，大自然的蓝天白云、雨林芳草、溪流礁石、阳光雨露，从来不会有任何歧视和偏见，给予世人平等的爱。于是，这个甘榜乡间长大的画家笔下有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风景素材，南洋风情是他创作的源头活水。又或者由于家境贫寒的缘故，让他过早失去天真烂漫的童年，过早担当起家庭的重任，因此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一直不断描绘乡村田园、甘榜渔村、山溪椰林，以此追忆和弥补一个永远缺席的童年。

何博士创作的另一大特点是坚持户外写生，他像早期的印象派画家们一样，坚持在自然光线下作画，只要一有空，他就会跟随一些画家朋友，带上画具走到户外，追逐风景，写生作画去了。每次出门他的装备是最全的，画布、画架、画笔、颜料等，所有作画工具和材料都随身携带，如果没有很好体力是很难做到的。

最初他采用油彩，但油料调色费时，也不容易干，所以后来他改用胶彩，但胶彩的干涸速度快，因此要求画家反应敏捷、笔触迅速、用色准确，是一种考验。胶彩和油彩是两种不同材质的媒介，在画布上的运用效果往往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多年来，何博士已经养成习惯，外出写生，现场作画用胶彩，回去后再考虑以油料做适当的补笔，加之两种媒介有不同色彩，可以互补运用，使到画面更富有色彩变化。

创作油画之外，何博士长期以来还坚持写书法。他通常会在晚餐之后，在书桌前摊开笔墨纸砚，练上一段时间才去就寝。就像他的油画创作一样，写书法开始得更早也没有停止过。在书法方面他比较偏好于右任的草书——自由、奔放、老辣、洒脱。书法的遒劲笔力应用到油画创作中是另一种得心应手。何博士说，他正是通过书法的训练以及多接触名家书画，通过观赏学习，从中获得启迪。

在其中一本画册《狮城揽胜》中共收录画家从1981年至1996年超过15年时间所创作的油画作品共51幅，其中描绘甘榜海岛渔村的作品多达30幅，形成“甘榜“系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由此可见画家对于此类题材创作的热衷和坚持，并且因为对这类题材驾轻就熟，更能贴切表达心声，体现他的创作风格和水准，因此获得遴选收录在画册中。

新加坡原本除了新加坡河两岸地区之外，有很多的甘榜、田园、渔村、丛林。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岛国的甘榜田园风光渐渐让位于城市化进程，因此看到画家笔下岛国曾经的田园风光，更增添人们的怀旧情绪，乡土情怀，让人感觉十分亲切，感慨良多。他也是在为城市变

《出海》(1998)

《靠山居》(1999)

迁留下艺术的记录。在他笔下有最后海人居住的甘榜法蒂玛(Kampung Fatimah)，有沿着铁路线的甘榜石叻(Kampung Wak Selat)，有华人和马来人和睦相处的渔村甘榜实乞纳(Kampung Siglap)以及甘榜依劳(Kampung Irau)、榜鹅渔村(Pung-gol Fishing Village)、甘榜小万里(Kampung Mandai Kechil)等。那里有风景，更有故事和浓浓的乡土气息人情味。

在描绘这些风景时，他表现出异常轻盈、活泼、明快、舒朗的笔触性格——画面简洁明丽，线条凝练概括，色彩以平涂的方式，构图所撷取的重点通常是当时寻常可见的典型浮脚屋。会有一整面墙壁或者屋顶沐浴在明媚的阳光底下，门口悠闲觅食的鸡群，挺拔的椰子树，窗台下繁茂的花树，屋顶的错落交织被处理得井然有序，有的还会用灵动潇洒的笔触勾勒出几个忙碌的身影，使得整个画面带给人质朴、宁静、悠闲、祥和的美感。

制作精美的《南洋乡土情》是画家于2000年出品的另一本画册，收录画家1997-2000年间的62幅风景作品，从中我们看到，画家的足迹不仅遍布岛国，更自由穿行在邻国马来半岛的乡间海边。与前述画册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作品，画面上洋溢着一股强烈的自由奔放气息，大概是由于当时何博士已经卸下政坛重任而感到身心放松，一股欢愉明媚的情绪在笔触和色彩间流动。

同样描绘风景，这一时期作品画面色彩鲜明亮丽、饱满丰厚、狂野奔放，笔触有一种动感和力量而显得粗犷豪放，据说这时候他正在“尝试用宣纸代替画笔来作画，觉得用纸头来作画更加潇洒自如，有许多效果是画笔或油刀表现不出来的，油画的厚重感，强劲苍遒的笔触(这里应该是纸触)，一气呵成的气魄，用纸头作画都能一一达致。”(画家语)

风景画一直是油画中的重要主题。在西方，15世纪后风景画成为独立题材，出现地方性风景画。风景画的成熟是在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后期，印象主义画家以光影的明暗和色彩的微妙变化使风景画成为绘画中的重要门类。但是，我们还是会忍不住好奇追问，“什么是风景？”“风景是什么？”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在《风景与记忆》一书中写到，风景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它是投身在木、水、石上的想象建构。这种建构与知识结构有关，更与个人和集体记忆密不可分。这种“想象的构建”包含的哲学道理使到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

通往“风景”的途径是“记忆”。很显然何博士笔下的风景画不仅是“师法自然”，更是他独特生命记忆、秉性情怀的具体诠释和再现。笔触最能呈现一个人深藏心底的情绪状态和人生渴望，也揭示潜意识中的内在需求和内在本能。自然意味着广袤浩瀚、和谐共存、乡土乡情、生机盎然。在大自然中观察、聆听、思考、感知，转换成构图、色彩、形象、用笔，成为笔下贯穿始终的风景画。而风景或许会变，不变的是情怀，是何博士的精神世界，心灵空间。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南洋大学行政楼(现为华裔馆)气势不凡

南洋大学行政楼

文图 · 虎威

不曾在南洋大学求学，然而，它那座巍巍而立的行政楼(初时为图书馆，今华裔馆)，却与我有过一段特殊的缘分，长记心头。

父亲寄望我读南大

与其说记着建筑物，倒不如说是记着这座建筑物所令我想起的一些人。第一个是我的父亲。那是在上世纪60年代，我念小学时的一次郊游。一家人乘车来到当时极偏远的裕廊，经过写着“南洋大学 1955”的牌坊，沿着一条葱茏车道前行，豁然开朗处，便见到这座红墙绿瓦的大楼，禁不住“哇！”的一声赞叹。父亲说：“南大是一所优秀的学府，你们努力读书，将来可到这里念书。”因为家境与机遇无机会上大学的先父，把未完成的梦想交给两个孩子。

到了我念初中时，遇到一位非常出色的美术老师。白老师自动自发，利用课余时间特别栽培一些他认为有美术天分的学生。很幸运地，我是其中的一名。一次的写生活动将我们带到南大秀丽的云南园，大家自行取景作画。我选择的是行政楼，因为觉得它很特别。当时从未画过那么壮美的建筑物，不知如何下手。白老师说：“画建筑物要显得立体，须从侧面角度，千万别正对着它画。”在他的指导下，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在当天完成了。白老师不久离校，他说的这句话却一直留在我心中。

老师建议到南大找参考资料

念中四时再次来到南大，见到巍巍而立的行政楼。那是为参加一项全国性的化学演讲比赛做准备工作。是教化学的级任罗老师鼓励我和另外两个在校成绩优异的同学以三人一组形式参赛。当时，大多数华校无论上什么课都用华文(当然英文一科例外)，但我就读的公教中学推行双语政策，理科科目自中三开始都改成用英语授课，课本、练习、测验、考试一律用英文。初时很不习惯，渐渐适应。然而这项比赛用的是华语，所以又要“适应”用华语讲化学。罗老师建议我们到南大图书馆找参考资料；我组成功打入决赛圈。

此后与南大行政楼的情缘忽然断绝。40多年来，我一直没再亲近它，直至为写这篇文章，才踏入南洋理工大学校园细看它。

40多年发生了很多事。首先讲哥哥与我，当年父亲希望能帮他完成戴

方帽子梦的两个孩子。哥哥1971年公教高中毕业，可选择到南洋大学或新加坡大学攻读他喜爱的化学。和父亲讨论后他选择了新大，上面提到公教自中三起理科科目转英文的做法，使他较容易在纯英语学习环境生存。我念高二时，受老师鼓励申请奖学金到外国留学，很幸运地被英国剑桥大学录取，并获得海外优异奖学金。但即将要签约时，难题来了。根据公共服务委员会规定，学生需要两个担保人，而我只找到一位合适者。硬着头皮问罗老师，想不到他爽快答应。乍看担保不过在文件上签个字，乃“举手之劳”，其实责任重大。假如我毁约，罗老师便须赔偿巨款。这样热心帮助学生的老师确实难得!

南大骤然“消失”

签约后往英国修读建筑学。第一学期学画建筑透视图，用侧面的角度绘制大师赖特的罗比屋。自然让我想起白老师当年的教导，以及与罗比屋一样以砖块作为主要建材的南大行政楼。

做梦也想不到，令我自小仰慕的南洋大学，有一天会骤然“消失”。那是1980年，我还在当实习生，忽然传来它被并入新大，而新大易名新加坡国立大学。之后南大校园空置着，园内的建筑物 —— 包括美轮美奂的行政楼 —— 前程未卜。1981年南洋理工学院成立，学生开始在那儿上课；学院10年后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这些年来整个校园改变巨大，可幸行政楼连同牌坊、建校纪念碑后来成为国家古迹被保留。行政楼摇身一变成为华裔馆。

为写本文到南洋理工大学走访南大行政楼，已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先经过牌坊，再驶一段长路通往。牌坊已被PIE(高速公路)“隔绝”在校园之外的组屋区内，它底下的路也已成为草坪。我是通过校园近高速公路的一个入口进入，很“平铺直叙”地便来到它面前。

由新加坡留英先驱建筑师黄庆祥设计的南大行政楼，依然巍巍而立，气势磅礴。我想，这种感受应该是来自它特长的立面、对称的布局，以及建筑师所给予它的，呈现在屋顶、梁柱、栏杆等各处的中国风。

由新加坡留英先驱建筑师黄庆祥设计的南大行政楼，依然巍巍而立，气势磅礴。我想，这种感受应该是来自它特长的立面、对称的布局，以及建筑师所给予它的，呈现在屋顶、梁柱、栏杆等各处的中国风。行政楼不但外表出众，内里也气派非凡：但见一自然采光八角形中庭直通顶部天花板，边上有楼梯连接各楼层。

我不是南大人，这次重访行政楼，不知怎地却有一丝伤感。或许是因为少年时代特别喜欢的一首后主词，蓦地浮现心头：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作者为本地建筑师兼作家)

八角形的中庭自然采光

读懂媒体上的中国

文 · 汪惠迪

域外人士若想读懂媒体上的中国，了解并研究中国国情，途径之一是关注、跟踪中国流行语的发展变化；流行语的发展变化是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发展的轨迹。

2015年7月15日，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发布了“2015年春夏季中国主流报纸十大流行语”。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设在北京语言大学，“十大流行语”是基于该校的动态流通语料库(Dynamic Circulation Corpus，DCC)，通过电脑提取获得的。从2003年起，该中心每年发布两次，一次是“中国报纸春夏季流行语”，另一次是“中国媒体年度流行语”，至今已经12年了。

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所监测的18家平面媒体依汉语拼音序排列是：《北京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法制日报》《光明日报》《广州日报》《华西都市报》《今晚报》《南方周末》《钱江晚报》《齐鲁晚报》《人民日报》《深圳特区报》《新京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扬子晚报》《中国青年报》。这18家报纸从中央到地方，覆盖了机关报、都市报和晚报，代表了主流媒体的语言特点和变化指征（indication）。

本次发布的流行语共有7个类目：综合类、国内时政类、国际时政类、经济类、社会生活类、体育娱乐类和文教科技类。分类是为了便于人们对流行语的认知与分析，也能更好地发挥流行语对某个领域的生活进行素描的作用。7类流行语的榜单如下：

综合类：创客、三严三实、四个全面、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宪法宣誓、国际足联、控烟、股市、MERS、希腊债务。

国内时政类：简政放权、十三五规划、司法改革、复兴航空、京津冀协同发展、红色通缉令、天网行动、也门撤侨、新国家安全法、双引擎。

国际时政类：尼泊尔地震、也门危机、李光耀、缅甸事件、万隆会议召开六十周年、德国之翼、红场阅兵、美国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中拉论坛、查理周刊。

经济类：自贸区、O2O、大众创业、纳什、G7、中国制造2025、救市、高通公司、互联网+、普惠金融。

社会生活类：专车、东方之星、留守儿童、上海外滩踩踏事故、抢红包、姚贝娜、柴静、粉尘爆炸、僵尸肉、闰秒。

体育娱乐类：苏炳添、真人秀、女足世界杯、颜值、大白、孙楠退赛、Duang、撕名牌、足球改革、聂隐娘。

文教科技类：校园足球、汪国真、平凡的世界、物联网、校园暴力、苹果手表、人工智能、文化惠民、生源大战、5G。

所谓流行语是指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域或某一人群中迅速传播、风行的词语。流行语比一般词语更直接、更敏锐地反映社会生活，忠实地记录了民众在物质生活、意识形态、道德情操、文化时尚方面的发展与变迁，为他们留下了真实的、具象的集体记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流行语是一种集社会面貌、大众心理、观念形态为一体的语言现象。流行语榜单已成为广大民众了解世间万象、大情小事，把握时代脉搏的重要依据。域外人士若想读懂媒体上的中国，了解并研究中国国情，途径之一是关注、跟踪中国流行语的发展变化；流行语的发展变化是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发展的轨迹。

如果单纯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观察，那么，用一个字(character)或一个词(word)或一个短语(phrase)来描述当代社会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正是汉语魅力的彰显。

上述7类流行语，每类10个，共计70个，绝大部分不是新造的词语，而是固有的普通词语或用这类词语组合而成的短语，例如：股市、自贸区、希腊债务、红色通缉令、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美国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有些则是人名，例如：李光耀、柴静、姚贝娜、苏炳添、汪国真，多半是因这个人逝世或突发事件而忽然盛行，成为流行语的。

可是，也有些流行语是新造的词语，即新词语，例如：创客、控烟、颜值、僵尸肉、互联网+、Duang。这类流行语深受语言用户青睐，假以时日，很可能成为词典中的新血。限于篇幅，试解读一二。

【创客】2015年3月5日，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总理李克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回顾2014年工作时说，过去一年，我们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着力培育新的增长点，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支持发展移动互联网、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电子商务、物流快递等新业态快速成长，众多“创客”脱颖而出，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

李克强第一个提出“创客”，接着这个新词就在媒体上和民间广泛流行。在李克强报告的英译文本中，“创客”译作creators。因此，有人认为应将“创客”解读为“利用互联网、电脑等‘高、精、尖’技术，使创意变成现实的创意领导者或技术领衔者”，“创客”不是Maker或Maker和Hacker二者的综合义。在应用“创客”时须特别注意的是，“创客”不是一般的创业者。例如有一则新闻说，“去年，她辞职当起了‘创客’，在老家搞起了舍饲养羊”，这个“‘创客’恐非真正意义上的‘创客’，意思更多指向的是‘创业者’”。(详参李世江《创客：“X客”族新贵》，《语文建设》2015年第4期，第71-72页)笔者赞同李先生的解读。

【颜值】颜：容貌；值：数值。颜值指人物的颜容英俊或靓丽的程度，用于评价人物的容貌，男女都适用。“颜值”产生后广受语言用户青睐，结果是使用的领域大大拓宽，它所形容的主体从人物延伸到事物，如相机、汽车、楼盘、城市等，甚至一道甜品做得靓，也用“颜值高”来形容。社会大众能否普遍接受，尚须观察。

【僵尸肉】听着就让人毛骨悚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肉呢？2015年6月23日，新华社记者发表了一篇题为《走私“僵尸肉”窜上餐桌，谁之过？》的新闻报道，首次使用“僵尸肉”一词。僵尸肉指冷冻年限长达数十年的陈年走私冻肉；别称“70后”冻肉。泛指超过保质期的走私冻肉；别称“超高龄冻肉”。

【duang】出自香港影视明星成龙代言的一个过气的洗发液广告词。在华语语音系统中没有duang这个音节，因此也就没有相应的华文字。没有音、形，总该有个意思吧？可是duang表示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是“加特技”、“加特效”，问成龙，他也“说不清道不明”。也就是说，duang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解释。金波生先生说：“没有公认的准确释义，就不可能在交际中正确地表情达意，即不能用来‘造句’，这是duang的致命伤。”(《说不清道不明的“duang”》，《咬文嚼字》2015年第5期，第9-11页）duang仅是一个没有标准的形、音、义的标音符号，是个无厘头流行语。笔者预测，它的“词命”长不了，要不了多久，就会淡出人们的语文生活。

流行语测量着时代的体温，勾勒了时代的画卷，帮助我们读懂媒体上的中国。

(作者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语文顾问)

五十肩的中医治疗

文图 · 李曰琳

五十肩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就算自己从没得过这个毛病，也听说过周围的人曾经或已经有这个症状。在日常生活中，患上五十肩的患者越来越多，并且患者的年龄有年轻化的倾向。

五十肩(froze shoulder)是患者肩关节感到疼痛，或感到僵硬，以至肩关节活动受限而不能转动。有些是没有原因的发作；有些是在发生问题以前，肩部曾经有受伤的历史，如外伤、骨折、劳损或退化，而导致肩关节活动受限，不能灵活地伸展或旋转活动。这些症状一般上统称五十肩。

许多人肩膀一疼痛，就以为自己患了五十肩，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肩部疼痛都是五十肩。

肩关节是全身活动性最大的关节，可以作屈曲、伸直、内收、内旋、外展、外旋、回旋等运动。正常肩关节活动度前屈0-180度，后伸0-60度，内收0-50度，外收0-180度，内转0-90度，外转0-90度为正常活动范围。如肩关节无法达到此活动标准，而且肩关节粘连，才可以判断为五十肩。

其实五十肩并非医学名词，而是许多肩部病变的总称，包括退化性肌腱炎、肩峰下滑膜炎、粘连性关节炎等。尽管造成这些病变的原因不同，但他们的临床症状都相似，治疗的原则亦相同，所以，统称五十肩。

五十肩的病因

简单地可以概括为内因性与外因性。

1. 内因性因素包括：肩部慢性劳损是最常见的病因。肩关节退化或劳累过度，导致肝肾不足，气血亏虚，筋失濡养；再加上局部感受风寒湿邪，导致气血凝滞，经络不通，随之引起肩部疼痛或活动受限。

2. 外因性因素以急性损伤为主要病因。当肩部周围肌肉拉伤或肩周炎等因素引起肩部四周组织受到损害，未能及时治疗，患者为了减少疼痛，以至肩关节活动减少，造成肩关节粘连。

五十肩的分期

1. 急性期：病程约1个月，症状以疼痛为主，关节活动范围受限。急性期的活动受限主要由于疼痛引起肌肉痉挛，关节韧带挛缩造成。若积极治疗，可直接进入缓解期。

2. 粘连期：病程约2-3月，症状主要是关节活动受限，疼痛有所减轻。由于肩关节的广泛性粘连加重，关节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

3. 缓解期：病程约2-3月，疼痛消失，组织之间的粘连逐渐消除，肩关节的功能逐渐恢复正常。

如果早发现早治疗，急性期可以直接进入缓解期，不必遭受因粘连期引起的生活不便。

五十肩的临床症状

五十肩的患者主要症状以肩部疼痛为主诉，并伴随以下一些症状：

1. 肩关节周围有广泛的压痛点，疼痛为钝痛或刀割样痛，并逐渐向上臂加重。

2. 肩关节各个方向的活动受限，特别是外展、旋外、后伸及背手动作困难。

3. 患者肩部疼痛以至无法梳头，穿衣脱衣等，影响正常的生活起居。

4. 早上起床时疼痛较重，但轻微活动后疼痛稍微缓解。

方法 1

方法 2

方法 3

方法 4

5. 病程较长者，肩部肌肉出现萎缩，以三角肌最为明显。

6. X-ray检查一般无异常。

五十肩的治疗方法

主要原则控制炎症及疼痛，并改善肩关节的活动度。

1. 急性期：使用一些中药舒筋活血，通络止痛，消肿消炎，放松肌肉。同时可以结合针灸，或推拿，或外敷药布。推拿时手法要轻柔，避免损伤导致粘连加重。急性期可以使用热疗方式来促进肌肉松弛，减轻疼痛，以辅助肩关节活动。

2. 粘连期：患者疼痛已减轻，应着重治疗改善肩关节的活动度。除了急性期的各种疗法，还需要同时开展自我复健，以促进缓解症状。

3. 缓解期：服用一些舒筋活络的药物，配合针灸和自我复健以舒缓关节，帮助患者重新恢复日常生活的能力。

五十肩的注意事项

1.五十肩病程缓慢，有的几个月，也有拖上几年的。如果拖延时间太久，会造成肩部肌肉萎缩，治疗时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所以要尽早就医。

2.肩部的保暖很重要，在冷气房里最好在肩部披上衣服；睡觉时，也要毛巾被盖住肩部，以免寒气湿气再次诱发五十肩。

3.治疗期间避免提拉重物等，让肩部适当的休息，以免肌肉紧张。

4.积极的自我复健能够协助五十肩患者尽快康复。

自我复健常用方法：

1.手指爬墙：面对墙壁站立，举起患肢，手指触墙并沿墙向上缓慢爬行至最大限度，停10秒左右，然后向下回到原位。可在墙上标明每日到达的高度，观察进展情况，每天1-2次，每次10-20次。

2.后伸摸背：患侧手置于背后，手背贴背，尽量向上到最大限度。每日1-2次，每次10-20次。

3.背后抬手：双手置于背后，健侧手握患侧手腕部，健侧手拉患侧向上到最大限度，每天1-2次，每次10-20次。

4.摸耳朵运动：站立或坐姿，患肢高举过头顶，尽力触到对侧耳朵，同时头部保持正中位置，每日1-2次，每次10分钟。

5.钟摆运动：上半身前弯约90度，健侧靠在椅子等支持物，让患侧肩膀和手臂自由下垂如钟摆状，然后利用身体的前后摆动，自然带动患侧肩膀和手臂运动，可逐渐改善关节活动受限的情况。

(作者为中医学博士)

方法 5

野生果树也移居

文图·李喜梅

拥有晴空、绿地，以及空气清新的环境是我们这热带岛国的福分。美好的居住环境得之不易，并非理所当然。

放眼岛国四周，几乎处处都铺着整齐美观的绿草坪，荒野地不多了。偶尔在低洼处、小溪边、废弃的铁道沿，能够看到一丛丛西印度樱桃，悄悄地窝在那僻静的天地里，不修边幅，粗壮而洒脱，透发着强劲的生命力；随意伸展而又乱中有序，充满野趣。

它不用刻意栽培播种，种子落在野外偏僻的野地里，只要天时地利条件适合，即可脱颖而冒出苗头来 。

一段时日后叶子稠密了， 风起时， 相挽畅舞；风止时，枝叶垂伏歇息。炎阳下，树冠开展呈弧形，像一顶顶华盖、一个个拱形帐棚、一支支撑开的大伞，更像是一架架的天然冷气机，为周边环境降温!

土名“峇遮厘”

在马来世界里，人们管它叫做“峇遮厘” (Buah Cherry音译，意为野樱桃)。凡甘榜出身的，见面必然能唤出名字。青色小圆果熟时转红，味甜如蜜。内含无数细籽，鸟儿吞噬后，常随鸟粪排出，四处播种。

在物资贫乏的时代，乡间孩子们都很清楚村里那几棵美树的位置！常与鸟儿竞赛，看谁起得早，先到访者自当有甜美鲜果奖励!

如今在这小红点上，种植了诸多新品种树木，“峇遮厘”或许已退居“过气”树种，乏人理会；于中老年人而言，却是一段永不褪色的璀璨记忆，也不时牵动着文人雅士的心弦。

一次在游园途中，看见数株“峇遮厘”茂盛长在小径旁；几位资深导览员为之哗然！暌违多年，如失联已久的老友，争先恐后上前“问候”，采集树上熟悉的甜美味道。即使红彤彤熟果已被早起的鸟儿清光，大家也乐于退求其次；微黄带软的果子，也一样多汁甜美!

噪鹃被吸引来了

旧日甘榜的朴素生活，并未因告别乡土而失忆，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的沉淀而升华，益发浓缩、醇厚。

原为西洋热带客　扎根东方

“峇遮厘”原属番客，学名Muntingia calabura。Muntingia出自荷兰医师暨生物学家Abraham Munting (1626-1683)之名，先祖则来自遥远的墨西哥/热带南美，它在本区域最早登陆的国家是菲律宾。

由于气候水土条件与家乡接近，来到异乡后便充分融入，蓬勃繁衍，已达数百年之久，或可“归化”为“土生”品种了。

搜索其普通名，就出现一大串：西印度樱桃(1)、牙买加樱桃(地理位置上，牙买加属于西印度群岛之一)、巴拿马樱桃、南美假樱桃、马来亚樱桃、新加坡樱桃……单从这些名称，就可略见其传播的概况。

其实它与樱桃，区分为两种不同植物品种；为免造成混淆，台湾因此出现“南美假樱桃”的叫法。

何种因缘这棵植物会漂洋过海，直接或辗转被带到远东来呢?

过一遍欧洲殖民足迹

早在欧洲大航海时代，西方列强为了突破经济困境、提升民族尊严，陆续派航海家出海，寻找神秘的东方亚洲大陆与传说中的黄金、白银及香料。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获得西班牙女王的赞助向西航行，发现了美洲(误为印度，故称西印度群岛)；之后葡萄牙人由阿拉伯人领航，也来到印度，在果亚驻扎下来，进而占领马六甲、香料群岛；西班牙、荷兰、英国人也陆续东进，加入香料贸易，遂演变成掠夺和殖民，所到之处一度沦为血泪横流的战场。

靠风帆航海的时代，除了软件(人脑的智慧)和硬件(先进的船只和设施)，还需要勇气、运气，也需要看天气；季候风教会航海人看风使舵。船只上除了领航员、水手，很多时候，也有传教士、商人、生物学家等等。一路航行，沿途船只且行且停，在物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常执着于自己家乡的土产特产。于是，植物、用品甚至动物，总会跟随着人们到处旅行，偶尔更因各种不同缘由，沿途逗留。若是植物，遇水土条件合适，即可落地生根，争取存活的机会和空间。

跟随当年西洋人殖民及香料贸易路线，可看出数百年前“峇遮厘”移居东南亚岛屿与各地民族缔结情缘的端倪!

融入本土　遮荫也诱鸟

中等乔木(7至12公尺)，枝丫分布密致，开展。 叶长卵形，锯齿缘，叶脉清晰；表面布满细毛，触摸起来如纸质，手感舒服。事有凑巧，此来自西洋国家的植物，也犹如“红毛”人般毛腺较为发达。

花朵五瓣色白，雄蕊花粉黄色；两性花，花柄长，样子与草莓花相似。只开一日便凋谢，在花媒完成传粉后，吸蓄养分长成果实。果实小如圆珠，熟时由青转红，味甜。其内有黄色细籽无数，犹如隐花榕果般为鸟类及蝙蝠所喜爱，也逐渐受到现代人青睐。

其分布地域非常广泛，遍布亚洲热带；与昔日欧洲人大航海时代路线、殖民地分布颇为吻合。其用途也多样：树皮可制绳子，木材细致可制用具。一些地方民间，以叶子当茶；印度、斯里兰卡等则采用果实制作果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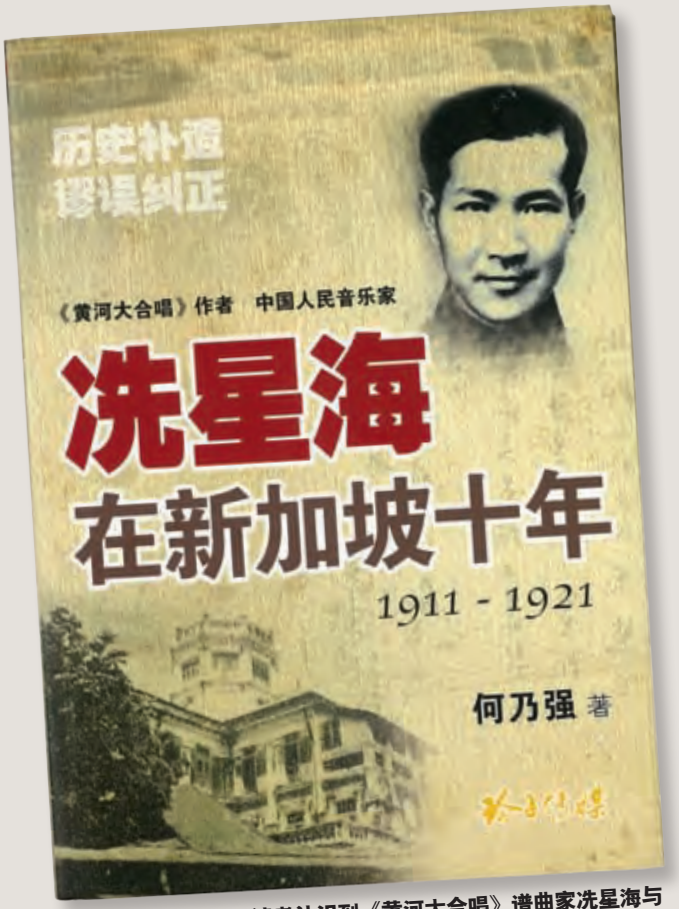
树整体外形美观，为良好的遮荫街道树，常诱鸟前来觅食，行人观花树也能观鸟。在我国女皇镇区内，文物局设立的展示板走道旁，尚保留着一排成熟的“峇遮厘”树，吸引噪鹃、粉颈绿鸠等鸟儿前来觅食，为走道增辉、生色，蔚成绿荫下鸟语花香伴游的怀旧走道，别具意义，值得推介!

白花

红果

(1) 西印度樱桃：此名乃依据新加坡公园局出版的“1001 Garden Plants in Singapore”，里边选用“西印度樱桃”为中文名，译自英文West Indian Cherry。

(作者为新加坡植物园与亚洲文明博物馆中文解说／导览员)



何乃强医生的新书让读者认识到《黄河大合唱》谱曲家冼星海与新加坡曾结下重大且深厚的缘分

为冼星海在新加坡的史迹补遗

文图 · 陈士铭

记得在初院曾首次参与《黄河大合唱》演出，对乐曲和歌声的澎湃悲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由此对《黄河大合唱》作曲家冼星海产生了崇高的敬意。在以后的岁月里，进一步知道冼星海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不久)于莫斯科因病逝世，享年仅40岁，更是感叹天妒英才。何乃强医生新书《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1911-1921》最近的面市，再度引起了笔者对这位著名音乐家的关注。

何乃强目前为中国多家儿科杂志编委、《新加坡医学杂志》编委和新加坡华文报咨询团委员。其华文著作包括《儿童病房》、《杏缘》、《父亲平藩的一生》和《医生读史笔记》等。

何乃强花了几年时间收集、阅读关于冼星海幼年的文章和资料，然后通过综合、分析、归纳和有系统整理相关资料，而编写了《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一书，以作为冼星海生平史料的补遗，并纠正了一些史料与电视剧的谬误。从更宏观角度来说，何乃强的新书旨在为冼星海幼年在新加坡的史迹填补空白，为中国的文化历史作出必要的补遗。

冼星海在1905年6月13日生于澳门一个贫苦的家庭，6岁时随母亲黄苏英来新加坡，过后到广州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学习小提琴，开始正规的音乐课程。1934年，他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作曲兼学指挥。隔年毕业回国，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由诗人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就是他于1939年谱曲并完成的代表作。

尽管冼星海在逝世后就在中国享有崇高地位，被誉称为中国人民音

令作者大惑不解的是，在中国号称国内规模最大，位于番禺的冼星海纪念馆，竟然对冼星海早期在新加坡受教育以及在养正就读等历史只字不提。更为离谱的是，1909年在澳门摄制的电影《少年星海》，竟说冼星海在新加坡牛车水小学就读，而事实上新加坡从来就没有一所名为“牛车水小学”的学校。

乐家，关于他的童年史料却出乎意料地十分欠缺。他的生平资料的确在很多地方可获得，如1989年出版的《冼星海全集》以及他的传记，但这些生平资料有关他的童年记录却非常稀少。例如在百度百科对他的生平介绍中，有关童年部分的文字仅仅百余字，提到他在新加坡的生活部分更是不到50字。

根据作者何乃强在书中的考证结果显示，冼星海初到新加坡，母亲就安排他上学，最先是在当时的私塾求学，后来到英文源流学校圣安德烈学校就读一年，过后才转到养正学校接受正规的小学教育。

在作者考证的过程中，他赫然发现，即便是在现有少许的童年资料中，竟存在很多不准确之处。就以《冼星海全集》为例，其中的一张摄于1924年的照片说明写着“冼星海在新加坡养正学校”，这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冼星海当年是身在广州岭南大学附中生活，早已离开新加坡。经作者考证的结果，冼星海是1911年到1921年期间在新加坡生活的。

令作者大惑不解的是，在中国号称国内规模最大，位于番禺的冼星海纪念馆，竟然对冼星海早期在新加坡受教育以及在养正就读等历史只字不提。更为离谱的是，1909年在澳门摄制的电影《少年星海》，竟说冼星海在新加坡牛车水小学就读，而事实上新加坡从来就没有一所名为“牛车水小学”的学校；影片又说冼星海在这所小学受中国著名音乐家萧友梅精心教导。据作者考证，萧友梅实际上从来就没来过新加坡。

这些不足之处触发了何乃强要写此书的愿望，以填补冼星海在新加坡足迹的历史空白，纠正市面上长期存在关于冼星海幼年生平的种种谬误。何乃强认为：要知道冼星海的真实历史，就必须要找最可靠的文字记录，而最可靠的莫过于与他接触过或接近过他的人士所写的文章。

这就包括了养正学校前校长林耀翔(1888—1983)的文字纪录。林耀翔曾在1956年出版的《养正学校金禧纪念刊》亲自执笔的“五十年之回顾”一文中这么形容这位中国人民音乐家：“冼既无惊人之外表，亦无特殊之天资。自入校后，见其年虽幼小，唯其刻苦耐劳之精神，勤奋向学的毅力，实有过人之处。且不以贫苦而自卑，大有舜人也我亦人也之气慨，此则非一般儿童所能及……”

这相信是确认养正学校与冼星海的关系最可靠的文字记录。作者还引用了同本纪念刊中的郭锦鸿所写的“冼星海氏的音乐摇篮”一文。此外，作者也参考了冼星海在新加坡圣安德烈学校校友所写的文章。正如作者所说，这些珍贵文字记录，都来自超过半世纪前的旧印刷刊物，如果不是为了搜寻参考文献，恐怕它们也不会有人问津了。

通过阅读何乃强的新书，就不难意识到冼星海虽然在新加坡只生活10年，但对于这位只活了40年的名音乐家而言，10年就是他生命史上四分之一的时光，而这10年的新加坡生活相信对他极为重要，因为就是养正学校的区健夫老师最先赏识冼星海的音乐秉赋，并选他进入学校军乐队，让他开始接触乐器和音乐训练。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对他起着深远影响的人生阶段，为他日后在音乐界的成就奠下了稳固基础。

正如作者所说：新加坡无疑是影响冼星海一生的地方，是他一生的转捩点。如果当年他留在澳门，没有踏出家门，远渡重洋来到南洋，他也许就此寂寂无闻，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假设他在新加坡继续留在圣安德烈学校而不是在养正学校求学，成长后也许成为一名只懂英文，只讲英语的华人，在殖民地政府部门担任一名公务员，而不是中国现代著名的音乐家。

如果从新加坡在上世纪初曾协助中国孕育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角度来看，何乃强的新书所展现的考证成果，也无疑就显得具有重大意义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狮城地标诗学：汇四方情思兮若兰之绽

文·林高　图·编辑部

陈志锐赠予新加坡金禧国庆的礼物是201首诗。书名《狮城地标诗学》，分四辑：历史地标、民生地标、文化宗教地标和旅游地标。以诗之精致，图文并茂，展示新加坡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展示的关于历史、文化、社会、旅游、民情、审美，甚至于文献上的内涵与意义。这许多诗，熔铸了理性的关爱，由个体到集体，对家国过去的怀想，现在的把握和未来的瞻望。这里引若干首，略加评述推介，读者将来展读201首或各有启发与收获。

先看《植物园》。今年植物园成功申遗，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历史位置给肯定下来了，尤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上。陈志锐的诗写于申遗之前，他从细微处看游植物园之可能。先读诗：

听说朱铭
来打了太极

一樽樽
入定的太极
反衬着植物园的
盎然生机
以及好奇的
松鼠八哥
想着有一天
要在哪一个单鞭下势里头
筑巢
——旅游地标:《植物园》

著名雕塑家朱铭的作品拙朴生动。他的代表作《太极》体现了太极的底蕴，悠悠的，彷佛天地间风和日丽花开叶茂都在太极一招一式运作之中。见《太极》如见朱铭，在植物园。起句四两拨千斤，立马发挥太极

简而带劲的威力。从听闻写起，可知《朱铭》之大名早已走街入巷。第一节为诗想之伸延作足准备。

第二节是诗之主体。朱铭之作品与植物园之花草树木相映相衬，观者感受到一种生机的勃发——是艺术赋予的，是植物赋予的。说“反衬”是要表达二者其形式上结合之必然，不在于主副的分别。朱铭之精神、之美，融注于园内绿草茵茵，春意勃发之中。“入定”模拟太极的神貌，“盎然”描述对周遭的感觉。因此，艺术与园景、园景与我之间产生完好的、审美的流动与投合。

第二节的感发力量足以一跃，作天马行空的驰骋。于是，不懂事的松鼠八哥，想着哪天在朱铭使出的招式里筑巢。这奇思妙想恰恰应合了天地万物间本来的形态——安静而和谐中随时有新意冒出，譬如此次游园，无心耕耘反倒收获了一首诗。陈志锐有三个读小学的女儿，他携妻儿到来游玩。可能是女儿的逗乐，可能是父母的妙想，诗意的萌发给游乐之事作了一个圆满的注释。

读《飞禽公园》看到一个人道主义者的胸襟。“牢笼”与“翅膀”相博弈的结果是：布置更多的“牢笼”只会产生更多的“翅膀”。所有“翅膀”向往自由翱翔的意志，它飞翔出来的天空大于宇宙的天空 。

一个最向往飞翔的
牢笼
有着最多的
翅膀
——旅游地标:《飞禽公园》

《乌敏岛》一诗或有惋叹，更多的是乐观的期许。小岛隐藏“小”之外的可能，乌敏岛就是一个可能。它仍能包容“自然/原始/纯真”。在发展上，它“慢三拍”，所以它仍能守住“那只敏感之乌鸦”。这是本岛很快就没能拥有的。乌敏岛之“小”弥补了本岛之“小”，“小”于是乎有它“不小”的包涵。第一节“乌鸦”凸显它的本质，当它起飞，大家便驻足观赏。

必须面对现实的，乌鸦。第二节之现实是本岛发展的结果，尽管不都好，却是乌鸦必须“飞过”之天空、之气团。乌鸦，它象征了人民的愿景与意志：对人性之本真以及对自然之原始生态的保护。这愿景与现实、意志与发展之间必须既相抗衡又相妥协的。什么是最好的状况，见仁见智。旧的问题去了新的来，摆在我们眼前要答案。

第三节“乌鸦”筑一个“返璞”之巢，点出其精神在“归真”。说到底，一切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先决条件是，为人民带来幸福，但不违逆天理之自然。这里头含三个要素：“以桃花之色/以南山之固或菊花之香”。“桃花之色”取《桃花源记》之意趣。“南山之固”“菊花之香”出自陶渊明饮酒诗。“南山之固”象喻复得人性本真之意志；“菊花之香”象喻重返本真之后精神上所享有的愉悦。《饮酒诗》共二十首，起首一句“栖栖失群鸟”仿若诗中的“乌鸦”，在盘旋寻觅之后“停靠小岛之花草丛间雨树枝头”。“归去来兮”，“乌鸦”回到家里。最后点出“反哺”之心：本性之自然与天地之自然之间彼此存在着相辅并行的关系 。应该指出的是，陈志锐取陶渊明诗文为喻，仅在于强调维护人性与自然之本质精神的意义与意志。《乌敏岛》一诗含岛国之潜能、民心的祈望与事理之应然三层意思。

民生地标:《乌敏岛》

小岛之岛比小更小
却比本岛更能包容
自然 原始 纯真 慢三拍的
那只敏感之乌鸦
飞过高楼广厦阻隔之天空
飞过污染指数如拥车证价格之
气团

停靠小岛之花草丛间 雨树枝头
筑一个返璞之巢 以桃花之色
以南山之固或菊花之香

再以乌鸦之本性
对母亲之自然
反哺

新加坡虽小，在亚洲其历史位置却不小。《晚晴园》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重要根据地，坐落于新加坡这个现代都市中。物换星移，对历史的回忆与反思，将给予国人什么样的警示讯号？若“显微”而观之，第一节之用词已透露些许消息。“熬煮”说明了当年革命屡败屡战之艰难以及岛国成就此一革命进程所牺牲的汗水与血泪。如果“熬煮”突出革命事业之累年耗月，“煎炒”则突出变革之急进躁动。变革是现代都市不二的选择。矛盾、对弈于焉产生。开创的同时如何保留传统？对晚辈施以教育必须立足于具体事实，发“空中语”无济于事。“晚晴园”活生生地把历史与现实、历史与血脉联系在一起。它是一方宝地。

历史地标：《晚晴园》

好块现代都市中的历史据地
这里熬煮了当年的革命
煎炒了今日的变革

在新与旧之间
在大人与小人之间
在传统与开创之间
这是一方血脉相连的
人间

《人间晚晴》一诗之起句便面对冲击与抗拒。舍身革命在晚晴园留下的事迹保留不保留下来有差别吗？有的，在个人和国家的层次上。

原都是晚来

风急的

两短句隔开分述，在时空上既有“距离的间隔”又有“迅雷灌耳”的惊栗与伤感，使人联想起李后主的《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和李清照的《声声慢》：“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陈志锐将之置于新加坡、下面一节描述的社会语境中，却产生一种尴尬：历史更替之间，枯寂与新生之间太匆匆意味着什么呢！留下什么呢！

晴天如
清甜
隶属年少

“晴天”和上面时代的“风雨”对举。少年成长于风平浪静的年代，享受风和日丽的清爽与甜蜜，对“风雨”自然感到疏远，渐疏渐远。“年少”亦象喻“新生”，新生是新时代的特质。

伟人偏爱把春晴留住

一句自成一节。它凸显“把春晴留住”这个使命的不凡意义。“伟人”指献身革命的英雄，也指将历史传承并植根于土壤，使得“春晴”满园的先贤。“晚晴”变“春晴”，一字之差实涵盖许多过程，包括对历史的认知、沉淀以后的去芜存菁。最终，历史成为个人神貌、国家形象不可取代的价值。人人有尊严与信念。

历史地标：《人间晚晴 —— 再记晚晴园》

原都是晚来

风急的

晴天如
清甜
隶属年少

伟人偏爱把春晴留住

在一园的历史
花草盆栽中
裁剪记忆

让后人修护
让时间沉淀
让我们因为愿意

保存
城市发展以外的价值
而有了
尊严和
信念

坐落于唐人街的马里安曼兴都庙标志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文化杂糅而相安的特点。整首两两对举比照以产生诗外之意。第一节带出的景象颇突兀。第二节转突兀为和谐。众神之“众”指印度同胞信仰之神，亦指华族同胞信仰之神。众神接纳众神，所以笑了。同样的，对“牛”的信仰，应视为对“神”的信仰 —— 你奉敬你的“圣”，我奉敬我的“圣”。众神之于凡人，凡人之于众神各圣所圣，各安所安。最后一节是总览：雨 —— 众神之恩泽 —— 滋润大地，不分你我；人 —— 众生 —— 平等相对，同舟共济。

宗教文化地标：唐人街里的印度庙 —— 马里安曼兴都庙

唐人街
兴都庙

宝塔成
众神笑

圣牛圣
凡人凡

雨不分地理区域街道地倾盆而下
人不分肤色口音信仰文化并肩而立

下面这一首《南大湖畔》勾起南大残留的情感，它在社会进程与教育发展上以及个人生命上曾有的印记。首三节以叔叔和阿姨的故事叙说一个集体的故事。“挖湖”喻示当年群体的热忱与奉献。他们对彼此的爱隐含对于“湖”的爱，第一句爱的问候至今仍深深埋于湖底。第四节出现不测的因素。“雨季淹水”是个讯号。雨欲来而风满楼，叔叔阿姨急了，他们把秘密向对方倾诉。南大湖啊，我心中的爱！对南大湖的爱深化了他们对彼此的爱。湖呢？它平静如镜，可湖底下它汹涌的情绪一直汹涌着。湖与人，长长久久灵犀相通，相互感应着血脉的跳动。

宗教 · 文化地标：《南大湖畔》

听说叔叔当年是集体挖湖的时候
认识了阿姨

那湖底还埋着
第一句

你还好吧
啊，还好

后来雨季淹水
连未说出口的秘密
都不小心
溢出

一如平静湖面底下
汹涌不已的
情绪

狮城地标凝视了大众的眼睛，《狮城地标诗学》书写了陈志锐对狮城地标的凝视。狮城、大众与诗人在地标的时空变换里产生智的交汇，情的默契，美的愉悦，在一册图文里将继续变换它的魅力。

（作者为本地作家）

和衷共济、勇于开拓的族群：新加坡华族

文 · 朱添寿　图 · 编辑部

我们都知道，新加坡近代史，是从1819 年莱佛士登陆开始。自开埠以来，这块英国殖民地，就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东南亚一个繁荣的自由贸易港口。它作为一个经贸中心，很快地就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不断涌入，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多元的民族和文化习俗，在这小岛上交集、融合，相互影响和发展，而其中华族先贤在新加坡自开埠、殖民、自治、建国初期到今日，一直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移民 – 公民

19世纪末的中国内忧外患，人民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民不聊生，纷纷南下寻找生路。飘洋过海落足到这个弹丸小岛的人，主要是来自东南沿岸的福建人和广东人。华族成为新加坡最大的移民族群。这些华裔祖先初到新加坡时，人虽然远在南洋，心里却还是向着远在中国的家乡和亲人。

早年的这一批各族群体，说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文化。他们来到异乡，受着英国政府的管辖，但却得不到殖民政府的照顾，生活很不容易，各族群很快就明白团结才是力量。当时的华裔移民多数从事劳动性的工作，俗称“苦力”。他们背井离乡，以一股“自力更生，坚毅不拔”的精神，面对并克服了种种困难。为了生存，他们依着“血缘、地缘及方言”的关系，成立了一个个的宗亲组织和会馆，相互照应。在那时候，除了掌权的英国人，其他种族的权益不但不受重视，在关键时刻，往往都是被牺牲的一方。这层厉害关系在经过“二战”之后，很多人就更明白到这个道理。

宁阳会馆是新加坡最早的华人会馆，由曹亚志创立

1960年代初，李光耀总理访问琼州会馆

随着二战的结束和中国内战局势的不稳定，许多人放弃了回乡的想法，并把家人接来，在这里落地生根。这些华裔移民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对这块土地有了感情。华族的领袖们经过多方努力，于1957年，新加坡的华人社团成功向英国政府争取，让当时在这块土地工作多年，有所贡献的合格移民，登记成为新加坡公民。这次受益的不单只是华裔，连带其它种族也纷纷成为新加坡的第一代公民。他们在此时才真正有了公民的身份，对这片土地有归属感；他们积极参与国家建设，掀开新加坡历史性的一页！

国民服役

我国的建国历程，可以说是无助与无奈。在1965的8月，平地一声雷，新加坡被迫脱离马来西亚，在毫无准备之下，一夜之间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百废待兴的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国家不可以没有军队，于是立即成立了新加坡武装部队。1967年，新加坡国民服役法令成立，征召第一批国民服役新兵入伍。当时的华人有着旧思想:“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对当兵有极大的反感。这时，华人领袖挺身而出，大力支持国民服役，让人民了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以及全民皆兵的防卫重要性，奠定了我国这50年来的国防根基。

重视教育

19世纪初的新加坡不过是英国政府很多殖民地之中的一个，英国政府对新加坡的教育政策，只在乎培养一批能为他们服务的当地文员，而当时官方用语都是以英文为主。从中国移居新加坡的华裔族领袖，担心因久居异域，子孙们会渐渐忘本，逐渐与中华文化脱节。他们也极具远瞻，知道教育脱贫的道理，于是便成立不少华校，传承华文与华族文化。为了进一步提升本地华文教育的水平，华人领袖登高呼吁，全华社动员起来，上下同心，并获得周边各地华人的大力响应和支持。筹款设立了南洋大学(今天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使之成为东南亚的华族子弟，提供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

新加坡独立之后，英国政权虽已离开新加坡，但在国家制度上，新加坡承继了英式行政与法律制度。在教育制度上，政府明白英文在国际市场上的重要性。在行政上，政府认为民族融合的先决条件是要能使用同一种语言沟通。这样才能避免隔阂，而这种语言不可以偏袒某一个民族。考虑到英语在国际上的实际用途，我国虽然在宪法上规定英语、华语、马来语及淡米尔语都是官方语言，但在社会上，英语却是主要的工作语言。

第一次国庆检阅(1966)

1956年3月15日，由陈六使和其他代表主持了南大的升旗仪式

自1987年起，新加坡逐步统一了学校教育的语文源流，所有学生不分种族都以英语为“第一语文”，而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都属于第二语文。这项政策的结果，是学校已经没有华、英校之分，渐渐造成重“英”轻“华”的局面。面对繁重的课业，和基于现实职场上英语的强势，很多家长决定让孩子“放弃”华文，专注在英语和其他科目上。

从90年代到本世纪初，华文在新加坡经历了近20年的低潮期。然而，新加坡的华人社群对保留新加坡的华族文化及推广华语的学习和运用，一直都不遗余力，坚持做中流砥柱。近10年来，民间组织如中华总商会、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文化团体、会馆属校，加上政府资助支持的组织和机构如通商中国、华社自助理事会、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新加坡华乐团、华文报集团、戏曲学院等，都积极地开

1986年成立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其他社团一道，不遗余力地推广华族文化

在建国50年后的历程中，我国的华族，应该具有扎根于此，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爱国精神和关怀自己国家的情怀，在各方面继承先贤的刻苦耐劳，自力更生，坚韧不拔，融洽共存的传统，继续为我们的国家作出贡献。

办课程、举办座谈会、演出、展览、出版刊物，群策群力，把华族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灌输给我们的下一代，包括新移民。让大家在共同的理念下，继续为国家做出贡献。

施医赠药

早期的新加坡居住和卫生条件差，尤其是从事劳力工作的劳苦大众，得不到应有的基本医疗照顾。当时很多富裕的华族领袖，秉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理念，决定慷慨解囊回馈社会，除了兴办教育，也联合其他华商兴建医院，如同济医院、广惠肇方便留医院、中华医院、大众医院和善济医社等，一直就是采取施医赠药或是收取象征式费用的形式，以济世救人的精神，为广大民众，尤其是低收入者看病施药。这些慈善医疗团体，于政府的医疗体系之外，乐善好施，受益的群众不分种族，在辅助百姓的医疗健康方面作出了贡献。

商贸

19世纪成立的中华总商会，凝聚各界的华商，在商场上因为经济效益的关系而合作。这些华商因为来自同一块土地，早期在商会的体制上，有帮派的配额。但先贤们也都承继华人传统文化的思维，体现出同舟共济精神，也明白求同存异，群策群力的重要。建国后，商会逐渐从狭小的帮派利益，推广到整个华商群体利益的层面。面对世界经济的变迁，当新加坡经济也面对转型的时候，政府为了更有效推动经济，推出政策，华商也尽力配合，过程中经过了许多痛苦与牺牲。因此，这50年来，新加坡的经济腾飞，虽然是政府政策推行的成功，但华商在这方面的顾全大局，大力支持，积极转型，大胆走出国外，政商配合，达成一个互利互惠的局面，对我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确也是功不可没的。

本土文化艺术

蕉风椰雨的东南亚，令人神往的艺术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晶。这一地区经过上百年来欧洲殖民地政府的管辖和影响，造成了这里的人民基本上能接受多元的宗教信仰并存的开放与包容心态，为这里的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热土。往日的新加坡位于东南亚水路交通的中枢，今天更是国际航运交通和经贸的世界级的大都会，东南西北的艺术，很自然地在这里交汇。我们多年来一直在民族“个性”和“国际化”思潮中碰撞、激荡、擦出火花。当代艺术家们吸纳西方式的艺术语汇和手法，但诠释的形象元素仍属于东南亚的地缘性本土文化。他们永远在寻觅自我，坚守着属于本土民族的精神家园，正是因为这样，东南亚的艺术即便是被置入国际化的大环境里，仍然灿烂辉煌。

中华总商会新大厦于1964年举行落成典礼

中华总商会协助灾民赈灾 (1956)

以华族文化为例，无论是书画、诗词、戏曲、音乐、舞蹈、戏剧等传统艺术，还是春节、清明、中秋等传统节庆，或嫁娶生死、饮食健保等传统习俗，都是新加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中，新加坡的几位先驱画家，以独特的艺术远见，结合了中西画法，着力描绘东南亚的风土民情。他们的画风，可以说是后来“南洋画风”的滥觞，影响了新马地区画家的创作风格。

众多的民间艺术和文化团体自发地不懈努力，以及政府和商界的大力资助，为我国华族文化的传承和推广提供了一个土沃水足，遍地开花的文化艺术园圃。为了孕育本地华族文化的健康发展以及从大中华文化中汲取适合我们的养分，我国政府在近几年来，对华族传统艺术的推广，更是在人力、财力资源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而我国的年轻一代艺术家，也在国际艺术舞台上，绽露骄人成绩，为我国增光。

结语

在今年我们欢庆建国50周年大庆之际，简略地把我们华族先贤在建国过程中，所经过的艰辛历程和付出的努力，稍作疏理。以古鉴今，希望鼓励我们的下一代，知道目前的繁荣和升平来之不易。先辈们几经打拼，和各族求同存异，共同为我们自己的国家，树立了国家精神，创造了财富。在我国建国以前，南来的文化人，虽然还不能成为国民，但他们却能够在各自的领域，关心这里的民生，融入这里的生活，他们虽然还是心系着北方的家乡，但是却已经着眼于本地意识，艺术作品呈现出本土风情，本土色彩。这批文艺先锋，为我们打下了日后发展本土文化的基础。在建国50年后的历程中，我国的华族，应该具有扎根于此，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爱国精神和关怀自己国家的情怀，在各方面继承先贤的刻苦耐劳，自力更生，坚韧不拔，融洽共存的传统，继续为我们的国家作出贡献。

(作者为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总裁)

The Chinese contribution to Nationhood

From a seedling to verdant foliage

It is common knowledge that Singapore's current history began in 1819 with the landing of Sir Stamford Raffles. From its founding, this British Colony had speedily developed into one of South-east Asia's busiest entrepot ports. Being a trading centre, it quickly attracted a large variety of immigrants constantly moving in. They brought along their dialects, customs and culture. The diverse ethnicity and cultural practices, thrown intimately together in a small island, influenced each other whilst they developed. In particular, the early Chinese settlers through all the phases from port to Colony, from self-government to birth of Nationhood till today had always played a key role.

From Immigrant to Citizen

Towards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China faced internal strife and external incursions. The people, beset by The Opium Wars and the Tai Ping Rebellion were uprooted and dispersed southwards to survive. Drifting across the South Seas to finally set foot on the miniscule island were the people from Fuji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Chinese eventually became the largest immigrant community. These Chinese forebears even though whilst living in Singapore far away in Nanyang, still had their hearts with families back in China.

The early settlers spoke diverse dialects and were from differing cultures. Even as they were settling down, they were subject to British rule and not receiving any welfare from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Life being very difficult, they therefore congregated in unison for strength. Chinese immigrants formed the bulk of the labour force, known as "coolies" Having left home and village, they plucked up a spirit of self-reliance and never-giving-up; overcoming all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For their survival, they relied on connections of blood relationship, native village origin and dialect; setting up individual clan organisations and associations for mutual help and care. The situation then, with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British, was that the interests of the locals were ingnored and even sacrificed when under critical circumstances.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people clearly understood these discrimination and injustices.

With the ending of the War and the great upheavals in China, many gave up the idea of returning to China and arranged for their families to come over and settle down here. The immigrants then gradually adapted to the life here and also nurtured a fondness for the land. The leaders of the various Chinese communities put in a concerted effort to negotiate wit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in 1957 successfully secured for most Chinese, who had worked and made contributions, to be registered as citizens of Singapore. The benefits of citizenship was not limited to the Chinese but was offered to all other races as well, thus forming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Singapore's own citizens. From then on, having a clear status of citizenship, a sense of belonging was cultivated and they heartily participated in all aspects of building a Nation. Hence, opening a new phase in Singapore's history.

National Service (NS)

The process of our nation-building can be best described as one of "no-help" and "no choice". In August of 1965, in a sudden outburst of events, Singapore was booted from Malaysia, caught unprepared at the suddenness of being an independent country, the resourceful government recognized that a country cannot be without an army. Accordingly, the Singapore Armed Forces was set up. In 1967, the National Service Act was passed and the first batch of National Servicemen were induct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then was "good men do not become soldiers; and good steel do not become nails" – an anti-soldiering sentiment. The community leaders then took action to show support for NS and manifes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adage " A Nation's well-being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ll men". Thi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50 years of National Defenc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From the 19th century onwards, Singapore being merely one of the many British colonies,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education policy is to provide just sufficiently educated manpower to serve their needs, with English being the only language focused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worried about the great separation in time and distance from China will cause future generations to gradually forget and lose their original Chinese cultur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standard of local Chinese education, they raised a resounding call for all Chinese bodies to come together. This even spread to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for the Chinese there to rally and support the call. The funds for and the formation of Nanyang University were realized, thus establishing for the whole Chinese fraternity in South-east Asia, an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Nanyang University is the forerunner of today'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fter independence English was retained as the language for administration and judicial purposes, even with the departure of the British. As an educational policy, English was taught as the government realised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s.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government recognized that racial integration requires a common lingua fraca and which does not emphasis the language on any racial groups. Then English with its international usage, was considered the most practical. Even though the Constitution guaranteed that English, Chinese, Malay and Tamil as official languages, in society English became the main working language.

From 1987 Singapore gradually streamlined the language of transmission in schools. All students, regardless of race, used English as the 'first' language with the corresponding Mandarin, Malay and Tamil as 'second'. The result was a gradual merging of the English – Chinese schools divide; slowly English replaced Chinese in major subjects. In deference to the employment requisites, parents also relinquished the idea having their children studying Chinese.

From the 1990's till now, Mandarin

□□□□_L5.indd 100 10/21/15 9:51 AM

in Singapore has been in a very "low key" position. In spite of this, Chinese society continued to carry out Chinese cultural activities, Mandarin lessons and usage – never letting up their efforts and enthusiasm. In the last 10 years or so, many communal organisations like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FCCA and clan associations together with government-supported organisations like Business China, CDAC,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Singapore Chinese Orchestra, Chinese press organisations, and Chinese Opera Institute, etc putting concerted effort in holding Forums, lessons, performances, exhibitions and publications – all aimed at transmitting Chinese culture and values to our next generation, including new citizens. Thus, building a common consensus in Nation-building efforts.

Health and Medical care

In early periods of Singapore living and health conditions, especially amongst the largely hard labouring populace, did not receive the proper attention. At that time, many wealthy Chinese communal leaders adopting an axiom of "From the Society, Used for Society" decided to generously contribute back to Society; besides caring for education also combining with businessman to build hospitals, viz Thong Chai Medical Institution, Kwong Wai Siew Free Hospital, Chung Hwa Free Clinic, and Public Free Clinic, etc. All these offering TCM consultation and Herbal prescriptions, charging just nominal consultation fees, in a spirit of universal care and public welfare especially for the low income groups. These charitable medical institutions offered a welcomed source of medical care for all races and operating outside of the government's medical administration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public healthcare.

Trade and Commerce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established in the 19th Century, was to gather all Chinese businesses so as to set up a co-operative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its early days the Chamber was administered on a clan-separated basis. Yet, the early founders also accept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isdom of "row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and importance of "unified strategies with unified strengths" to reach common objectives. After Independence, the Chamber gradually dissolved its clan-based ways and moved towards an all embracing beneficial Chinese business mode. Whenever Singapore's economy faces the World's economic vicissitudes, the Chamber has invariably strived to co-operate with all the Government's economic measures, in spite of painful sacrifices in the process. Consequently, in the last 50 years when Singapore's economy has taken off with the Government's successful policies, it was also the astuteness in all aspects of Chinese businesses, boldly venturing world-wide and unwavering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and-Business that resulted in mutual fruitful benefits. Our Na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attainment of a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is an indelible mark of achievement.

Local Culture and Arts

The tropical idyllic image of South-east Asia has offered a melting pot of East-West cultures. The colonial rule throughout the region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has instilled an acceptance of differences of religious beliefs and high tolerances. This has provided a fertile soil for local artistes. Singapore being centrally located at the cross-road of S.E.Asian seaways and later as the hub of international air routes, means a convergence, flourishing and exchange of cultures from all the world. In many years of our ethnic 'individuality'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our thoughts have collided, met with turbulence and created bright sparks. As our artistes absorb the milieu of Western artistic language and forms, the image of their works still preserved a South East Asian native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ir never-ending search for individualistic creativity, they have preserved their native-born culture. Because of this, South East Asian arts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a shining beacon in the international firmament.

As for Chinese culture, no matter in literature & art, poetry & prose, musicals & music, dance & theatre; or festivities like Lunar New Year, Qing Ming, Mid-Autumn; or traditional rituals in marriages, births, deaths and feastings – they all form an important part of Singapore culture. In the last century, several artists pioneered a Sino-Western art-form which stylistically incorporated S.E. Asian native flavors. This group of artists was later credited with establishing the very influential "Nanyang School" throughout Singapore and Malaya.

Many artist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s have developed vigorously with strong support from both Government and businesses. To provide a rich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o nurture a healthy and rich local Chinese cultural establishment, the government has in recent years provided strong financial and manpower resources. Our young generation of artistes has achieved enviable results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doing Singapore proud!

Conclusion

As we celebrate 50 years of Nationhood, this article briefly lists our Chinese forebears' labours and diligence in the nation building process. It is hoped that the future generations will remember that the today's prosperity and well-being are the results which our forebears, together with other races made possible. Before Independence period, they came south and assimilated the life here; and although still thinking of their homes to the north, they took care of living here and made good their livelihoods. In this process, they also enriched local arts, enhanced their colours and adapted their thoughts,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our generation. After 50 years of Nation building, local Chinese has developed a deep sense of patriotism and loyalty for the country – to be "born here; live here; die here" thus perpetuating the undying perseverance and diligent spirit of our ancestors in building the Nation.

(Written by Choo Thiam Siew, CEO of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富裕的巴韦安人和他们的仆人(1910年，国家博物馆供图)

本是同根生：新加坡的马来族群

原文 · 苏海莉 · 奥斯曼(Suhaili Osman)　翻译 · 李国樑

多元文化的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但那许多张新加坡人的脸孔却被笼统地归纳为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以及模糊不清的“其他”种族。这种“统一”本地种族与文化的方式忽略了每个社群自身的历史与文化，掩饰了新加坡的多元性。多年来，新加坡的教育与语文政策强化了这样的文化定位，同时简单地将现代国人的源头链接到中国、马来群岛与印度。实际上，每个族群都是多元化的，甚至有混杂的语种和方言。

虽然早期新加坡人口普查的方法并不精细，收集到的资料也不可靠，但至少呈现出居住在英国殖民地的不同族群。早期的人口普查将海外华人分成不同的方言群，马来群也分得较细，有马来人、武吉斯人、爪哇人、峇厘人、巴韦安人。在那个年代，来自不同地方的马来人被认定为不同的族群。

由于对英殖民地政府越来越不满，本地的马来人在1926年成立了新加坡马来人联盟(Kesatuan Melayu Singapura)。[1] 马来人联盟引发何谓马来人的辩论，团结了来自马来群岛(Nusantara)的族群，[2] 鼓起民族主义的情绪。

今天，就国家政策与务实的角度而言，“马来人”这个词汇简便地涵盖了所有来自马来群岛的族群。在某个程度上这样的归纳方式并没有错，但若是追源溯流，许多本地马来人还是十分在意“我从哪里来”的文化底蕴。新加坡马来人的集体记忆和所属的社群组织都抵制了政府统一他们的移民历史和文化习俗的做法。各马来社群还是非常重视他们种族的特殊

性，包括语言、习俗与日常生活，以保留他们的根。

以种族为基础的协会和社会机构

19世纪的新加坡以及海峡殖民地成立了许多以族群为首，类似华人的宗乡会馆的组织，它们的首要任务是安顿来自同乡的新客和他们的眷属。本地最古老的马来同乡组织是新加坡巴韦安人协会(Persatuan Bawean Singapura)，于1934年3月19日在社团法令下注册，[3] 并获得殖民地警察总监的鼎力支持。

巴韦安人协会跟族人同心协力，帮助从巴韦安岛移民到新加坡的新客，为他们提供住宿和生活费。那些没有工作的，协会为他们介绍工作。其他来自马来群岛的族群，包括爪哇、武吉斯和米南加保人也陆续组织了非正式团体，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停止运作。

新加坡米南加保协会(Persatuan Minangkabau Singapura)于1995年8月31日成立，宗旨是维护和促进米南加保文化，同时将米南加保人的习俗与传统介绍给新加坡人与其他人士。

“来自相同的群岛”展览系列

为了促进各马来族群间的相互认识，从2013年底开始，马来传统文化馆[4]着手筹备一系列的常年展览，称为“来自相同的群岛”。相同的群岛为大家缔造一个交流的平台，让各个不同的马来族群呈现他们的文化与传统。马来传统文化馆跟各个文化协会与族群组织合作，共同研究与呈现相关的展览。[5]

第一个展览“时代的变迁：新加坡巴韦安人的遗产和文化”，在2014年3月至8月展出。这是个跟新加坡巴韦安人协会合作的项目，呈现离乡背井的巴韦安人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习俗。巴韦安是爪哇东北部的一个小岛，早在19世纪，巴韦安人已经来到新加坡定居。

第二个展览“咫尺天涯：登陆后打造一片天空”，在2015年5月17日至9月13日展出。这是个跟新加坡米南加保协会合作的项目，主题是呈现米南加保文化的包容性。

为我们提供资料的巴韦安人、米南加保人和散居新加坡的原族群都深具代表性，他们也渴望让观众感受到他们并非固步自封的社群，与时并进是他们高度重视的文化特性。

在国家与效忠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的年代，马来世界对“移民”的理解跟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跑江湖”是巴韦安人和米南加保人的传统，人们不惜离乡背井，到异地他乡寻找财富。他们或是在陆地上披荆斩棘，长途跋涉；或是乘着小舟或其他经得起风浪的船只，随着季候风飘泊到爪哇海与印度洋的商港。

早期的米南加保移民则被吸引到商贸和需要劳工的城市。20世纪初，米南加保人将家乡的橡胶、咖啡和烟草带到新加坡销售。他们在西苏门答腊翻越高山丛林，来到东岸的廖内省，续程越过马六甲海峡，抵达新加坡。

巴韦安人四海为家，多代以来累积了丰富的航海知识，船只是他们理所当然的交通工具。巴韦安距离东爪哇的首府泗水以北120公里。巴韦安人航行到马来群岛各地，包括新加坡。每逢交易的季节，这些在江湖上跑动的商人就会在各个商港逗留数月，换季的时候才随着季候风回家。

每次成功的回航都会提高这些商人在社群中的地位，丰富的阅历使他们变得更加神奇，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村民离开家乡，到各地区碰碰运气。

群岛的移民文化习俗

没有可靠的资料显示在英国人来到新加坡之前，巴韦安人和米南加保人已经在新加坡定居。19世纪初，巴韦安人开始移民到这里。对前往麦加朝圣的回教徒而言，新加坡是个很好的中途站。巴韦安人和群岛的族群一样，中途过境新加坡攒路费，续程到阿拉伯去。

到了20世纪初，新加坡这个自由港充满无穷的经济生机，移民的浪潮格外蓬勃。早期先民兴建棚屋

巴韦安人用这样的小船到马来群岛各地寻找财富(Osman Jonet先生供图)

(ponthuk)，接济漂洋过海来到异地，举目无亲的族人，为他们提供短期住宿与社交场所。这些棚屋多数是由富裕的商贾出钱兴建，让来自同村的新客有个落脚之处。

巴韦安人集居在惹兰勿刹与赛阿威路之间的梧槽河畔。许多座落在惹兰勿刹附近的甘榜加卜一带的战前店屋都成为巴韦安人的住家。[6] 19世纪的时候，住客多数是男人。住客将月租交给棚屋的首领，这笔钱是租金也是互助金，用来为族人治病、失业救济和缴付罚款等。巴韦安人生活中的大小事由棚屋首领料理，如果住客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首领会提供食物与日常用品。首领和居民之间形成一个社会架构，保证每个人的福利都获得妥善的安排，直至他们找到工作与宿舍，或者已经有经济能力，将家庭接过来，安顿自己的家园。

在跑江湖这方面，巴韦安人和米南加保人有许多相似之处。跑江湖让这些人累积财富与提升社会地位，甚至表示自己已经成人，可以自立了。有句米南加保的谚语：“Dima bumi dipijak, di sinan langik dijunjuang”，它跟马来谚语“Di mana bumi dipijak, di situlah langit dijunjung”是一样的。这句谚语说“你站在什么地方，头顶上就是那里的天空”，也就是入乡随俗。这句话成为米南加保人远洋在外的座右铭。作为一名米南加保人，除了努力地保护米南加保文化，遵守宗教信条之外，也必须跟随当地的风俗与传统。

米南加保人宣称，他们跟其他群岛的移民不一样，他们不会在别人的地方成立米南加保村落。他们更重视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的文化习俗同化。通过一些在本地作出非凡贡献的米南加保人，我们可以对米南加保文化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友诺士 (Mohamed Eunos Abdullah，1876-1933)是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的第一位马来委员，也是新加坡马来人联盟的创建人之一。二战英雄阿南少尉(Lieutenant Adnan Saidi，1915-1942)在新加坡的保卫战中英勇抗敌而牺牲。尤索夫(Yusof Ishak，1910-1970)出任新加坡第一任总统，曾经在新闻媒体和公共服务领域任职。

虽然米南加保人被椰加达、廖内、森美兰和新加坡的当地社会同化，但他们拥有坚固的同乡会体系与

米南加保人的家庭 (1890-1920，国家文物局提供)

米南加保人的社群节日 (Hjh Junaidah Bte Junit供图)

社会组织。米南加保人是苏门答腊岛上最大的族群，他们的文化是母系继嗣的。一般人认为米南加保人的财富是继承了妻子的家势，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些财富来自先民跑江湖所打造下来的基业。表面看来，先人留下的遗产，已经足以使女人和后代高枕无忧。

在母系社会里，女人继承祖先的土地与财产，后裔可以通过女系追溯他们的族谱。母系社会分成不同的部落，再进一步划分为家族。每一个部落由一名长老出任族长。同样的，每个家族也由一名长老担任家长。米南加保跟其他群岛社群不同之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平等的社会，经济角色分工明确。在习惯上，女人掌管土地与产物，男人负责公共行政与领导宗教事务，例如族长与家长。

米南加保的习俗有两个分支：第一支奉行的是阶级制度(kelarasan Koto Piliang)；另一支奉行的是平等的观念(kelarasan Bodi Caniago)。它们在米南加保的社会体系中相辅相成。此外，米南加保通过对历史的认识与尊重(Tungku Tigo Sajarangan)来维护和发展米南加保的节日、祭祀和文化。宗教专家、知识分子和长老拥有相等的地位，社区的相关事宜都通过这三组人磋商来取得共识。

巴韦安人的社交网络与社群关系则体现在棚屋文化里。巴韦安人和米南加保人一样，通过协商来维系社会秩序与和谐。凡是促进融洽的工作，整个社群都会守望相助，一同参与。这些活动包括筹备婚姻，割礼仪式以及治理丧事。这种特质已经成为本地马来社会的代名词，新加坡政府甚至将这种互助精神提升为国家长远的愿景。

新加坡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发展加冷与新加坡河口，甘榜与商业中心近在咫尺。马来语作为这个时期的区域语言，自然成为民众交谈的日常用语。群岛的移民开始“异族通婚”，接受伴侣的文化习俗。在这个海港城市生活的居民如爪哇人、巴韦安人、武吉斯人、米南加保人、峇厘人和班加人，至少在表面上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他们信奉相同的伊斯兰教，注意饮食和得体的穿着，显示出群岛族群有相同的文化而不是分野。

虽然伊斯兰教是群岛社群的共同宗教，大家遵守相同的道德价值观，每个族群还是保留着自己的风俗文化与独特的表演艺术。许多年长的爪哇人、巴韦安人、米南加保人和班加人还使用母语交谈。米南加保语跟马来语非常相似。

米南加保人的传统习俗与习惯法都通过文学的形式流传下来，包括故事、传说、班顿(诗歌)和谚语。在重要的社交场合如社群节日，米南加保人会致欢迎词；向对方的家庭提婚的时候，必须吟诵美丽的班顿。这一切都凸显了米南加保人继承了祖先的传统，喜欢展示演说的才华。

同样的，巴韦安人对他们的传统口头表演深感自豪。新加坡的巴韦安人在马六甲海峡居住下来，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他们的巴韦安语跟原地的巴韦安语有点不同，演变成本地化的石叻巴韦安语。有趣的是，巴韦安人将许多阿拉伯与伊斯兰教的元素并入他们的传统文化表演。手鼓和歌舞表演穿插了口述故事、回教徒的仪式、划一的动作和中东风格的节拍和旋律。这些音乐演出通常在家庭聚会、婚礼和宗教仪式上进行。

马来语的经济角色和方言的保存

巴剎马来话(Melayu pasar)和新马的学校传授的正统马来文(Bahasa Melayu)是各马来群岛族群的沟通语言。1960年代，有一支可爱的新加坡五人“燕子乐队”(The Swallows)使用巴韦安语灌录了“Laaobe”(不一样的时光)专辑。唱片封套印上“La-a-Obē”，其中一首以披头士的音乐改编的“pop yeh-yeh”在1966年首次通过电台播出。这支充满动感的乐队，凭借充满魅力的队员Kassim Selamat (1934-)，红遍新马。值得一提的是，燕子乐队跟EMI签约后，成为本地娱乐杂志的宠儿，经常在电视上露面。“Laaobe”声名远播，甚至流行到当时的西德。

同一时期，许多巴韦安人在娱乐圈闯出名堂，成为著名的演员、表演家和唱片红星。多才多艺的Saloma (Puan Sri Datin Amar Salmah binti Ismail，1922-1983)是名声大噪的歌手兼影星，Sanisah Huri、Salim I、A Romzi 、Jaafar O这些1960-1970年代的名歌星都是巴韦安血统。直至今

燕子乐队的唱片封面（1966年，Kassim Selamat供图）

天，“Laaobe”依旧是新马巴韦安人的代名词。

遗憾的是，当今的新加坡马来人通晓米南加保、巴韦安、爪哇和其他群岛的母语的新一代并不多，不过一些原来的文字与词语还在继续使用，补充马来文的不足。

马来人的身份认同

大家了解了米南加保和巴韦安两个马来社群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传统，可以进一步想象新加坡马来社群的复杂性。本文绝不是为了将马来世界的各族群归类成划一的文化和语言，这是因为无论研究巴韦安人、米南加保人、爪哇人、武吉斯人、班加人、峇厘人、亚齐人或曼特宁人，到头来都会面对“谁是马来人”这个相同的问题。

东南亚历史学者和钻研马来世界的学术界人士，包括Anthony Reid、Leonard Andaya、 Anthony Milner 和 Virginia M. Hooker，就马来人的起源追溯到公元二世纪的埃及托勒密王朝。[7]

有证据显示“马来(巫来由)”(Melayu/Malayu)这个词汇来自远古，但无法确定马来这个地方到底在何处。中国从公元7世纪开始便使用“马来”，指的是室利佛逝或三佛齐(Sivijaya)，马可波罗则称之为Malayur。室利佛逝乃1290年左右苏门答腊的古王国。[8]

即使马来文献对于马来王朝的确实地点也交代得模糊不清。《马来纪年》中的马来指的是马来王和马来文化，不过巫来由的所在地竟然是神话般的西衮当山(Bukit Siguntang)和小小的巫来由河(Sungei Malayu)。更有趣的是，巫来由并不是目前学者所指的苏门答腊、巨港或占碑这些马来王朝的据点，因为古代中国、印度、阿拉伯和欧洲旅客都称这些地方和当地人为爪哇或爪夷。

相反的，16世纪的马六甲称“马六甲人”为“马来人”。《马来纪年》和《汉都亚传》使用“马来人”来代表那些马六甲“马来苏丹”的支持者。[9] 当1511年葡萄牙攻占马六甲时，昔日的马来苏丹的追随者纷纷在这个区域寻找新的出路。那些流落各地，讲马来话的侨民依旧保留着“马来”文化与身份认同。他们对马来苏丹忠心耿耿，宣称自己是马来人。因此，何谓马来人的界限是相当灵活的。

到头来，来自马来群岛，不同根源的新加坡马来人必须在多元种族的社会寻找共同点。表面上，在新加坡的马来政体中，各马来族群并没有身份认同的问题，但是，无论是爪哇人、巴韦安人、米南加保人或其他族群，民族特性将继续存在。

马来传统文化馆由衷感激新加坡马来社群赐予这份殊荣，能够一起庆祝源远流长的马来文化传统，并期待跟爪哇社群一起筹备2016年的“来自相同的群岛”系列展。

(作者为马来传统文化馆助理研究员)

参考资料

1. Timothy P. Barnard (ed.), Contesting Malayness: Malay Identity across Boundaries (NUS Press, Singapore, 2004)
2. Phyllis Ghim-Lian Chew,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of Early Identities in Singapore: From Colonialism to Nation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展览资料

1. Laaobe: Warisan dan Budaya Masyarakat Bawean di Singapura (Changing Times: Baweanese Heritage and Culture in Singapore) which ran between March and August 2014.
2. Marantau: Dima Bumi Dipijak, Di Sinan Langik Dijunjuang (Coast to Coast: Atlasing the Sky Wherever One Has Landed), which runs from 17 May to 13 September 2015.

注释:

[1] 新加坡马来人联盟的成立，被认为是导致马来半岛原政治生态下形成其他类似性质的组织的源头。

[2] 以现代的说法，“马来群岛”指的是马来-印尼群岛，Nusantara是旧爪哇文，包含两个词根：“群岛”(nusa)和“之间”(antara)。

[3] 新加坡巴韦安人协会在1947年重新注册，将原来的Persatuan Bawean Singapura Association改为Persatuan Bawean Singapura。Association跟Persatuan是重复的文字。

[4] 2012年9月，马来传统文化馆重新对外开放，在甘榜格南的前苏丹胡先皇宫设立了永久展厅。19与20世纪的甘榜格南是个繁忙的商港，人来人往，商贸发达，并引导访客进入关键性的层面：谁是新加坡的马来人？这里不是要提供结论性的答案，而是鼓励大家通过多维的角度和当代马来人的身份来思考此问题。

[5] 合作的模式是让个社群的工作伙伴负责制定展览的内容，联系社群，收集文物，对他们是个崭新的体验。马来传统文化馆提供专业建议与资料。社群伙伴也制定展览的其他节目，这是他们的强项，因此这些节目都充满活力，令人振奋，跟整个项目融成一体。

[6] 例如Pondok Diponggo, Pondok Kalompang Gubuk, Pondok Tachung, Pondok Teluk Dalam, Pondok Paromaan, Pondok Sangkapura, Pondok Keleam and Pondok Tandel。

[7] Anthony Reid ‘Understanding Melayu (Malay) as a Source of Diverse Modern Identities’. Timothy P. Barnard (ed.), Contesting Malayness: Malay Identity across Boundaries (NUS Press, 2004)，第三页提到，托勒密的‘Golden Khersonese’地图加入了爪哇文‘Melayu Kulon’，也就是“西巫来由”。

[8] 同上

[9] 同上

Serumpun/ Roots of the Same Tree: Ethnic Malay communities in Singapore

Suhaili Osman, Asst Curator, Malay Heritage Centre

A multicultural Singapore

When Singapore is presented to the world as a multi-racial or multi-ethnic country, the 'many faces of Singapore' inadvertently fall under the 'Chinese-Malay-Indian' (CMI) and nebulous 'Others' administrative categories. This rubric (at least the CMI part of it) of easily identifiable ethnic-cultural categories has tended to gloss over the real diversity of Singapore's polity, along with each ethnic community's respective histori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Various language and education policies over the years have tended to reinforce the neat categorisation of cultures in Singapore at the same time they create a pseudo-link to respective ancestral homelands of China,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India – which realities are a cacophony of language groups and dialects across multiple ethnic communities.

Although the methodology was rough and the data unreliable, the early censuses of the Singapore population taken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listed separate figures for the various ethnicities who were residing in the British territories. Just as the British censuses differentiated the overseas Chinese by their dialect groups, they also distinguished between Malays, Bugis (or 'Buginese'), Javanese, Balinese and Baweanese ('Boyanese'), indicating that these communities were perceived as distinct ethnic groups at the time.

In 1926, as a response to growing disaffection wit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the Kesatuan Melayu Singapura (Singapore Malay Union or KMS) was set up. The KMS[1] sparked debate on defining a Malay identity which would unify the aforementioned ethnic groups from the Nusantara[2] with the effect of stimulating nationalist sentiments. Today, as a matter of state policy and practicality, 'Malay' (and Malay/Muslim) has become the convenient catch-all for those of Nusantaran ancestry, promoting the notion of homogeneity within the community. While this may hold true to some extent, the deeper and longer roots of a plural ethnic and cultural heritage still matters to many Malays here.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agency of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Malay-Singaporeans have resisted the bureaucratic homogenisation of their migrant historie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By continuing to observe their ethnic particularities, dialects and customs in quotidian life, the diasporic Malay sub-ethnic communities have strived to preserve their distinct ethno-cultural markers to varying degrees of success.

Ethnic-based association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Many clan and ethno-cultural associations were established in 19th century Singapore (and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t large) for the primary purpose of extending aid to the newly-arrived fellow village kinsmen or relative to the respective colonial port towns. The oldest of the Nusantaran associations, Persatuan Bawean Singapura (PBS), was initially registered on 19 March 1934 under the Societies Act as the Persatuan Bawean Singapura Association.[3] PBS was formed to assist and supervise all the ponthuks or Baweanese communal houses which were scattered all over the island at that time and its establishment received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then British Commissioner of Police in Singapore. PBS worked together with the ponthuks in assisting the newly arrived migrants from Pulau Bawean, providing shelter and sustenance as well as assisting them to find employment in Singapore. Other Nusantaran communities, namely the Javanese, Bugis and Minang also formed less formal associations until 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Persatuan Minangkabau Singapura (Singapore Minangkabau Association - SMA) was established on 31 August 1995 with a mission to preserve and promote the Minangkabau culture in Singapore as well as to introduce and educate on Minangkabau customs and traditions to Singaporeans and non-Singaporeans.

The Se-Nusantara Series

To address this diversity, the Malay Heritage Centre (MHC)[4] started work on an annual exhibition series titled Se-Nusantara ('Of the Same Archipelago') in late 2013 to extend the discourse set out in its permanent exhibition. The Se-Nusantara series serves as a platform for the various sub-ethnic groups to represent themselves as MHC would partner with cultural associations or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to co-curate an exhibition with accompanying programmes.[5]

The first exhibition of the series was Laaobe: Warisan dan Budaya Masyarakat Bawean di Singapura (Changing Times: Baweanese Heritage and Culture in Singapore) which ran between March and August 2014. It was co-curated with PBS and featured the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al practices of the Baweanese who left their ancestral homeland, a small island off the north eastern coast of Java, and came to settle in Singapore since the 19th century. The second exhibition, Marantau: Dima Bumi Dipijak, Di Sinan Langik Dijunjuang (Coast to Coast: Atlasing the Sky Wherever One Has Landed), which runs from 17 May to 13 September 2015, focuses on the integrative aspects of Minangkabau culture and was co-curated with the SMA.

Both the Baweanese and the Minangkabau resource peoples who MHC worked with in the Se-Nusantara series were highly attuned to the diasporic origins of their respective communities in Singapore. They were also eager to impress upon the audience that the outward-looking perspective was a highly-valued cultural trait of the community. In a time before nation-states and national allegiances, the conceptualisation of migration in the Malay world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how it is understood today.

The Minangkabau and the Baweanese both refer to the cultural practice of merantau – when traders, merchants or young men seeking their fortunes – left ancestral villages either via arduous overland routes or with the monsoon winds on perahus and other such sea-worthy vessel to make for bustling port towns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Java Sea. Early Minangkabau migrants were attracted to urban areas where trade and wage-labour opportunities are found. In the early 1900s, Minangkabau

men travelled to Singapore, looking to trade home-grown produce such as rubber, coffee and tobacco. The traditional route taken was an arduous land route from West Sumatra over rugged terrain to traverse the Riau mainland to get to the eastern coast of Sumatra before continuing the journey over sea. For the Baweanese who were traditionally seafarers, sailing ships were the default mode of transportation to sail from their small island located in the Java Sea approximately 120km north of Surabaya, the capital of East Java,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archipelago, including Singapore. The bazaars and markets which sprouted and folded with each trading season meant that many of these itinerant merchants and traders spent several months in each port-town, travelling to and fro their homelands with each monsoon. With each successful return, one's standing in the community increased and stories about the places they made their fortunes grew even more amazing, enticing successive waves of village kinsmen to make their own luck.

Adaptative strategie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of Nusantaran migrants

While there are no reliable records as to how early the Baweanese and Minangkabau started settling in Singapore prior to European colonial presence in the region, the Baweanese started migrating to Singapore as early as the 19th century. Singapore's position as a transit point for Muslim pilgrims on the way to the holy city of Makkah in Arabia, saw many Baweans (along with other Nusantaran groups) ply their trades here to make enough money for the onward sea passage. The waves of migration intensifi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due to the vast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in the British free port. The early arrivals set up a 'ponthuk' (Malay: pondok), a communal lodging house which served as a temporary residence as well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organized along village lines of traditional authority. These ponthuks were usually established by the most materially wealthy early immigrants and aided new arrivals seeking work from their own 'desa' or kampong (village).

The Baweanese migrants settled along the bank of the Rochor River between Jalan Besar and Syed Alwi Road. Many pre-war shophouses located around Kampong Kapor Road near to Jalan Besar were turned into ponthuks such as Pondok Diponggo, Pondok Kalompang Gubuk Upper Weld Road), Pondok Tachung, Pondok Teluk Dalam, Pondok Paromaan, Pondok Sangkapura, Pondok Keleam and Pondok Tandel. Largely male up until the 19th century, the ponthuk residents paid a monthly fee to the 'pak lurah' or ponthuk chief, that covered more than just rent – it entitled him to certain rights of association – including a place to turn to in bad times such as ill health, employment dismissal or even traffic fines. If he had no means to support himself and his family, the pak lurah supplied him with meals and other necessities. Essentially the ponthuk communal residence formed a social structure that ensured the individual's welfare was taken care of until they found employment and on-site lodgings or were economically secure enough to bring their families over to Singapore and set up their own homes.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in the practice of merantau between the Baweanese and Minangkabau in terms of it being a means to increase one's wealth and hence social status as well as a male rite of passage. However, rather than birthing a system of communal residences abroad, 'marantau' as it is called in Baso Minang, instead highlights the assimilative traits of the Minangkabau emigrants. A Minangkabau proverb, 'Dima bumi dipijak, di sinan langik dijunjuang' has an identical rendition in Malay – Di mana bumi dipijak, di situlah langit dijunjung. The meaning of the proverb ("to carry the sky upon one's head wherever one sets foot on") is akin to the adage,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and serves as a guiding philosophy for the Minangkabau who journey to new lands. Thus, even as a Minangkabau strives to live by his/ her religious tenets and preserve Minangkabau cultural norms, he/ she should adhere to and uphold the local customs and traditions.

The Minangkabau hence claim that unlike other diasporic Nusantaran communities who set up enclaves in their adopted countries, one would not encounter a Kampung Minangkabau in foreign parts as the community emphasises integration into and assimilation with the local culture. The enactment of this ideal is probably best exemplified by the prominent Minangkabau figures featured in this section, who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unity-at-large and Singapore. Illustrious Minangkabau pioneers include Mohamed Eunos Abdullah (1876-1933), who was the first Malay member o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co-founder of the Singapore Malay Union, WWII hero Lieutenant Adnan Saidi (1915-1942) who sacrificed his life defending Singapore against the Japanese and independent Singapore's first president, Yusof Ishak (1910-1970), whose career spanned both the journalistic world and public service.

Nonetheless even as the Minangkabau assimilate into local societies on Java (namely Jakarta), the Riau islands, in Negeri Sembilan on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Singapore, they hold steadfast to a clan-based matrilineal system of social organisation. Considered to be the largest surviving society in which lineage and property are inherited through married females, some scholars have attributed this to the marantau practice where 'harato pusako' (ancestral property, Malay: harta pusaka) is naturally left in the hands of those who do not have to leave them behind. Thus, the welfare of the women and future generations is ostensibly ensured.

A matrilineal way of life is one where descent is traced through the female line, and where women inherit ancestral land and property. Based on the matrilineal lines, the society is divided into suku, or 'clans', which is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perut, or 'lineages'. Each suku is headed by an elder known as the Lembaga, while an elder known as the Buapak heads the perut. Unlike other Nusantaran communities, Minangkabau society is largely an egalitarian one with a clear division of economic roles. Both men and women are custodian of adat, the customary laws, with women managing the land and rights to the harvest while men hold public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leadership such as that of the Lembaga and Buapak.

Whereas the Baweanese social networks and community relationships are embodied in the institution of the communal 'ponthuk' or pondok, there exists two 'kelarasan' or branches within the Minangkabau adat system. The first, kelarasan Koto Piliang, is based on hier-

archy while the second, kelarasan Bodi Caniago, demonstrates a more egalitarian outlook. These two branches serve to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form the Minangkabau societal system. In addition, three community pillars known collectively as Tungku Tigo Sajarangan, safeguard and develop Minangkabau ceremonies, rituals and culture. They consist of the religious expert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elders occupying equal ranks. Community-related matters are expected to be resolved through consensus-building among the three groups.

Both ethnic communities value a governance-by-consensus approach is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and harmony. This cultural ideal is underscored by another time-honoured cultural practice of gotong royong (co-operative undertakings) where the entire community pitches in, both materially and morally to complete a task which is deemed desirable to promote congenial relations amongst members of the group. Such activities include preparations for a wedding (through rewang and kendarat duties), rite-of-passage such as the bersunat or berkhatan ceremonies (ritual circumcision) as well as funeral arrangements. Indeed, this particular trait has become so synonymous with the larger Malay community that Singaporean officials have come to adopt the term wholesale to refer to the desirability of cooperative effort on a national platform.

As Singapore further developed its ports in Kallang and the mouth of the Singapore River through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e relative close proximity of the various kampungs to the commercial hubs translated into daily interactions which were usually conducted in Malay, the regional lingua franca of the period. Many of the Nusantaran emigrants also began to marry across ethnic lines and adopt some of the cultural practices of their spouses. To the other inhabitants of the bustling port-city of Singapore, the Javanese, Baweanese, Bugis, Minangkabau, Balinese and Banjarese did not seem to be very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superficially at least. The shared religion of Islam which meant that many observed the dietary laws and modest dress reinforced the notion that these Nusantara communities were culturally more similar than different.

However, even as Islam serves as a common religious culture as well as a set of overarching moral values across many of the Nusantaran groups, each ethnic community maintained many of the cultural practices, material culture as well as performing arts unique to their respective region. Many of the elder Javanese, Baweanese, Minangkabau and Banjarese continue to converse in the regional tongue amongst themselves. The Minangkabau people speak a language called Baso Minangkabau which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Malay language. Their customs and traditions or adat are encoded in vast collections of oral literature in the forms of kaba (traditional stories), tambo (legends), pantun (quatrains) and pepatah-petitih (proverbs and sayings). Pidato (welcome speeches) are usually recited and exchanged at major social events, such as makan bajamba (communal feasts), while flowery pantun exchanges are virtually de riguer during merisik expeditions (when a suitor's representatives calls on a family to seek a maiden's hand in marriage) and weddings. This lively exchange of banter and pithy sayings is termed as jual beli (buy-sell), showcasing the Minangkabau love for oratory whilst alluding to the trading and entrepreneurial roots of many of its people.

In a similar fashion, the Baweanese are proud of their oral performance traditions. The Baweanese speak 'Bahsa Bawean' (or Bahasa Boyan),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a dialect of Madurese. However, the Baweanese in Singapore speak a slight variation, boyan selat, referencing their settled location along the Malay Straits. Interestingly, the Baweanese, more than any other Nusantaran group have also incorporated many Arabic/ Islamic elements into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al performances. Hadrah (hand drum processions) and kerchengan performances combine Baweanese storytelling, Muslim devotion, synchronised body movements and Middle-eastern styled beats and melodies. These musical performances are conducted both in the home usually during a keramaian (gathering) as well as part of a wedding or religious procession.

The economic role of Malay language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regional dialects

Bazaar Malay (Melayu pasar) and increasingly formalised Bahasa Melayu that was taught in national schools in Malaya then (and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oday) became the language of communication amongst these ethnic communities. Hence it is a lovely irony that in the 1960s, a popular Singapore 5-member band, The Swallows, scored a hit with their Baweanese-language record, 'Laaobe' (Changed). Originally printed as 'La-a-Obē' on their vinyl sleeve, the catchy 'pop yeh-yeh' song (in the vein of The Beatles' tunes), was first broadcast on the Singapore airwaves in 1966. The dynamic band, with its charismatic front man, Kassim Selamat (né Kassim Rahman, born 1934), became one of the popular acts in the mid-1960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e Swallows, who were signed by recording label EMI, were noteworthy for the amount of media attention they received from local entertainment magazines, television appearances and that 'Laaobe' was also well received as far afield as then-West Germany.

Album cover of the Swallows' famous hit 'La-A-Obe'. Courtesy of Mr Kassim Selamat.

In the same period, many Baweanese also made their mark as actors, performers and recording artistes, including the luminous Puan Sri Datin Amar Salmah binti Ismail (1922–1983) or better known by her stage name, Saloma. Sanisah Huri, Salim I, A Romzi and Jaafar O were very popular singers in the 1960s-70s of Baweanese ancestry. Till today, the refrains from 'Laaobe' remain synonymous with the Singapore-Malaysian Baweanese.

Unfortunately, very few of the current generations of Singapore Malays of Minangkabau, Baweanese, Javanese and other Nusantaran ancestries are conversant in their ethnic languages. Nonetheless a number of indigenous words and phrases remain in circulation and are used to supplement the Malay vocabulary which is deemed wanting at times to convey all the nuances of the word in the native language.

Discourses on 'Melayu'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formulating Malay identity

The preceding paragraphs have provided a glimpse into the history and rich cultural heritage of two sub-ethnic

groups that make up the intricate tapestry of what is considered the Singapore-Malay community. The article is by no means an attempt to 'fix' or pigeonhole the various ethnic communities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part of the alam Melayu (Malay world) into neat cultural and/or linguistic categories. The reason is especially because implicit in any study of Baweanese, Minangkabau, Javanese, Bugis, Banjarese Acehnese and Mandhailing ethnic community, is the question, who then is 'Malay'? Historian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ose who study the alam Melayu, including Anthony Reid, Leonard Andaya, Anthony Milner and Virginia M. Hooker have gone to great lengths to ascertain the origins of Melayu, a reference used as early as the 2nd century CE in Ptolemaic Egypt.[6]

Documentary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term 'Melayu'/'Malayu' has ancient origins though no one has been able to pin point the exact location of 'Malayu'. Chinese records from the 7th century make references to a specific kingdom north of Sivijaya while Marco Polo had identified as 'Malayur', an ancient kingdom on Sumatra around 1290.[7] Even Malay-language sources are vague about the location of the Malayu kingdom – the Sejarah Melayu refer to Malay kings and adat (culture) but the geography of Melayu are cited as a mythical Bukit Siguntang and small Sungei Malayu. Interestingly, the term 'Melayu' itself was not used to refer to the indigenes of Sumatra, Palembang or Jambi where current scholarship posits as where an ancient Malay kingdom stood. Rather, Chinese, Indian, Arab and European visitors to the archipelago referred to the area and locals as 'Jawa', 'Yava' or 'Jawi'.

In contrast, the term 'orang Melayu' gained currency in 16th century Melaka as an alternative reference to 'orang Melaka'. Arguably, in both the Sejarah Melayu and Hikayat Hang Tuah, the term 'anak Melayu' refers to the supporters of the Malay sultanate of Melaka.[8] Hence, when Melaka fell to the Portuguese in 1511, the erstwhile followers of the Malay sultanate left for other port states in the region. The diaspora who spoke Malay, who still identified with the 'Malay' cultural values and felt a sense of loyalty as the Sultan's people, saw themselves as 'Melayu' and would proclaim themselves as such. In that regard, the boundaries of what defined someone as 'Malay' were quite flexible and as much defined by other constituencies of each port city as it was by his or her own agency.

Ultimately, the manner in which Singapore-Malays of the various Nusantaran ancestries negotiate their diverse historical ethnic roots against a multiracial socio-political and yet ethnically homogenised within each overarching racial category, point to how ethnic particularities continue to matter even though none of the Javanese, Baweanese, Minangkabau and other sub-ethnics have little problem identifying themselves with the larger Singapore-Malay polity. The MHC is honoured to be part of the effort to celebrate the deep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Singapore-Malay community and looks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Javanese community in the next instalment of the Se-Nusantara series in 2016.

References

1. Timothy P. Barnard (ed.), Contesting Malayness: Malay Identity across Boundaries (NUS Press, Singapore, 2004)
2. Phyllis Ghim-Lian Chew,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of Early Identities in Singapore: From Colonialism to Nation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Exhibitions

1. Laaobe: Warisan dan Budaya Masyarakat Bawean di Singapura (Changing Times: Baweanese Heritage and Culture in Singapore) which ran between March and August 2014.
2. Marantau: Dima Bumi Dipijak, Di Sinan Langik Dijunjuang (Coast to Coast: Atlasing the Sky Wherever One Has Landed), which runs from 17 May to 13 September 2015.

Endnotes

[1] Regarded as a proto-political organisation which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other organisations of a similar nature up and down the Malay Peninsula

[2] This term has been adapted into modern parlance to refer to the Malay-Indonesian Archipelago. It is an old Javanese word comprising two root words: nusa (islands, homelands) and antara (between).

[3] It was re-registered in 1947, dropping 'Association' to remove the redundancy in its name.

[4] The MHC reopened in September 2012 with a revamped permanent exhibition focused on the site-specificity of the centre which is housed in the former istana (palace) of Sultan Hussein Shah and his descendants within historic Kampong Gelam. The core narrative presents Kampong Gelam as a port town during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foregrounding the circulation of goods, peoples and ideas within and without this island, leading to the key question raised in the Perintis (Pioneers) gallery of who the Malays are in Singapore. The aim here is not to reach for a conclusive answer but to encourage considerations of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Malay identity.

[5] The working model for each project is for the community partner to take ownership by developing the exhibition content (often a new experience for them) including garnering artefact loans and other contributions from the community while MHC lends support in terms of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resources. The community partner would also produce the accompanying programmes, which is typically the forte of these organisations and hence, the programme offerings are vibrant and exciting, and form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the entire project.

[6] Anthony Reid 'Understanding Melayu (Malay) as a Source of Diverse Modern Identities', in Timothy P. Barnard (ed.), Contesting Malayness: Malay Identity across Boundaries (NUS Press, 2004), p.3. Ptolemy included the toponym 'Melayu Kulon', meaning 'west Melayu' in Javanese on the west coast of his map of 'Golden Khersonese'

[7] Ibid.

[8] Ibid., pp.4-5.

(Written by Suhaili Osman, Asst Curator, Malay Heritage Centre)

20世纪初淡米尔家庭合照(G. R. Lambert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提供)

闪光灯下：旧照片中的新加坡印族史

原文 · 蓝丽娜 · 戈帕尔(Nalina Gopal)　翻译 · 李国樑

印度族是新加坡的第三大族群，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印度先民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不同地区，有各自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习俗。东南亚区域的印度族群来自数波的移民潮：殖民地前、殖民地时期、后殖民地时期。殖民地前，淡米尔纳德邦的雀替尔族商人早在14世纪已经来到马六甲，跟当地的马来女子通婚，并为印度洋各地的商贸作出贡献。不过真正持续性的移民潮是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成立之后(1786-1824)。印度人从马德拉斯(Madras, 金奈)、纳格伯蒂讷姆(Nagapattinam)、加尔各答(Calcutta)的港口出发，越过印度洋，来到海峡殖民地。

1819年1月，120名原属孟加拉步兵团的印度兵跟随莱佛士和法夸尔抵达新加坡。R.B.Krishnan所搜集的资料显示，当时来到新加坡的印度人有Sangara Chetty、Naraina Pillay、Mohamed Hassan 和 Mohamed Lebar。1822年，法夸尔委任他们为理事，主管印度人的事务。[1]

档案照片为我们提供可靠的线索，得以追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来到新加坡的印度移民。G. R. Lambert是当时本地著名的相馆，为1867年至1900年代初的新加坡摄下大量珍贵的

图片，[2]保存着两个世纪前的新加坡的地貌和多元种族的景观，让我们重新探索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不同族群以及时尚和习俗。如John Falconer所说：“这些照片加强了东方人的浪漫形象与各族群的神秘感，其中不乏叫人咂舌的镜头。”[3]

这些图片都是为欧洲人精心设计的。在印度，当地画家早已画下这些人文景观。17至19世纪间，印度有许多绘画学校，将印度原住民的肖像、作业、习俗和服饰通过画笔记载下来，满足洋人强烈的好奇心。

本文通过私人收藏家与国家博物馆收藏的G. R. Lambert的照片，追溯本地印度族群的历史。

早期定居的先民

就如Siddique 和 Puru Shotam (1982)所说，[4] 印度人定居的地方与所从事的职业是相互影响的。早期的企业家在新加坡河岸活动，于是印度人居住在克罗士街(Cross Street)、马吉街(Market Street)、马六甲街(Malacca Street)、莱佛士坊(Raffles Place)等地。这些地方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印度先民在这里生活的蛛丝马迹，朱烈街(Chulia Street)是唯一的标记。小印度则保留了历史氛围。[5]

19世纪初，来自印度的客商抵达新加坡，朱烈人是其中一个最早抵岸的族群。朱烈人是来自乌木海岸的淡米尔回教徒，他们带来的商品五花八门，有纺织品、珠宝、牛只、皮革、烟草、锡制品和槟榔。那些拥有船只和货船的朱烈人也搞船运。除了淡米尔回教徒，其他淡米尔族群、古吉拉特、马拉巴尔和帕西商人很快地来到海峡殖民地定居，并将新加坡河岸转型为贸易站。这些商人来往于其他英国殖民地，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建立庞大的商业网络。

移民的轮廓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新加坡的印度人到相馆拍照，身上穿着传统服饰，但采用欧洲风格的家具作为背景。这类照片将早期移民的生活静态化，无法看出他们的居住地点和职业。不过，这些影像至少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移民的穿着、族群构成和社会背景。

锡克警察(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提供)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印度移民以男性居多，那个年代缺乏举家移居海外的动力。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张20世纪初的淡米尔家庭合照，一家大小穿戴着传统服装和珠宝。

罪犯劳工

1825至1873年间，新加坡是个惩罚印度罪犯的地方。在那50年间，有1万5000至2万名印度监犯被遣送到新加坡当苦力，建设了好些还保留着的建筑地标如总统府、白礁灯塔、莱佛士灯塔、汤申路和武吉知马路。一位名叫Baawajee Rajaram的绘图员，甚至在服刑期间为兴建圣安德烈教堂撰写计划书，服刑期满后成为一名私人建筑师。

殖民地政府在1873年取消囚犯劳工政策。一些前囚犯经营小本生意，买土地建房屋。有些人在公共工程局工作，熟练的工匠担任管工的职务。一些前囚犯当水管工、裁缝、印刷工人、鞋匠、切割机员等，有些则成为食物承包商或洗衣店老板。

另一个印度先民的特色是兴建宗教庙宇，1820年代落成的马里安曼庙和詹美回教堂都是印度人对新加坡早期建筑的贡献。

安全部队

1881年，新加坡成立了锡克族警察特遣队，第一支部队来自旁遮普(1881年3月26日)。锡克警察分布在马来亚各地，维持当地的法律与秩序。部队于1945年解散。

此外，丹戎巴葛船坞公司维持了一支警察部队，成员包括锡克人。1930年代，三巴旺海军基地和实里达空军基地都由锡克警察看管。锡克人也从事保安和看守员工作。锡克人是英国派来海峡殖民地的印度兵成员之一。印度独立后，辜加兵团取代印度兵的任务。

19世纪中叶，受英文教育的印

雀替尔人(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提供)

流动表演剧团(G. R. Lambert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提供)

度和锡兰人受聘为殖民地辅政大臣办公室的工程师、测量师、文员和翻译员。印度人也担任火车站管理员、铁路监工、通讯工程、医疗人员和学校教师。20世纪中叶，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作家、记者从印度来到海峡殖民地。

商业社群

18与19世纪的欧洲经济腾飞，带动东南亚的商贸。雀替尔人从纳德邦移居到缅甸、越南、柬埔寨和马来亚。新加坡河是新加坡的货运中心，货仓与贸易商行林立。1820年代，雀替尔人成为新加坡最早的民间放贷者，在新加坡河附近的朱烈街、马吉街和马六甲街经营放贷业务。在现代银行与金融体系发展起来前，雀替尔人是为殖民地各阶层人士提供中长期借贷的主要贷款商，客户包括欧洲种植园主、华人矿工和商人、马来皇室和农民，印度商人和承包商等。

雀替尔人也是当年主要的地主。他们将货仓改建，店屋的底层设立借贷服务，楼上则装置成多个床位的宿舍。每三年，他们回去家乡探望亲人。到了20世纪初，有些雀替尔人将家人接过来，在海峡殖民地定居。

20世纪初，新马的锡克族也提供个人借贷服务。锡克人跟雀替尔人不一样，他们移民到本地原本从事保安工作。锡克人在市区里当看守员兼借贷人，贷款给劳工、书记和店员，贷款数额低但利息高。他们成立了锡克借贷人和商人协会。

音乐家，舞蹈家和艺人

20世纪初，新加坡已经有印度舞蹈、音乐和舞台演出。淡米尔与帕西的流动表演剧团从印度来到海峡殖民地。新加坡的淡米尔剧团于1930年代成立，表演历史剧。到了1940年代，演出内容逐渐改变，以社会与时事为题材。

印度人乐团如Ramakrishna Sangeetha Sabha成立于1939年，由男女乐师组成。来自锡兰的淡米尔族群成立了纯女子乐团，二战前在新加坡及海外公演。新加坡印度人艺术学会成立于1949年，是最早主办本地与外地艺术表演的团体之一。

印度人在马来电影的发展史上贡献杰出，直至上世纪中叶，他们担任过马来电影导演，也经营过电影发行业务。当时的两大影业巨头邵氏和国泰克里斯聘请印度片导演如B. S. Rajhans、 P. L. Kapur、B. N. Rao、 Phani Majhumdar、L. Krishnan等人拍摄马来影片。印度人拥有并经营戏院，钻石戏院的主人是K. M. Oli，首都戏院由Namazies管理。Gian Singh & Co是早期的影片发行商。

19世纪末期，印度流动商人开始涌现。实龙岗路及其周边的街道有许多传统业者，如洗衣店、金铺、珠宝商、铁匠、香料研磨和送奶工等，其中不乏流动小贩、乐手、杂技家和舞蹈演员。

实龙岗路的印度金铺(新加坡档案馆提供)

桥南路的马里安曼兴都庙和詹美回教堂(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提供)

纳歌达殿，现为印度回教文化遗产中心(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提供)

泰国甲米有一面刻着婆罗米文的石碑，显示了淡米尔金匠可能早在公元3或4世纪已经移居泰国南部，这或许是印度金匠大规模来到东南亚的最早证据。纳德邦的金匠在1940年代来到新加坡，住在实龙岗路的昏暗的小房间里。金匠根据传统与宗教的需求打造金饰。在一些传统的场合如穿耳洞，金匠都会在场。当机械逐渐取代人工作业时，印度金匠跟着消失，被印度与华族首饰商取代。

妇女

过去的新加坡印度族群，男人一路来都处于领导地位，女人则没有什么记载。殖民地文件显示，19世纪中叶来到本地的女人都是囚犯和种植园工。19世纪末，海峡殖民地的印度商人和移民开始将家眷接过来。1920年代，入境的印度妇女约占百分之三十，奠定日后印度侨民落地生根和组织家庭的基础。

印度女子主要是家庭主妇，倾向于社区服务与手工艺品制作。她们充分利用时间，学习针线活、绘画、音乐和舞蹈。有些印度妇女融入本地的土生文化，不论是衣着、语言或美食都入乡随俗。

直至1990年代，女相师替人算命，供应商销售家庭用品、农产品和自制产品等都是小印度司空见惯的场景。上世纪中叶，来自纳德邦的女回教徒也是闻名的香料商贩。E. A. Ponnammal女士(1898-1973)是一名淡米尔妇女，早在上世纪初已经在本地经营放贷业务，为自己的族群提供资金，并受到其他借贷商的认可。

随着时代的进步，提升妇女地位的意识日渐普遍。1931年，印度与锡兰女子俱乐部成立，支援本地妇女与孩童的教育、社会与经济，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195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新加坡期间，印度与锡兰女子俱乐部跟妇女联盟合并，成立卡马拉俱乐部(Kamala Club)，一直持续至今。

文化习俗

宗教是印度族群文化的根源，印度移民将他们家乡的宗教信仰带到新加坡，兴建庙宇让族人的心灵有所依靠，同时有个聚集的场所。桥南路的马里安曼庙(1827)和詹美回教堂(1830-1835)、直落亚逸街的纳宫神社(1828-1830)都是历史悠久的庙宇。如Sunil Amrith所说：“历史学者通过古老的建筑与文化，找到珍贵的移民记录。这些古老的记载遍布亚洲，为我们提供追寻移民足迹的线路。”[6]

马里安曼庙根据南印度庙宇的建筑风格建成，纳宫神社则完全复制了印度的纳宫神社。当年的旅客都会到神社祈求一路平安。今天，我们还可以在神社内看到一套印度纳宫神社的复制文件。在守护神的纪念日当天，可以观看跟印度纳宫神社同时进行的升旗仪式。

殖民地年代的旧照片反映了“复杂的印度移民史在各族群间缔造了多元化、充满动感的异地风情”。[7] 在寻根的路上，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宗教、习俗、穿着和食物料理分辨来自印度次大陆不同地区的族群。无可否认的，新加坡的印度人就跟东南亚各地的印度人一样，在进取的过程中融入当地社会，吸收当地的文化与习俗。过去与现在的移民经验促进了印度族群的凝聚力，这些共同的体验进一步加强了本地与世界各地的印度社群的联系。

(印度文化中心研究员)

注释:

[1] Krishnan, R.B, Indians in Malaya, A Pageant of Greater India: Malayan Publishers, 1936.

[2] Liu, Gretchen, Archival Collections of Asia Photographs in Singapore’s National Archives, National Library and National Museum; Volume 4, Issue 1: Archives, Fall 2013

[3] John Falconer, A Vision of the Past: A History of Early Photography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The Photographs of G.R.Lambert & Co., 1880-1910: Times Editions, 1987

[4] Sharon Siddique and Nirmala Puru Shotam, Singapore’s Little Ind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2.

[5] Nalina Gopal, Encounters with the Public Archives & Collective Memory: Researching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Singapore, http://library.ifla.org/id/eprint/249

[6] Sunil Amrith, Migration and Modern Diaspora in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7] Brij V. Lal, Peter Reeves, Rajesh Rai Encyclopaedia of Indian Diaspora: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2006

Glimpses: Tracing the history of Indians in Singapore through Archival Photographs

Nalina Gopal, Curator, Indian Heritage Centre

Indians form the third largest ethnic group in Singapore. Accounting for over 9% of the population, they trace their roots to various regions and religious groups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The presence of Indians in the region is the result of several waves of migration, pre-colonial,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For instance, prior to European colonisation, Chitty traders from Tamil Nadu had already settled in Malacca in the 14th century, married local Malay women and contributed to the Indian Ocean trade. But it i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of Penang, Malacca and Singapore (1786 - 1824) that a steady influx of Indians from the subcontinent began – primarily via the ports of Madras, Nagapattinam and Calcutta. In January 1819, 120 sepoys landed in Singapore, together with Sir Stamford Raffles and William Farquhar. They belonged to the Bengal Native Infantry and were accompanied by a bazaar contingent. R.B.Krishnan notes that among the earliest Indian migrants in Singapore were Sangara Chetty, Naraina Pillay, Mohamed Hassan and Mohamed Lebar; they were appointed as counsels to oversee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Indians by William Farquahar in 1822.[1]

Archival photographs offer glimpses of Indian migrants in Singapore from the late 19th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firm of G. R. Lambert & Co operated from 1867 until the early 1900s and produced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pictorial record of Singapore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2] These included scenes of Singapore and its multi-racial residents. These photographs reiterated stereotypical Western visions of the East by capturing racial types, costumes and customs. As John Falconer puts it 'In these photographs a number of attitudes coexisted, among them a reinforcement of the romantic image of the East peopled by the mysterious races and spiced with danger'.[3] They were images choreographed largely for the consumption of a European clientele.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such imagery was already being produced by local artists. Between the 17th -19th centuries, a unique school of painting developed in India at many centres. Portraits of Indian natives, taken by officers of the Company or later by Indian artists known collectively as Company School Paintings served to quench the curiosity of Europeans on native subjects. They included trade studies and documented customs as well as costumes.

This essay traces the history of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Singapore through select photographs from private collections as well as the G.R.Lambert & Co studio (currently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Early Settlement

Early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and activity centred on the river front; occupation and settlement intertwined as also posited by Siddique and Puru Shotam (1982) that settlement and occupational patterns of Indians in Singapore evolved together. However, much of the early settled areas such as Cross Street, Market Street, Malacca Street, Raffles Place, etc have altered in character bearing little visible evidence of Indian occupation; the name in some cases such as Chulia Street being the only marker. In this context, Little India retains much of its historic atmosphere.

Early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and activity in Singapore centred on the river front; occupation and settlement intertwined, as observed by Siddique and Puru Shotam (1982).[4] That is, the settlement and occupational patterns of migrants in Singapore evolved together. However, many of the early areas settled from India, such as Cross Street, Market Street, Malacca Street, Raffles Place, have altered in character and now bear little visible evidence of former Indian business occupations; the name in some cases, such as Chulia Street, being the only marker. In this context, Little India does retain much of its historic atmosphere of settlement along the lines of occupation.[5]

Traders and merchants arrived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early 19th century; one of the earliest groups to arrive was the Tamil Muslims (or Chulias) from the Coromandel Coast. They traded in a wide range of commodities including textiles, gems, cattle, leather, tobacco, tin and areca nuts. They were also involved in water transport as several of them owned ships and cargo boats. In addition to the Tamil Muslims, other Tamil (Vellalar, Mudaliar, etc), Gujarati, Malabari and Parsi traders soon settled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ransformed the Singapore River banks into a trading hub. Travelling between and trading with other colonial settlements, these traders and merchants were instrumental in establishing networks within and beyond Asia.

Migrant Profiles

Portraits of Indians in Singapore taken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show them in studio settings with European style furniture and backdrops, dressed in traditional costumes. De-contextualised from their place of dwelling or occupation, these photographs portray early migrants in a still, life-less fashion. However, these portraits serve as a visual record of the mode of dress, the ethnic composition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migrants of the time. In the above photograph for instance, an archetypal Tamil migrant family is seen in traditional garb and jewellery. The majority of Indian immigrants to Singapore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ill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ere male, with the impetus for migration of families only growing later. The following explores trade study photographs and elaborates on the the history of early Indian settlers in Singapore.

Convict Builders

Singapore was a penal settlement from 1825 – 1873 and during this period, nearly 15,000 – 20,000 prisoners were sent here as convict labour. These labourers built some of Singapore's earliest architectural landmarks like the

Istana, Horseburgh Lighthouse, Raffles Lighthouse etc. as well as roads such as Thomson and Bukit Timah roads. A convict draughtsman, Baawajee Rajaram, even prepared plans for the St.Andrew's Cathedral and went on to pursue private architectural practice upon completion of his sentence.

With the dispersal of the penal settlement in 1873, several former prisoners started small businesses, and bought land and property. A number of them sought employment with the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PWD) and the skilled artisans amongst them were appointed as overseers for the PWD. Some former prisoners also found work as plumbers, tailors, printers, shoemakers, stonecutters, etc. while others became food vendors or set up sundry shops.

The settlement pattern of early Indians in Singapore was also characteris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structures which catered to their religious needs. Built in the 1820s, temples such as the Sri Mariamman Temple and the Jamae Chulia are examples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Indians to Singapore's early architecture.

Security Forces

In 1881, the Sikh Police Contingent (SPC) was established in Singapore, with the first contingent arriving from Punjab on 26 March 1881. The SPC were stationed all over Malaya to assist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law and order; follow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SPC was disbanded in 1945. In addition to the SPC, the Tanjong Pagar Dock Company maintained a Dock Police Force composed of Sikh recruits. By the 1930s, a Sikh police force emerged at the naval base in Sembawang and another one at the Royal Air Force airbase in Seletar. The Sikhs also found employment as security guards (jagas) and watchmen for private employers. The Sikhs were also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British Indian forces posted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were in charge of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they were replaced by the Gurkha contingent in Singapore on Indian independence.

English educated Indians and Ceylonese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subcontinent by the mid - 19th century; to be engaged as engineers, surveyors, clerical officers and interpreters in the Colonial Secretary's office as railway station masters, supervisors for rail, road and telecommunication works as well as health workers and school teachers. By the mid-20th century, medical and legal practitioners writers and journalists from the subcontinent also began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Merchant Communities

During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when European trade flourished, another community from Tamil Nadu of Nattukottai Nagarathar Chettiars migrated to Southeast Asia including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Burma (Myanmar), Indo-China (Vietnam), Kampuchea (Cambodia), and Malaya (Malaysia). The earliest presence of Indian moneylenders in Singapore can be traced to the 1820s. The Chettiars established their financial operations along Chulia, Market and Malacca Streets along the Singapore River where cargo landed and many warehouses and trading firms were located. Traditionally a trading community, the role of the Chettiars as private financiers grew widespread in the European colonies. The Chettiars were also principal landowners and functioned as the main source of medium and long term credit until the advent of modern banks and the growth of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The Chettiars operated out of kittangis (Tamil: warehouse) set up in the ground floor of shop houses; with dormitory style lodgings were organised in the upper floors. Once in three years, they travelled back to Chettinad to visit their families; by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re are instances of Chettiars settling with their families in the Straits. Their clientele included European proprietary planters, Chinese miners and businessmen, Malay royalty and farmers, Indian traders and contractors, among others.

Personal financing was also extended by Sikh moneylender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Sikhs unlike the Chettiars migrated as security personnel. They operated in urban centres in Singapore as watchmen cum money lenders, who extended small loans to labourers, clerks and small shopkeepers at premium interest rates. A Sikh Money Lenders and Businessmen's Association was also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usicians, Dancers and Entertainers

Indian dance, music and theatre have been performed in Singapore sinc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f not earlier). By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ravelling drama companies from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were performing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se included early Tamil and Parsi theatre companies. Tamil theatre in Singapore dates from the 1930s and started off with historical plays before shifting their focus to social issues and current affairs during the 1940s.

Orchestras such as the Ramakrishna Sangeetha Sabha were established as early as 1939 and included both male and female musicians. An all-women's orchestra was also established by members of Ceylon Tamil community, and performed at public venues in and around Singapore in the pre-World War II years. The Indian Fine Arts Society (later renamed Singapore Indian Fine Arts Society), established in 1949, was among the early organisers of performances by travelling as well as local troupes and artistes.

Indians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 cinema by directing and distributing Malay films until the mid-20th century. Production houses such as Shaw and Cathay-Keris engaged Indian film directors such as B. S. Rajhans, P. L. Kapur, B. N. Rao, Phani Majhumdar, L. Krishnan etc. Early Indian owned and managed theatres included Diamond Theatre owned by K. M. Oli Mohamed and Capitol Theatre managed by the Namazies while early Indian film distributors included Gian Singh & Co.

Indian itinerant tradesmen also operated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Serangoon Road and its surrounding streets housed traditional tradesmen such as launderers (dhobie), goldsmiths and jewellers, black smiths, spice grinders and milkmen etc. as well as itinerant food sellers, musicians, acrobats and dancers.

A 3rd or 4th century Tamil Brahmi inscription found in Krabi, Thailand hints at th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of a Tamil goldsmith in southern Thailand. Perhaps this could be earliest evidence

of the influx of Indian goldsmiths to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Pathars or acharis, the goldsmiths from Tamil Nadu began entering Singapore in the 1940s. Housed in little dark back rooms along Serangoon Road and its by-lanes, the goldsmiths soldered and shaped gold and ornaments according to tradition and religious requirements. The goldsmith was also often present at traditional functions such as the ear-piercing or kadu-kuthal being just one of them. With machine made jewellery slowly overtaking the meticulous handiwork, the Indian goldsmiths were replaced by retailers, both Indian and Chinese.

Women

The narrative of Singapore's Indian community is generally male dominated; chronicles of women are mostly obscure. By the late 19th century, Indian traders and independent migrants to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were joined by their families. Colonial documents do record women as penal inmates and plantation labourers during the mid-19th century. Indian women accounted for 30% of the arrivals by the 1920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permanent settlement and family structures.

Women were essentially homemakers, inclined towards community work, arts and crafts. They learnt needlework, painting, music, and dance and employed their time creatively. Some of these women were also strongly influenced in their style of dress, language and cuisine by local Peranakan cultures. Itinerant women fortune tellers, vendors selling domestic wares, farm and homemade products were a common sight around Serangoon road area until the 1990s; Kadayanallur Muslim women, for instance were renowned spice seller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Yet another example is Madam E. A. Ponnammal (1898- 1973) an early was a Tamil lady who operated a money lending busines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Singapore. She is accredited with funding businessmen from her community, the Agamudayar Davar, in Singapore.

Modernisation and widespread increase in awareness about women's rights resulted in the formation of women's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The Indian and Ceylonese Ladies Club, established in 1931, was an early organised effort to support women and children i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social and economic upliftment and provide them equal opportunity. It was later renamed Lotus Club to accept membership from other ethnic groups. Subsequently, in 1950 during the visit of the Indian Prime Minister, Jawaharlal Nehru, the Lotus Club and another women's organisation the Ladies Union were merged to form the Kamala Club, which continues to this day.

Cultural Practice

Religion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community's root culture that migrants brought with them to Singapore.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ir religious expression was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s of worship; these also served as places of gathering for the community. By the mid-19th century, significant shrines such as the Sri Mariamman Temple (1827) and Jamae Chulia (1830 - 35) at South Bridge Road, the Nagore Dargah (1828 - 30) at Telok Ayer Street, among others had been erected. As explained by Sunil Amrith 'historians find a valuable archive of migration in the landscape, in architecture and in material culture. Everywhere scattered across Asia, are material traces of migration' [6]. While the Mariamman temple was built following south Indian parameters for temple architecture, the Nagore Dargah was constructed as a replica of the Nagore Dargah in India. Dedicated to the patron saint, Shahal Hameed, the Dargah in India would be visited by travellers, praying for safe passage. An emulation of the proceedings held at the Dargah in India can be seen in Singapore even today; the kodi yetram or flag hoisting festival held annually at the Dargah coincides with the festivities in India, marking the anniversary of the patron saint.

Archival photographs from colonial Singapore reflect the 'complex history of emigration has produced a diverse and dynamic religious tapestry in the Indian diaspora'.[7] Indians in Singapore trace their roots to various regions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This diverse group is distinguished by its varied linguistic, religious and other socio-cultural practices such as dress, cuisine, etc. Indians in Singapore, like Indians in other parts of Southeast Asia, have also adapted and evolved, absorbing traits from local cultures. Past and present migrant experiences make this community cohesive; its connections with the larger global Indian diaspora strengthened by such shared experiences.

Endnotes

[1] Krishnan, R.B, Indians in Malaya, A Pageant of Greater India: Malayan Publishers, 1936.

[2] Liu, Gretchen, Archival Collections of Asia Photographs in Singapore's National Archives, National Library and National Museum; Volume 4, Issue 1: Archives, Fall 2013

[3] John Falconer, A Vision of the Past: A History of Early Photography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The Photographs of G.R.Lambert & Co., 1880-1910: Times Editions, 1987

[4] Sharon Siddique and Nirmala Puru Shotam, Singapore's Little Ind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2.

[5] Nalina Gopal, Encounters with the Public Archives & Collective Memory: Researching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Singapore, http://library.ifla.org/id/eprint/249

[6] Sunil Amrith, Migration and Modern Diaspora in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7] Brij V. Lal, Peter Reeves, Rajesh RaiEncyclopaedia of Indian Diaspora: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2006

(Written by Nalina Gopal, Curator, Indian Heritage Centre)

多重定义的社群：欧亚族对新加坡的贡献

原文 · 安东尼奥 · 拉帕(Antonio L Rappa)　翻译 · 李国樑

引言

SG50标志着新加坡独立50周年，也是新加坡人民为所取得的成就而主办的一系列庆祝活动。对本地的欧亚社群(Eurasian)而言，SG50同时具备了纪念欧亚人对新加坡的认同与努力建国的特殊含义。欧亚族虽然属于少数族群，但在过去50年的国家建设中，欧亚人的显著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一般书籍通过故事、诗歌、照片与小说等形式来记载欧亚人的历史，有些人则刻意丑化欧亚人，将他们描绘成傻愣愣的漫画人物。本文则以半学术性的形式来叙述这段事迹。[1]

欧亚人曾经联合反对林宝音将欧亚人塑造成“查理好时光”(good time Charlie)那种好吃懒做的刻板形象。林宝音将所有欧亚族男子形象化，跟事实完全不符。虽然林宝音未必有存心破坏欧亚人的形象的意图，但她这种丑化欧亚人的做法只会对少数族群造成不必要的情感伤害。幸好有关当局明理，将这本书下架。“查理好时光”事件说明了欧亚人在面对无理的攻击时，会群策群力，迅速采取行动。

欧亚人主要使用英文，但在葡萄牙称雄的中世纪，欧亚人曾经使用葡语超过180年。葡萄牙曾经打造了一群对里斯本忠心耿耿的混血儿。[2] 葡萄牙在西非、苏伊士沿岸、果阿推行过此政策，后来也在马六甲和澳门依法炮制。

欧亚裔年轻一代（欧亚人协会供图）

何谓欧亚人是个首要的问题。谁首先为“欧亚人”下定义？“欧亚人”这个名词来自何方？根据我的研究结果，[3] 欧亚人这个词汇最先出现在19世纪中叶，它是由一名在印度工作的殖民地官员发明的。

那时候，印度是英国的“皇冠上的宝石”，英国的国王也是印度的皇帝。20世纪殖民地文化告一段落后，众多学者明确地叙述了当年英国掌控帝国版图的方式。[4] 英国统治各个殖民地的做法不一，其中一个手法称为“民族枚举”，通过人的肤色来分类。英国人自认为是最高级的人种，他们的世界只有黑与白，人也是一样，只有掌权的白人和没有权利的非白人。由于白人特别优异，因此，“殖民地的一个白人士兵可以统领一百名非白人”。[5] 如果白人老了、病了、快要死了，他们就会远离群众，不让别的种族看到白人脆弱的一面。

白人鄙视亚洲人与非白人，认为他们连保护自己的女人的本事都没有，因此亚裔女子成为白人的附属品。直至今日，还是有人认为白人和欧亚男子高人一等，能够轻易获得亚裔女子的垂青。

一旦白人和亚裔女子结婚，他们的后代的身份就混淆了。他们的后代非黑非白、非土著、非印度人、非华人、非马来人，于是一名聪明的官员发明了“欧亚人”这个词汇。有趣的是，没有人知道华人、印度人、欧洲人、马来人的名称的由来，我们却知道欧亚人这个名称的来源。

到了19世纪末，“欧亚人”在海峡殖民地的文件上已经相当普遍。至于在果阿和印度的其他地方，欧亚人这个名词则用英印(Anglo-Indian)和英华(Anglo-Chinese)来取代。

何谓欧亚人？

新加坡欧亚人协会的章程和出版刊物指出：“欧亚人是欧洲人和亚洲人结合后生下来的后代。我们是活生生的见证者，见证了16至18世纪间，第一批跟亚裔通婚的欧洲人的后代，在这块土地上经历了葡萄牙、荷兰、英国统治的三个殖民地时代。虽然我们的血统源自多代以前的先民，但可以肯定，我们是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族群。”

新加坡欧亚人协会进一步为欧亚人提供多重定义：

欧洲人与亚洲人结婚后所繁育的后代。[6]

亚洲人，但体内有欧洲人的血统与文化传承。[7]

“欧亚人”可能源自1849年的海峡殖民地记录，当时的人口普查首次涵盖少数族群。在此之前，人口普查是以区域性来划分的：原基督教徒(包括马来半岛的葡萄牙——欧亚人、克里斯坦人kristang)，英印人(包括英国-印度人、葡萄牙-印度人、锡兰人、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8]

由此可见何谓欧亚人的定义相当广泛，新加坡欧亚人协会的章程和刊物是最正统的来源。

由于时代与文化的差异，“婚姻关系”、“原基督教徒”与“英印人”都不能以当今的标准来解读。就以“婚姻关系”与“原基督教徒”来说，当时本地有许多天主教徒和回教徒，但不是每个教徒都奉行婚姻制度。至于“英印人”，它的涵盖面太广，变得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学术界人士都不采用。

回答“何谓欧亚人”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最多只能以“具有争议性的社群”来解答。欧亚族在他们的祖先的土地上生活，竟然必须以“争议性的社群”相称，原因有三：

(1)欧亚人并没有单一的定义，也没有人能够指出欧亚人大致的形象特点。观察一个人的外表与行为表现，只能作出肤浅的定论，而无法表述这个族群深厚的文化内涵。

(2)虽然新加坡将欧亚族列为四大种族之一，但是人们对欧亚社群的定义充满疑惑与争议。这些争议主要来自其他少数族群，或许他们出于自私的心态，又或许这些族群认为他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利用欧亚族来作为谈判的筹码，要求政府以同理心来接受他们。

过去负责欧亚人事务的杨荣文部长(如今是世俗的印度大学的校长)是一名深受爱戴的华族天主教徒，他跟欧亚社群关系密切；现在的负责人易华仁部长则是娶了华族女子为妻的印度人。内阁没有欧亚裔部长。实际上，内阁更需要欧亚裔代表。不过，内阁必须为全体新加坡人民谋福利，而不单只是少数族群。

自独立以来，欧亚人对国家作出超凡的贡献，甚至远远超越了17世纪的成就。现在，少数群体声势渐大，在教育、住屋与婚姻方面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越来越多。

自助、助人

1919年，新加坡欧亚人协会在政府支援下成立。人民行动党政府以欧亚人协会为模式，在1980年代成立了华社自助理事会、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新加坡印度人发展协会。

欧亚人协会是新加坡第一个，也是硕果仅存的自助性的欧亚人组织。欧亚人协会是新加坡最古老，也是会员人数最少的自助组织，但对社会的贡献良多。

传统上，各族群都设立各自的组织来照顾自己人，例如华人的福建会馆与客家会馆，马来人的伊斯兰教学校。欧亚人协会的大门永远为所有需要协助的欧亚人开放。

Bryan Davenport担任新加坡欧亚人协会会长期间，曾经接受过专访。Davenport说，他跟前会长Timothy De Souza走在同一阵线，鼎力支持将欧亚人协会转型为公益性质机构(IPC)，使协会获得政府一元对一元的筹款赞助。

在新加坡板球俱乐部接受访问时，Davenport自豪地宣称，欧亚人协会秉持着一贯的民主精神，没有肤色的分野。他和家人来自锡兰和荷兰的小镇，但没有人干涉他参选会长。[9] Davenport指出，过去的欧亚人多数从事书记、教师和公务员等职业，也有不少人在娱乐与传媒业谋生，成为出色的歌手、唱片骑师、广播员、电视演员等。

Davenport从我的姓氏中发现我原籍西西里，甚至语带双关，说早就知道我是一名“教父”(a don)。的确，当时我在国大任教乃不争之实。

那些在公开场合或私底下批评Davenport的欧亚人都一致同意，Davenport格外慷慨大方。他是一名船业巨子，将大部分财富捐赠给欧亚社群和其他本地人，但并没有要求任何回报。

欧亚人协会2014-2016届管委会成员（欧亚人协会供图）

马口：欧亚人的集中营

多方资料记述了马口集中营的悲惨故事。马口是欧亚人唯一的集中营，有些人以为这个集中营设在柔佛，其实不然，它位于森美兰。森美兰的马口镇有个火车站，从丹戎巴葛火车站搭上列车，约8小时15分后方可抵达这个小镇。集中营距离马口镇约4.2公里，集中营所在的小山区也叫马口。[10]

有些评论家说，日本人将马口开发成一个自给自足的乡村，让欧亚人居住。实际上，马口是个临时搭建，安顿3400名欧亚人的荒芜之地。筱崎护这位日治时期的福利官员的原意是为了缓解新加坡粮食短缺的问题，决定将欧亚人徙置该处。日本人称马口为富士村，[11] 但欧亚人并不喜欢这个富士村。富士村一片荒凉，土地规划、开垦建设都必须从零开始。更糟糕的是，痢疾、疟疾等传染病很快的蔓延开来，掠夺了多条人命，成为欧亚人的死亡陷阱。

1945年，至少2400名欧亚人被逼乘火车，然后走路到马口，许多老人和体弱人士在途中逝世。有些走得慢，取笑日本人或边走边聊天的，都受尽日本秘密警察的折磨。[13] 这是因为跟日军的言语不通，使到日军不相信他们。对一些欧亚人来说，日军走路的姿势和语言都很滑稽，使他们忍俊不禁。[14]

有些新加坡的历史学家写道，欧亚人选择举家搬迁至马口，这个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没有人愿意去集中营。实际上，日本人不需要像纳粹军对付数百万犹太人那样来对待欧亚人，可是，欧亚人偏偏被当成犹太人般看待。虽然欧亚人尽量避免到马口这个荒山野岭，但就如犹太人一样，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被逼走到马口。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乘车，至少50人在艰苦的长途跋涉中死去。[12] 人们都认为犹太人的命运是悲惨的，却错误地以为欧亚人的日子好过多了，实际上马口集中营根本不适宜居住，整个徙置计划惨淡收场。

前往马口途中死去的欧亚人跟日战期间罹难的许多人士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数以千计的华人和白人士兵死在桂河桥上，还有许多澳洲军、英军、纽西兰军和少数美军在樟宜监狱中不幸往生。约100名加入新加坡志愿军团(D连)的欧亚人，据说不是饱受日军折磨就是被枪杀。[15]

关于在马来亚抗日的联军，殖民地的记录专注于来自英国、印度和其他欧洲地区的军人，却忽略了参军的欧亚人。1943-1944年间，这些欧亚军人的家属被逼放弃新加坡的一切，走到马口镇，再续程到马口集中营。那些居住在加东或市区的欧亚人则比较幸运，避开了前往马口的厄运。

被派到马口的主教葬身何处仍然是个谜。有些人相信主教的遗体已经被运回新加坡安葬，但我们找不到他的墓地。马六甲坟场、蔡厝港基督教坟场、消失的比达达利坟场都完善地保存着欧亚往生者的记录，但没有主教的名字。

福康宁山的城墙边有一列欧亚人墓碑，他们都是英国人的后代。埋葬在马六甲圣保罗教堂的墓碑下的先民则带着荷兰人血统。从日军在吉兰丹登陆那一刻起，英军便尝试炸毁马来亚的所有设施，包括著名的传教士圣芳济的坟墓。虽然如此，这些废墟还是有迹可寻。二战期间的欧亚人多数是天主教徒，但令人深感意外的是，马口找不到一点宗教建筑或医疗设施的蛛丝马迹。

日治时期，有一位备受尊崇的俘虏Charles Paglar医生。一名70多岁的欧亚人分享了Paglar的趣事。Paglar是个出了名的大胖子，战前他为穷人施医赠药，提供免费食物。有人猜测Paglar暗地里勾结日本秘密警察，受到特别的待遇，日本人给他食物、住宿甚至香蕉钞。[16] 当其他欧亚人饿得瘦骨嶙峋的时候，他还像过去那样珠圆肉嫩。后来医学证明，一个人长得有多丰满主要来自遗传基因而不是食物。

很多人相信Paglar跟日本人合作，通过他的专业来获取许多利益。战争期间，不论是马来人、印度人、欧亚人或是欧洲人，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必须为了生存而自保护，不值得大惊小怪。

战后的欧亚人

战后欧亚人离开新加坡这个说法也是不恰当的。没人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离开？为何选择离开？实际上，许多欧亚人陆续回来，见证了新加坡发展的奇迹。其他人则选择融入澳洲、美国和加拿大的白人圈子中，失去他们的民族与文化认同，情形就跟改信其他宗教的欧亚族人一样。

战后的新加坡，欧亚人在建国历程上扮演过不同的角色。许多欧亚人是民主派人士与资本家，也有一些欧亚人是社会主义者或崇尚共产主义，在冷藏行动中被警察逮捕。

1951年10月6日，英国驻马来亚高级专员葛尼爵士(Sir Henry Gurney)被枪手暗杀，有一些欧亚人相信是欧亚族的马共党员干的。当时，葛尼乘着劳斯莱斯前往福隆港，遭到两组马共游击队的伏击。葛尼被甩到山沟前已经死亡。

两名欧亚老人在维多利亚街的圣约瑟教堂接受研究员黎先生和孙女士的访问时，都提出相同的说法，但是我找不到佐证。

战前，新加坡有一些身世显赫的欧亚家族如Tessensohn、De Souza、Desker、Theseira、Cornelius、Rappa等。[17] 英国人回来之前，他们的财

产不是被炸弹销毁，就是被日军和贫困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洗劫一空。[18] 最富裕的欧洲人、欧亚人、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在战争期间损失最惨重。

身世显赫的欧亚家族

本地欧亚人的记录跟伦敦的文件落差很大，也跟葡萄牙和法国的天主教堂的记录不符。因此，只能概括性地说，战前本地有约1万至2万名欧亚人，战后只剩下约6至8千人。De Souza、Desker、Theseira、Cornelius家族继续留在新加坡，并且通过合法的途径累积了财富。

在接下来的20至25年间，许多分散到东南亚各地的欧亚人回流，本地欧亚族人口增至约5万人。至于印度尼西亚，荷兰人想过将20至30万名滞留在当地的欧亚人遣送至巴布亚新几内亚，计划因苏卡诺领导印尼独立而告终。到了苏哈多掌权时，许多欧亚人已经移民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荷兰与其他欧洲国家，少数人改信回教，留在印尼。

前英国殖民地有许多英国和葡萄牙的路名，继续在纽西兰、澳洲、加拿大、非洲、拉丁美洲、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的共和联邦国家炫耀着殖民地主子的辉煌。新加坡有些道路则以欧亚人命名，这些名人都是显赫的企业家与大慈善家，如Desker Road，De Souza Avenue，Tessensohn Avenue 和Rappa Terrace等。新加坡还有许多其他以欧亚人命名的街道，如Aroozoo Avenue，Barker Road，Zehnder Road。[19]

关于Rappa Terrace的由来：“Rappa Terrace以George Rappa Jr命名，上世纪90年代仍然存在，位于实龙岗路的维拉马卡卡拉曼印度庙旁(Sri Veeramakaliamman Temple)。George Rappa Jr是一名欧亚人，1859年成为菲力·罗敏申的商业伙伴。后来，菲力·罗敏申在莱佛士坊创建罗敏申百货公司。2002年， 政府在Rappa Terrace地段兴建新组屋”。[20]

德斯加路(Desker road) 以荷兰欧亚人Andre Filipe Desker命名。Desker是一名卖羊肉的屠夫，1840年左右发迹，乐善好施。Desker的曾孙Barry Desker获得新加坡大学历史系的第一级荣誉学位。Barry Desker是欧亚人协会的受托人，曾经出任驻印尼大使。他是1960年代首批总统奖学金得奖人。

1970年代初，约3万名新加坡欧亚人移民到澳洲、加拿大、美国和印度。李光耀曾形容他们为过客。虽然如此，李光耀还是平等对待欧亚人。1972年，他甚至鼓励巴克将新加坡康乐俱乐部开放给所有新加坡人。巴克是新加坡第一任律政部长。

当初，欧亚人选择离开新加坡是担心人民行动党上台后，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地位会随之消失。有些欧亚人甚至担心人民行动党会变成共产党。在林清祥与方水双的年代，至少13名人民行动党党员在李绍祖的领导下，加入社会主义阵线。巴克、贝恩和其他显赫的欧亚族领袖则加入李光耀的阵营。

李光耀在剑桥大学念书时获得一些人的照料，其中一人就是他的学长巴克。他们在剑桥结交，巴克信任李光耀，没有理由拒绝李光耀的要求。

1980年代，我曾经采访过巴克。对于将康乐俱乐部开放给非欧亚族群，巴克表示没有丝毫的遗憾。他分享了为什么康乐俱乐部的酒廊以本地人Johnny命名，而且这是绝无仅有，在新加坡找不到第二家。巴克以严肃的口吻说，他教导他的孩子们，没有任何一个族群比“新加坡人”更重要。他是相信“新加坡人的新加坡”的先锋。如果人民行动党阅读他的著作的话，2011年的全国大选结果就会不一样。

欧亚人的建国一代

比起许多新加坡人和完全没有付出的一群人，欧亚人的贡献良多。欧亚人并不是等到1965年才为国效力，早在19世纪末他们已经为人民谋福利。欧亚族的公务员协助英国人建立殖民地机制，担任书记、管工、律师、会计师、经理等职务。George Rappa Jr的亲属受委为殖民地秘书，监督实龙岗路的建设。[21] George Bogaars出任新加坡公务员首长，对日后公务员制度的发展举足轻重。

1965年后，许多显赫的欧亚人继续为建国出力，有些目前还在欧亚人协会的管理层或理事会服务。可惜的是，欧亚人的杰出贡献正在逐渐消失中。英国管制时期，欧亚人这个小社群富有影响力，现在则无能为力。

Barry Desker是一名出色的大使，他跟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公开辩论亚细安的立场与定位时，羽翼被拔掉了。Barry Desker出任驻印尼大使时，曾经协助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建立管理机制。Barry Desker精通马来语和印尼语，收集了一些爪哇的古董，对爪哇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在印尼的日子，他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累积了印尼武装部队的关键性知识。

Barry Desker的叔伯在实龙岗路拥有产业，一些身世显赫的欧亚人如Tessensohn、De Souza、Blake、Oliveiro家族则居住在海格路(Haig Road)的欧亚人村。有句老话说，在那儿“随意抛一颗小石子，都可以击中De Souza的屋子”。

De Souza家族的后人Tim De

Souza是新加坡空军部队的一名上校，他是第一位接受英国皇家空军黑骑士战机训练的本地人。Boris Theseira是本地许多企业的主席，也是欧亚人协会的前任秘书长。他是个民主派人士，也是出了名的“大声公”，一向来直言不讳，积极协助社群。

并非全部欧亚人都像林宝音的小说那样，喜欢群体生活。我们经常看到熟口熟脸的义工和基层人员，这主要是因为本地的欧亚族群人数不多。欧亚裔先驱人物如巴克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律师，他也是杰出的运动员和女皇奖学金得主，并出任新加坡第一位律政部长。在新加坡的公共服务领域里还有许多出色的欧亚人，前新加坡首席大法官的太太便是新加坡第一位欧亚裔律师。巴克的女儿也是律师。Edwin Tessensohn在1915年出任英国市政会专员和立法议会委员。Braga Blake 的父亲是新加坡独立前的立法议会委员。1955年至1963年，George Oehlers爵士出任立法议会议长。巴克接过棒子，成为第一任新加坡国会议长。

薛尔思教授是最著名的欧亚先贤，他在国际上享有杰出的医学地位，是少数在世界上拥有薛尔思产科技术的新加坡医生。1971年，薛尔思出任新加坡第一位欧亚裔总统，10年后在任期间往生。薛尔思是李光耀之前，唯一享有国葬和21响礼炮的杰出领袖。

欧亚人的强项是什么？

欧亚人应该对这个有多元文化，丰富历史内涵的东南亚国家感到自豪。17世纪以来，欧亚人从葡萄牙人抵达马六甲那一刻开始逐步发展，发挥过深厚的影响力，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都表现卓越，见证了葡萄牙、荷兰与大英帝国的盛衰。[22]

新加坡欧亚人的贡献超越了人口比例，栽培出多名女皇与总统奖学金得主。欧亚人跟其他族群一样，完全有在新加坡扎根的权利。一向来少数族群都有存在的风险，新马的欧亚族人口比不上印度人、马来人和华人，有人相信欧亚族群将会像犹太人那样逐渐消失，或者像亚美尼亚人那样已经消失。

虽然欧亚人长得很好看，本地人对欧亚裔的称谓却有许多贬义的成分：福建人叫欧亚人为“杂种”(混血儿)，马来人称他们为“虾米”，印度人称他们为“白色的孟加里”、“拿撒勒人”、“基督异教徒”。[23] 不过这些都只是外人的看法，重要的是欧亚人必须在本地培育“特种欧亚人”(technical Eurasians)[24] 来传承，所谓的特种欧亚人指的是亚裔和欧裔的后代。

欧亚人在政府机构担任过最高的职位，栽培出三名出色的武装部队将领与一名警察总监。欧亚人必须保留他们的文化认同与历史，维持足够的人数，才能够传承“短小精悍”的特性，继续作出卓越的贡献。

(作者为新跃大学兼职讲师，新加坡欧亚人协会终身会员)

注释:

[1] 本文所采用的是类似Myrna Blake的创作格式: Myrna Blake, “Kampong Eurasians in Singapore” (1973); Myrna Braga-Blake, Ann Ebert-Oehlers (eds.), “Eurasians of Singapore: Memories and Hopes” (1992)

[2] Rappa, 2013

[3] Rappa 2001; 2006; 2013

[4] Anne McClintock (1986), R. Guha, 以及“下属学”对于英国人的阶级统治都有全面的研究

[5] McClintock与其他学者的说法

[6] Braga-Blake的定义

[7] Barry P. Pereira的定义

[8] Eurasian Association, Singapore, 2015

[9] Rappa, interview with Bryan Davenport (transcription by Jack Lai Kuo Yen, NUS), 1998/9 (Singapore Cricket Club).

[10] 关于马口集中营, 可以参阅C.M. Turnbull, Shinozaki Mamoru, Arkib Negara,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国家档案局所收录的一些民间记载。Rappa, fieldwork notes, 1987 (Penang), 1990-1992 (Malacca); Rappa, fieldwork, 1999-2007 (NUS research scheme).

[11] 根据 Kwok Kian Woon的 coffee table book 网络资料。

[12] Rappa, 同上。

[13] Interview with Kathleen Klyne, “World War II and how Eurasians survived in my family” Rappa, 1983.

[14] Rappa (1983), 同上。

[15] Interview with Barry Peter Pereira, 2000. He was writing his book on the Eurasians in the Singapore Volunteer Force (SVF).

[16] Rappa (1999-2007), 同上。

[17] 这些曾经家世显赫的欧亚家族包括Tessensohn, Blake, De Souza, Pereira, Klyne, Cornelius, Desker, Eredia, Farrao, Texeira, Rappa, Bachelor, Oliveiro, Barker, Bogaars, Baker, Richards。

[18] 详情可参阅李光耀对日治时期的相关叙述

[19] 其他以欧亚人命名的道路, 可参阅http://remembersingapore.org/2014/01/09/pioneer-names-insingapore-streets/

[20] Natasha Tan, 2014

[21] Arkib Negara, Malaysia

[22] Rappa 2000; 2002; 2006; 2013; 2015

[23] Rappa 1999; Fernandis 2000; Rappa 2013

[24] De Souza, 2015

CONTESTED COMMUNITY: THE CONTRIBUTIONS OF EURASIANS TO SINGAPORE

Introduction

SG50 celebrates fifty years of Singapore and Singaporean achievements. SG50 also commemorates over fifty years of Singapore's Eurasian Community's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to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building. This chapter summarizes the ways in which the Eurasian Community as a whole has developed and how Eurasian personalities contributed in significant ways to the building of Singapore over the past five decades. This chapter is written in a semi-scholarly style very much like Myrna Blake's pamphlet Kampong Eurasians in Singapore (1973) and Myrna Braga-Blake and Ann Ebert-Oehlers (eds.) Eurasians of Singapore: Memories and Hopes (1992).[1] Most other Eurasian books have been written as stories, poems, descriptions, photographs or fictional works. Some pamphlets have cartoons and reduce the ethnic identity to silly caricatures. One thing is sure; the Eurasians banded together to object to the adoption of one of Catherine Lim's simplistic novels that depicted one of her characters as a "good time Charlie". The implication was that all Eurasian boys and men fit this stereotype which is the furthest from the truth. Lim herself may not have had such an intention but to caricature a Eurasian man or boy as such for a minority community can cause unnecessary emotional damage. Fortunately the authorities came to their senses and the book was eventually removed from the alleged bookshelves. The entire episode showed that Eurasians take such offences seriously and can bond quickly to face a common threat.

The main language of the Eurasians today is English but this was not always the case. During the time of the Portuguese, the Eurasians spoke medieval Portuguese for over 180 years. The early Portuguese introduced their mestizo policy to create a loyal class of people to Lisboa (Rappa, 2013). They had introduced this mestizo policy in West Africa, the Suez and Goa. Later, the Portuguese would also include Malacca and Macao.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a Eurasian begs a prior question. Who first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Eurasian and where did the word Eurasian come from? According to my own research the word Eurasian was invented only in the early to mid 19th century by a colonial civil servant based in India (Rappa, 2001; 2006; 2013).

In those days, India was the jewel in the crown and the King of England was also the Emperor of India. The ravages of postcolonial cultural politics were teased out of the darkness and into the light by Antonio Gramsci, Franz Fanon (1956), Edward Said (1978), Anne McClintock (1986), Partha Chatterjee (1990), Gyan Prakash, Carol A. Breckenridge and Peter van der Veer (1993),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993), Ranajit Guha and the Subaltern School, Dipesh Chakravorty, Ashis Nandy (1995, 1996), and E. J. Hobsbawm. These scholars and hundreds of others made it clear how the British controlled their vast empire through many processes. One of those processes was through "ethnic enumeration" or categorizing people by color. Being superlative racists themselves, the colonial world of the British was black and white in their simplistic Hegelian dichotomy. People were either white (with power) or non-white (disempowered). McClintock and others mentioned how "one white soldier in the colonies could control 100 non-white subjects" or ten times the men. She observed how White people who were aged, dying and sick would be kept away from public view lest the subject races saw through the weaknesses of the White men. White men secretly despised Asian and non-White men for being unable to "protect and defend" their women. Asian women therefore became the orientalised subject of masculine control. This is why there remains a perception that European men and Eurasian men are able to easily win over Asian women in ways that non-Europeans and non-Eurasians are unable.

The off-spring of White European men and native, Asian women (which were usually the case) resulted in a category of people who belonged neither to the White nor Black / Native / Indian / Chinese / Malay categories. Hence a particularly clever bureaucrat decided to invent the word Eurasian. This is interesting because it only happened fairly recently. No one for example knows the etymology of non-Eurasian people like the Chinese, Indians, Europeans and Malays. By the late 1800s, the category of Eurasian was commonly used in the 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however in Goa and other parts of British colonial India, the word Eurasian was replaced with Anglo-Indian and Anglo-Chinese.

'Who is a Eurasian?'

The Constitution and publications of the Eurasian Association (Singapore) or EAS describes Eurasians as the "descendants of marital unions between Europeans and Asians. We are considered a living testimony to the first Europeans who married Asians between the 16th and 18th centuries over three distinct colonial periods: Portuguese, Dutch and British. The Asian element in our heritage is either on the maternal side generations ago or the paternal one. Nonetheless, we are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domiciled communities of Singapore." The EAS offers multiple definitions that they deem useful such as:

> "a person born of union between a European and an Asian" and the subsequent off-springs of that first 'mixed-blood" (Braga-Blake)
>
> "an Asian, with European ancestry and heritage" (Barry P. Pereira)
>
> "The term 'Eurasian' was perhaps first used officially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records in 1849, in the population census encompassed several smaller ethnic groups. Prior to this, the population census included groups that came from various regions – Native Christians (which included the Luso-Malays, Serani or Kristang communities from Peninsula Malaya), Indo-Britons (which included the Anglo-Indians, Luso-Indians, Ceylon Burghers, Dutch

Burghers and Portuguese Mechanics), Armenians and Jews." (Eurasian Association, Singapore, 2015)

There are many ways to define the concep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Eurasian' concept. The written Constitution and the EAS publications online and in hardcopy are considered the most official source for the Eurasians in Singapore. However, the cultural preferences have also revealed certain anachronisms such as "marital union" and 'Native Christians' or "Indo-Britons". The first two are not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because many are Catholic and Muslim but not all believe in marriages and like other communities, the Eurasians of Malaya, Malaysia and Singapore have their own skeletons in the closet. The third category is nonsensical because it tries to include everything but achieves nothing because there is too much complexity for such a category as Indo-Briton to be meaningful and no serious scholars even refer to this label.

There are many shortcomings in present day approaches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it means to be Eurasian?" and at best they are a Contested Community. Out community is contested in three ways: (1) one cannot rely on a single definition and no one really can say what a Eurasian 'typically' looks like. Physical appearances or primordial manifestations are superficial presentations of a deeper cultural reality. One cannot really rely on what one observes and interprets from the senses; (2) the presence of the Eurasian Community in Singapore is contested as being the 'fourth' ethnic category. Som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agencies accept use it in their bureaucratic forms and reports but others do not.

Contestations come from those other minority communities who (perhaps selfishly or perhaps rightfully) demand official recognition for a place in the Singapore sun.

The Minister "in-charge" of Eurasian affairs was George Yeo (now the President of a secular Indian university) was a popular Chinese Catholic politician with very close ties to the Eurasian community. The current minister representing the Eurasians is S. Iswaran, a Indian married to a Chinese. Therefore there are no Eurasian ministers but that there is even a need for Eurasians to be represented in Cabinet. The Cabinet must think and act for all Singaporeans and not just the minority ethnic communities; and, (3) the Eurasian Community is a contested despite having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y since 1965 (in addition to its earlier contributions since the 17th century) there are other minority ethnic communities with louder voices and larger numbers who are making more demands in terms of government support for education, housing and marriage.

Self-Help?

The EAS as a government supported institution was formed in 1919 as a civil society group. Modelled after the EAS, the PAP government decided that other Self-Help groups should be formed such as the CDAC, Mendaki, and SINDA in the 1980s. Indeed, the EAS was the first and remains the only Self-Help Eurasian Association. It is the oldest Self-Help group as well as the smallest in terms of numbers of members but not in terms of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By contrast, there are also Chinese ones such as the Hokkien Huay Kuan and Hakka associations and the various Malay madrassah that are Islamic-based schools. The Eurasian Association has always kept its doors open for Eurasians who need help.

In a series of interviews with Bryan Davenport when he was EAS president, a few years before his death, he mentioned to that the EAS is an Institution of Public Character (IPC) and that such an official charitable status allowed it to gain access to government dollar-for-dollar matching for its donation drives. He had strongly supported that move along with former EAS president Timothy De Souza. In those interviews at the Singapore Cricket Club, Davenport proudly proclaimed that the democratic ethos of the EAS was seen in the fact that it was not "colour bar". Although he and his family were originally from Ceylon and Dutch-Burghers, no one stood in his attempt to get elected as EAS president.[2] He told us that the Eurasians of the past were mainly clerks, school teachers, and civil servants. Many were also entertainers like singers, disc-jockeys, radio and television personalities. When Davenport discovered my surname was Sicilian in origin, he said he always knew I was a don (a pun on the fact that I was teaching at NUS). The rest of the interviews with him involved what some have referred to as 19th century public policies. Despite the people within the community who have privately or publicly criticized Davenport, most would say that he was a very generous man. As a shipping tycoon he could afford to be very generous and had donated much of his wealth to the Eurasians and other local causes without ever asking for anything in return.

Bahau – A Eurasian Concentration Camp

There are multiple sources that explain and narrate the sad stories associated with the only Eurasian concentration camp known as Bahau. The camp was not located in Johor state as some believe but in Negri Sembilan. Bahau Town had a railway stop that is about 8 hours and 15 minutes from Tanjong Pagar Station. The actual Concentration Camp itself was located outside the town of the same name, about 4.2 km away on hilly terrain. The main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Bahau case come from the historian C.M. Turnbull, Shinozaki Mamoru, and the Arkib Negara, Malaysia as well as indirect stories with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3] Some Bahau observers say that Bahau (Fuji Village)[4]was designed as an agricultural village. In reality, the Settlement was no more than a make-shift self-help farm for 3,400 Eurasians. The intention that Mamoru had was to ease the pressures of food production for locals by resituating the work entirely to the Eurasian community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 Japanese overlord. The Japanese name for Bahau or Fuji-go was not popular among the mainly Roman Catholic residents. No matter how hard they tried to design and plan for the settlement, the widespread sicknesses, malaria and other diseases quickly transformed Bahau into a Eurasian death-trap. Everything had to be built from scratch. Some historians in Singapore have written that the Eurasians chose to bring their families to Bahau. This is inaccurate. No one chose to go to that concentration camp. They did not have to be tricked like millions of Jews were tricked by the Nazis. Rather, the Eurasians tried to avoid Bahau and quit it as soon as the war ended. They knew that it was a decadent and backward place full of dysentery and malaria. And like the Jews they had no choice when forced to walk there. Very few rode in a vehicle and at least 50 perished by the wayside in this arduous journey.[5] Unlike the Jewish

fate, the Eurasian one seemed less horrific. Bahau Concentration Camp was an agricultural model farm designed to make the people self-sufficient. It failed miserably. By 1945, it was clear that at least 2,400 Eurasians had been forced to take the train and to walk to Bahau and many had perished along the way especially the old and the infirmed. Some were even tortured by the Kempetai (the Japanese secret police) for not walking fast enough, poking fun at the Japanese, or talking. [6] This was because most Japanese soldiers were illiterate and suspicious of foreigners who spoke the English or Chinese languages. To some Eurasians, the Japanese soldiers walked and spoke in a way that made one laugh because they looked comical.[7] The number of Eurasians who perished in their forced march to Bahau pale in comparison to the Death Railway in Siam over the River Kwai or the death march to Ponggol Beach. Hundreds had lost their live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and the White soldiers. Many Australians, British, some New Zealanders and even a few Americans had lost their lives as inmates at Changi prison. About one hundred Eurasian men volunteered to fi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and joined the Singapore Volunteer Corps (Company D). Some were said to have been "machine-gunned tortured or killed by the Japanese".[8]

The official colonial records of the British Army in Malaya tended to focus on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British and Indian veterans and other European soldiers rather than the few Eurasian ones. Nevertheless, some of their families were forced to walk to Bahau town and then to the Bahau Concentration Camp in 1943-1944 and had lost their fortunes in Singapore. Others who lived in the Eurasian enclaves in Katong along the East Coast or in the Town were luckier and did what they could to survive by avoiding Bahau. It is not known where the Bishop who was sent there is buried. Apparently some believers brought his body back to Singapore for burial on sacred ground but I could not locate its site and still have not been able to do so. The cemeteries in Malacca and Singapore (Chua Chu Kang Christian cemetery – that still exists; and Bidadari cemetery – that is now a public park) provide fairly reliable records of the Christian Eurasians buried there.

Eurasian tombstones and grave markers placed along the walls of the ruins at Fort Canning in Singapore (formerly Government Hill or Bukit Larangan – 'forbidden hill' in Malay) are of English descent while those Eurasian tombstones in Paul's Church in Malacca are of Dutch descent. These were present when the British colonial soldiers under Farquhar and Raffles tried to blow up the Japanese invaded Malaya through Kelantan to the northeast of the Malay Peninsula including the grave of the famous Catholic Saint, Francis Xavier. Interestingly, there are no religious or medical structures left at Bahau despit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urasians and the Catholic religion eve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One of the most famous internees who served as a medical doctor was the popular and well-respected Dr Charles Paglar. A Eurasian interviewee in his 70s had some interesting things to say about Dr Charles Paglar. "Charlie Paglar", he said, "was fat and famous" and gave free food and medicine before the War but he was "secretly in cahoots with the Japanese Kempetai" and hence he could "remain fat and round while the other Eurasians looked like skeletons!" because, "the Japanese gave him food, shelter and banana money".[9] Medical science proves that the girth or size of a person is not due to the food consumption as much as his DNA.

Nevertheless,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Paglar had collaborated with the Japanese and had benefitted from their occupation in Singapore. It was war after all and everyone did their own part to survive whether they were Malay, Indian, Eurasian or European.

Post War Eurasians

There is also great misnomer about Eurasians leaving Singapore after the War. No one knows exactly where all these Eurasians went. There is also seems to be no point in discussing the reasons why Eurasians emigrated. Many Eurasians would return and marvel at the progress. Others preferred to be absorbed into the large White ethnic communities of Austral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ey would lose their ethn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asmuch as those who converted to other religions and changed their names.

In post-War Singapore, Eurasians continued to play important nation building roles. Many were democrats and capitalists but there were some prominent Eurasians who were socialists and others who came under the Communist banner. A few were rounded up by the police in Operation Cold Store. There is a belief among some Malayan Eurasians that it was a Eurasian Communist marksman who pulled the trigger that shot the bullet that killed Sir Henry Gurney on October 6, 1951, some five years before Merdeka through Malaya. However, I have found no evidence to support this claim made by two old Eurasian gentlemen Lai and Sng interviewed outside the Funeral Parlour at St Joseph's Church in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Gurney was ambushed by Communists while driving to Fraser's Hill in his Rolls Royce car by two troops of guerrillas. He was dead before his body was flung into a dry ravine along the thick underbrush. There were some wealthy Eurasian families before the war including the Tessensohn, Blake, De Souza, Pereira, Klyne, Cornelius, Desker, Eredia, Farrao, Texeira, Rappa, Bachelor, Oliveiro, Barker, Bogaars, Baker, Richards and others. However, many of them lost their fortunes made during the heady days of the British Empire because of the looting by Japanese soldiers, impoverished Chinese, Malays and Indians (see Lee Kuan Yew's works on the war years) as well as the damage caused by Japanese bombers and the hardships of wartime occupied Singapore. The Japanese also stole much movable wealth from Singaporean homes.

Famous and Wealthy Eurasian Families

The wealthiest White Europeans, Eurasians, Chinese, Malays and Indians themselves lost the most from the war. Even the records kept about the total number of Eurasians do not match the colonial records in London. Neither do they match the official Portuguese Mission and French foreign mission Catholic Church and Parish records of the period. Therefore, at best, one is presented with an approximation of the truth: there were between ten to twenty thousand Eurasians before the war and about six to eight thousand left after the war. The De Souza, Theseira, Desker, Cornelius and Rappa families remained in Singapore and increased their wealth significantly

through legal means.

Over a period of two and a half decades, more Eurasians returned from the Southeast Asian archipelago and the numbers were boosted to about 50,000 Eurasians. Under, Dutch Indonesia the plan was to give Papua to the 200-300,000 Eurasians who were left behind but this did not come true due to Indonesian independence under Sukarno. By the time of Suharto, most had emigrated to Malaya and Singapore, America, Canada, Holland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and with a few who converted to Islam and remained in Indonesia. There are many English and Portuguese road names throughout the former British empire, and what used to be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a fledgling bunch of states that included New Zealand, Australia and Canada as well as all the African, Latin American, Pacific Rim and Southeast Asian states. These road names were reminders of the colonial masters and their colonial bureaucrats. Some were famous entrepreneurs while others were philanthropists and had roads and streets named after them. These road names include Desker Road, De Souza Avenue, Tessensohn Avenue and Rappa Terrace for example. Natasha Tan wrote a brief caption about Rappa Terrace where she says, "Rappa Terrace, which lasted until the nineties, used to exist beside the Sri Veeramakaliamman Temple. It was named after George Rappa, Jr., a Eurasian who became Philip Robinson's business partner in 1859. Philip Robinson was the founder of Robinson & Co that later opened the famous Robinsons Department Store at Raffles Place. In 2002, the Klang Lane flats were built at where the Rappa Terrace shophouses used to stand" (Tan, 2014). There were many other Eurasian street names such as Aroozoo Avenue, Barker Road, and Zehnder Road. [10]

Desker road is named after Andre Filipe Desker a Dutch Eurasian (1840s) who had built his fortune in the sale of butchered mutton and was a great philanthropist. Andre Desker's great-grandson Barry Desker took a First Class honours in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Desker is one of the EAS Trustees and was a pioneering Singapore diplomat to Indonesia and some say Russia. He was also the first President scholars in the 1960s.

By the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approximately 30,000 Singapore Eurasians left for Australia and Canada, some settled in the US and India. Lee Kuan Yew once referred to them as transients indirectly during a speech. But that text is difficult to find and transcribed. However, Lee Kuan Yew was always fair to the Eurasians and he had in fact encouraged Eddie Barker to open up the grand preserve of the Eurasian Club (known as the Singapore Recreation Club) to all Singaporeans in 1972.

The Eurasians left before they were afraid that their political and bureaucratic influence as well as their social standing was falling with the rise of the PAP government and some even feared that the PAP government would turn Communist (in the time of Ong Eng Guan and Lim Chin Siong). There were at least 13 PAP members who left the party and defected to the Barisan Nasional under Lee Siew Choh. Eddie Barker would join the Lee Kuan Yew group along with Kenny Byrne and other prominent Eurasian leaders. Lee would ask Barker to open up the EAS to all Singaporeans. Lee depended on several people while studying at Cambridge and one of those was his senior Eddie Barker. A good friendship ensued. Barker trusted Lee since Cambridge days and he saw no reason to say no to Lee when the latter approached him about the status of the EAS.

Nevertheless, it was Barker's call. I had interviewed Barker several times in the 1980s and before his death. He said once said that he had no regrets opening (the SRC) to non-Eurasians. He shared a common joke about how the club was the only one in Singapore that had a bar named after a local chap called Johnny. Barker was Singapore's first law minister. He Barker said in a serious tone that he had raised his children to believe that there was no ethnic group as important as the Singaporean one. Of all the early pioneers he had believed in a Singaporean Singapore identity, something that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government would have benefited from had they read his works and writings before the 2011 General Election.

Pioneer Eurasians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Singapore's nation building

There were those Eurasians who contributed much more than many other Singaporeans and those who did not make any real contributions at all.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se pioneers do not begin after 1965 but date back much earlier to at least the late 19th century. Eurasian civil servants for example helped build the British colonial infrastructure. They were clerks, supervisors, lawyers, accountants and even foremen. A relative of George Rappa, Jr., for example was appointed by the Colonial Secretary of Malaya to supervise the building of the Selangor Road (Arkib Negara, Malaysia) while George Bogaars was the Head of the Singapore Civil Service and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its development. There are certainly many prominent Eurasians who could lay claim to building Singapore since 1965. Some still serve diligently on the management board or committees of the EAS. Sadly, the Eurasian case has diminished over time. Rather than that small but influential ethnic group that it was under the British era, Singapore Eurasians today no longer exert the kind of power they had up till the time of George Bogaars, the former Head of the Singapore Civil Service. Desker was a valuable Ambassador but ruffled feathers when he questioned the position and place of ASEAN in what was to become an open debate between him and Tommy Koh, Singapore's famous Ambassador at Large. Desker had helped build the Indonesian portfolio as the Singapore Ambassador to the world's largest Muslim country. Desker speaks fluent Bahasa Malaysia as well as Bahasa Indonesia and has a small collection of unique Javanese antiques as well as a deep cultural knowledge of Javanese culture. Having spent years there, he acquired critical knowledge on the Indonesian Armed Forces through regular diplomatic channels. The other equally if not more influential Eurasians were Benjamin Sheares, Eddie Barker, and Maurice Baker. Desker's uncle owned property along Serangoon Road like George Rappa, Jr., and the Tessensohn family.

The De Souza, Blake, and Oliveiro families lived at Haig Road Eurasian Kampong among other many Eurasians who were to become famous. There is an old saying that if you threw a stone in the town you would hit a De Souza. Tim De Souza was a colonel in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Air Force (RSAF) and was the first Royal Air Force-trained Black Knight.

Boris Theseira was a chairman of many companies and a former EAS Secretary. Boris Theseira's only son Benett would be twice elected as President of the EAS. Boris Theseira was also known for his loud and booming voice. He was outspoken and held democratic views. Theseira helped build the community alongside the other prominent Eurasians such as the Barker, Baker, Oehlers, Desker, De Souza, Rappa, Skinner, Cornelius, and Erskine families. There does not appear to be much volunteer work done by many Eurasians due to the fact of poverty or unwillingness to partake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Not all Eurasians are as gregarious as one might imagine (thanks to the pulp fiction of the popular writer of the Shrimp People, Rex Shelley and Catherine Lim). Another reason why there are fewer Eurasian volunteer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s and why the same old faces keep turning up is because there are simply not enough numbers. Pioneer Eurasians such as Eddie Barker was not only an established lawyer, sportsman and Queen's scholar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he was also Singapore's first Law Minister. There were many others on the Civil List who of course included the wife of the former Chief Justice of Singapore, the first Eurasian lawyer. As well as Barker's own lawyer daughters. Also, there was Edwin Tessensohn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mmissioner in 1915 and prominent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s well as another influential pioneer (Braga-Blake's father) who was also one of the first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in the march to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Sir George E. N. Oehlers served as Speaker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from 1955 to 1963 and was followed by Eddie Barker who served as the First Speaker of Parliament as well as the First Eurasian Speaker of Parliament.

Perhaps the best known Eurasian pioneer was Professor Benjamin Henry Sheares. President Sheares became a famous international surgeon because he invented the Sheares medical technique known as which served as an important medical method that saved many lives. He was the first Eurasian to become President of Singapore in 1971 and died in office a decade later. He is one of the few Singaporeans to receive a State funeral on a gun-carriage before Mr Lee Kuan Yew.

Eurasians – What Are They Good For?

The Eurasians must take pride of place in a country where they have a long and very colourful cultural history and one of the oldest ones in modern Southeast Asia. The Eurasian community developed from humble roots since the early 17th century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Portuguese in Malacca. The Eurasian community was a once influential and prominent soci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that has see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ortuguese, Dutch and British Empires (Rappa, 1983; 2000; 2002; 2006; 2013; 2015).

The Eurasians of Singapore today have contributed more than their numbers have allowed by proportion. They have produced several queen's and president scholars. Eurasians have every right to be in Singapore as any other ethnic community. Minority communities appear to exist in a state of constant danger because of their small numbers. Since the Singapore and Malaysian Eurasians do not have the large population numbers, like the Indians, Malays and Chinese, some believe that the Eurasian communities will eventually disappear entirely like the Jews are disappearing and the Armenians have disappeared. Eurasians have to depend on locally nurtured talent because the "technical Eurasians" (De Souza, 2015). The technical Eurasians refer to the offspring of Asians and Europeans. There are many derogatory words used to describe Eurasians even though many are known for their "aesthetically pleasing" looks. The Hokkien speakers used to call Eurasians "Chap Cheng" (mixed blood), the Malays referred to them as "grago", and the Indians called them Bengali Putih, the White Bengali, the Orang Nasrani (People of Nazareth), or the Gente Kristang (Christian gentiles) (Rappa, 1999; Fernandis, 2000; Rappa, 2013). They have been represented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political office. They have produced three brigadier generals and a head of police force. The Eurasians must preserve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history and are likely to remain a small but potent contested community as long as the numbers don't run out.

Endnotes

[1] I would like to offer my appreciation to SG50 and all Singaporeans especially EAS President, Mr. Benett M. Theseira, Mr. Lester Low and Ms. Rev. My research assistants at NUS, who worked on a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FASS) research grant were Jack Lai Kuo Yen and Esther Sng. Lai and Sng both cross-checked the sources in Braga-Blake and Oehlers' work several times i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y discovered that the research method was not the typical or conventional social science approaches. Rather, the work is based on som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s and nostalgic story-telling which is a wonderful resource for those who can spare the leisure time to enjoy their work. However, the book is basically a coffee table book and should not be mistaken as an ethnographic, sociological or political science book. It is a book that all Eurasians should read. Anne Ebert-Oehlers would be the first to admit that Myrna Blake is an excellent social worker who was a great teacher and promoter of women's rights in Singapore.

[2] Rappa, interview with Bryan Davenport (transcription by Jack Lai Kuo Yen, NUS), 1998/9 (Singapore Cricket Club).

[3] Rappa, fieldwork notes, 1987 (Penang), 1990-1992 (Malacca); Rappa, fieldwork, 1999-2007 (NUS research scheme).

[4] The name in Japanese according to Kwok Kian Woon's coffee table book on the Internet.

[5] Rappa, ibid.

[6] Interview with Kathleen Klyne, "World War II and how Eurasians survived in my family" Rappa, 1983.

[7] Rappa (1983), Ibid.

[8] Interview with Barry Peter Pereira, 2000. He was writing his book on the Eurasians in the Singapore Volunteer Force (SVF). In that interview, he began asking me questions about my own ancestors and whether L. Rappa was in fact my grandfather Leopold Aloysius Rappa who was on the roster in the third column to the right in the diagram from his manuscript. Pereira kept working on his book till his untimely death.

[9] Rappa (1999-2007), ibid.

[10] See other Eurasian Street names in Singapore at http://remembersingapore.org/2014/01/09/pioneer-names-in-singapore-streets/

(Written by Antonio L Rappa, Life Member, Eurasian Association)

《源》杂志设立
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源》杂志拟开辟《本土文学》栏目。

该栏目将设立“《源》杂志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每年从已发表的作品中选出一名优胜者，予以奖励。

《本土文学》栏目将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短剧、小品)”四种体裁的作品。以下是2016年“《源》杂志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短篇小说(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6000左右。

投稿：即日起至2016年10月(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欢迎订阅《源》杂志

《源》杂志是宗乡总会出版的综合性文化双月刊，于1986年1月创刊，至今已经出版了百多期，是本地极少数的长寿华文杂志。

《源》杂志内容以弘扬华族优良传统，关注社会发展，反映人文景观为主，是了解近代和现代新加坡华社的主要参考资料。

征稿启事

即日起，《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文化、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征稿要求：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来稿须为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作品如已在其它媒体发表过，务请注明。

投稿方式：

请以电子邮件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ruirong@sfcca.sg。

并请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邮寄稿费。

稿件录用：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 联络人：谭瑞荣　　➲ 电　话：63544078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第15届理事会暨执委会全体成员合影